



恭候霍梅尼：千百万人在大街上游行。



苹果树下的老人：霍梅尼在巴黎市郊诺夫勒勒夏托。



君主和大臣在古勒斯坦官。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打败国王的胜利者  
在著名的阿拉维女子学校。

## 目 录

第一章	白手起家	1
第二章	老爹殉难	9
第三章	真主的兵	15
第四章	库姆风云	26
第五章	冤家国王	35
第六章	首次决斗	45
第七章	辗转流亡	52
第八章	国王罪孽	65
第九章	暴乱伊始	78
第十章	遥控革命	88
第十一章	国王出走	99
第十二章	重返家园	109
第十三章	警察下台	121
第十四章	人间天国	133
附 录	霍梅尼语录	141

---

## 第一章 白手起家

一个毫无权势的阿訇，通过遥控战胜了权势显赫的伊朗国王，他的这一成就在近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一胜利是在缺乏有势力的盟友、既无坦克又无士兵、甚至到最后阶段也未放一枪的情况下取得的。正如这位伊斯兰斗士的政治命运所决定的那样，人们不应再否认这个人当代历史上的奇迹了。说得确切些，就是不应否定这个人和他的精神世界，不应否定这位政治化的神学家和他所领导的运动。

凡此种种，显然不仅使伊朗事件的名声——且不谈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超越了这个日夜流血的世界，而且使霍梅尼这个名字被西方千百万人看成荒诞不经的代名词；但事态的发展，不仅违反了西方的逻辑和政治推断，而且也不符合工业国家替第三世界所安排的关于未来的主要模式。

霍梅尼这个人飞黄腾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没有国王统治伊朗长达几十年这一肥沃土壤，如果没有这个国家操之过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他的飞黄腾达是不可能的。此外，还需要有一定的世界政治气候。相反，宗教热情在伊朗戏剧性转变的真正动机中只起了有限的作用。在同国王决斗时，霍梅尼如此显眼地拿在手中的先知绿旗，固然是召唤一切王室冤家的闪光信号，但是，把它作为某一具体神学教条胜利的

标志，其意义即使在凯旋的高峰也还是值得怀疑的。当伊朗人民同霍梅尼一起反叛国王时——详细情况在这以前很少报道——虽然数以百万计的绝大多数民众同意了把他们的英雄所坚持的宗教原则当作对抗现存可恶秩序的模式儿，但是，人民举行起义并不是为了实现霍梅尼关于“天国”的幻想。对欧洲人来说，要理解与这位什叶派领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群众运动的真正动机恰恰是困难的。在这位七十六岁的阿亚图拉<sup>①</sup>受到他祖国居民热烈欢迎的那些日子里，一种奇怪的悬殊景象映入了广大公众的眼帘：报纸和电子宣传工具细致入微地报道了德黑兰市内和市郊发生的骚乱、民众向霍梅尼欢呼的情景以及他的敌人的殊死挣扎；但与此同时，这一冲突的中心人物，在政治上和人情上，却仍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式人物。人们对于他的目标——数十年苦思冥想成果，很不清楚。对于他本人的履历，那就更加不清楚了——当宣传机器早已把霍梅尼捧为超级明星时，他的身世却依然是个谜。

在骚乱、示威和罢工的热潮中，无论是比较狭义的传记性材料，还是范围比较广泛的评论性文章，都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霍梅尼是何许人也？”

这个拥有各种情报渠道、间谍、外交官、卫星和电子计算机的世界，怎么可能忽视了这位作为石油中心地带的中心人物的老人呢？一个被遗忘的神学家怎么能战胜一个自称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伊朗人民无条件拥护自己、并在逃离本国

---

<sup>①</sup> 阿亚图拉(Ayatollah)，阿拉伯语原意是“真主意志的体现者”，后来成为什叶派的宗教职称和学衔，表示学识渊博，众望所归，有很高权威。——译者

之前的五个月,很有把握地宣称“没有人能推翻我……我有权力”的所谓不可战胜的独裁者呢?况且,他还是一位拥有一支无条件忠于他的、似乎是世界上最强大军队之一的国王。

一个拥有三千万人口、半个世纪以来每天处于王室宣传的交叉火力网下的民族,怎么会如此出人意外突然地听任“雅利安人的太阳”(国王的尊称)落山,而去追随一颗被伊朗人衷心地欢呼为“所有信徒的光明”的新星呢?以“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政治稳定的首要前提”为座右铭的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竟然掉头转向,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发展中国家的当权者没有一个人象国王那样按照西方的概念来实行一项野心勃勃的经济和发展纲领,如此卖力地推行社会改革、土地改革、教育改革和工业化。但是,他最后所得到的却不是所期望的政治稳定,而是人民起义。

继一九七六年二月华国锋当选为中国党的首脑而成为毛泽东的继承人之后,被大吹大擂了半天的全球总体情报时代,又遭到了第二次可怕的破产。因为把霍梅尼这样一个政治变革的主角又给忽视了,而实际上是忽视了他漫长的一生。西方国家档案馆和秘密情报中心的档案里,关于这个人的情况都是空空如也。这种丢脸的事情发生在世界大危机区之一的地方,因而显得更加危险。伊朗国王的逊位和下台,在一九七九年初改变了东西方大国原先期望或承认的地缘政治态势。因为在以往的岁月里,伊朗王国自觉地承担着一项巨大的责任:充当东西方利益的缓冲器和欧亚两洲之间的纽带。伊朗国王的废黜,显然使波斯湾的许多石油大王以及诸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乌金”消费者不寒而慄。



阿訇霍梅尼之所以能成为巨大变革的中心人物，是由于他是德黑兰王室首屈一指的死对头。三十年来，他始终坚持要求国王退位。当王室的其他批评者对国王的虚假权威感到绝望，而对这种胆大包天的政治目标又几乎连偷偷地想一想也不敢的时候，霍梅尼却已经在大声疾呼了。霍梅尼不顾自己和国王之间的力量悬殊，顽固地主张必须把“魔鬼”赶下孔雀宝座。他所维护的宗教，不仅给了他合法身分，而且还给了他精神慰藉：“对一个不公正的统治者说上一句公正话胜过祈祷一百年”，伊斯兰的经典就是这么说的。于是在反对暴君的斗争中死去，就是打开了通往天堂的大门。

世界上这么久听不到这位伊斯兰教的萨佛那罗拉<sup>①</sup>的消息，其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对头——伊朗国王，几十年来几乎完全把霍梅尼活活地葬送了；二是西方公众长期来对国王恭顺备至，在大伊朗洋洋自得的岁月里，几乎不想听到关于霍梅尼的消息。但最后还是由于国王自己滥用秘密情报机关“萨瓦克”<sup>②</sup>的权势，弄巧成拙，估计错误，在伊朗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逻辑混乱的诽谤性文章，把这位被流放的人给招回到政治生活中来，从而触发了一场导致伊朗街头万人死亡的再也无法刹车的运动。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原来这个长着一把浓密白胡须、两条粗黑眉毛的年迈阿訇，在长达十四年的流放中（先是在土耳其、伊拉克，后来到法国）只是在表面上丧失了权力和影响，但在实际上却拥有千军

---

① 萨佛那罗拉(1452—1498年)，意大利教士和宗教改革家，这里喻指霍梅尼。——译者

② 萨瓦克(SAVAK)是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署的缩写。——译者

万马，连现代化的火炮和轰炸机也无法与之匹敌。这个比喻虽属老生常谈，但却是确切的：全国有十八万毛拉，“真主的下级军官”，这就是他的千军万马。他们作为教士、教师、兽医、文人和仗义疏财的义士，是遍布在王室现代化阴影笼罩下的千千万万个伊朗村庄里的一支精神上的精锐部队——一股实际上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八万个清真寺，就是霍梅尼的基地、兵营和宣传中心。由于宗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它们数十年来一直不受国王的约制。

自从昔日的牧羊人、后来的哥萨克上校礼萨·汗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加冕为礼萨国王以来，巴列维王朝一直在探寻神圣的裔系，以维护其统治。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终于在一九七一年，通过举行盛大庆典，从波斯波利斯<sup>①</sup>、大流士<sup>②</sup>和薛克斯<sup>③</sup>二千五百年前的古老荣光中为其王权找到了依据。这种继承权——它如此引人入胜地使几百万画报的读者去怀古溯源——也许加强了伊朗作为石油天堂志愿“警察”的外交地位，但却使伊朗本身面临着一场危险的挑战：国家的伊斯兰支柱被古波斯的基础所公然替换，真主受到萨拉苏什特拉<sup>④</sup>明目张胆的挑战。

年迈的霍梅尼和他的毛拉们却没有必要去寻根溯源，因为他们的继承权源远流长，他们的基础包括整个民族。“真主是万能的，霍梅尼是我们的带路人。”这类口号，几个月来一直

---

① 波斯波利斯是古波斯的首都。——译者

② 公元前第三、四世纪，波斯三代国王均用“大流士”的称号。——译者

③ 薛克斯是波斯国王，公元前485—465年在位。——译者

④ 萨拉苏什特拉是公元前六世纪波斯的预言家和宗教家。——译者

响彻伊朗城镇的大街小巷。

然而，这位年迈的什叶派领袖对权力的要求，并不仅仅以其语言的力量和权威为依托。伊朗人对他感到着迷的东西，是他本人的品格：在千百万人的心目中，他是这个国家里唯一的无瑕白璧。几十年来，他一直反对我们欧洲人誉之为进步或现代化时代象征而大吹大擂的一切（从伊斯兰教所禁止的银行到游乐场和色情电影）。当他的故国日益眼光短浅、腐化、甚至变得孤僻的时候，当君主雄心勃勃的经济梦想和大多数人民的现实生活之间的鸿沟日益明显的时候，他始终在为恢复简朴的生活而斗争。

在西方眼里，伊朗是在顺利地实现工业化。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虚假繁荣中，伊朗王国在其晚期岁月里，越来越成了一个处处是围墙和哈哈镜的国家。围墙隔离了一切村庄，围墙使德黑兰所有住宅处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从而分割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造成了伊斯兰教生活所不容的后果。在围墙后而，一边是纸醉金迷，一边是民穷财尽，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豪华的别墅里，这个国家的名门望族，用夸大自己、无视他人、歪曲事实的哈哈镜，装饰着他们富丽堂皇的厅堂。因此，尽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济统计数字，有规模惊人的军事力量，尽管东方和西方不断向国王鞠躬致敬，但伊朗却变成了一个霍梅尼几十年来极力反对的、越来越酷似一幅讽刺画的国家：在妄自尊大的后而，隐藏着动荡不安；在经济浮夸的后而，隐藏着对丧失本身价值的悲哀。

霍梅尼关于“简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的福音，毫不费气

力,仅仅由于国家本身的发展而涂上一种越来越现实的色彩。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对宗教幻想的评价,远远高于所有谈论现代化、发展和进步的诱人词句——这些都是国王从西方引进的。

当霍梅尼返回伊朗时,一家德国报纸曾这样写道:“在一万二千米高空,这位虔诚的老人,几乎以音速飞回到中世纪。”在欧洲人看来,这句批评性的、损人的话,似乎只有在人们懂得霍梅尼关于“天国”的梦想之后才能加以理解。实际上,真正难于理解的倒是,为什么一个右翼专政会在伊朗遭到思想上显然要右得多的狂热民众的唾弃。然而,霍梅尼对伊朗人民的魅力——如果它不是作为追求其他政治目标的而纱——是有其客观的、令人信服的原因的……这种魅力,是那顽强正直的人物在那受人憎恨的当权者而前所表现出来的、几十年坚贞不屈的刚毅精神的产物。它依靠的是那个人的动员群众的能力。它是以人们对一种简朴和公正生活的普遍渴望为基础的,这种渴望长期以来也曾席卷过所有工业国家。对伊斯兰教这个社会保险体系来说,它格外具有诱惑力。

当炼油厂和工厂停工,机关和学校关闭,外国观察家有理由对经济混乱感到忧虑时,霍梅尼在伊朗的亲密战友通过空前的团结和自发的社会安排,使人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围墻和哈哈镜后面,伊斯兰教信誓旦旦想实现的古老集体生活突然又再临人间;伊斯兰合作社在德黑兰分发廉价的生活必需品,或者把它们赠送给手拿古兰经、真诚地证明自己贫困的人们。几万名罢工工人从伊斯兰社会基金会那里领取他们过去的工资。当正在瓦解的国家组织已经不能维持最必需的

慈善机构时，死者的孤儿寡妇却得到了资助救济。

所有这一切，使那些把对救世主的期待寄托在霍梅尼这个普通人兼阿訇身上的老百姓的想法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了。这是通往冒险生涯顶峰——通向一场顽强斗争的胜利的道路上最后几块里程碑。这场斗争，早在霍梅尼诞生前就同他的名字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 第二章 老爹殉难

在荒芜的洛雷斯坦<sup>①</sup>

信仰真主的甘地

阿拉克<sup>②</sup>的密探

抉择：姓氏问题

七十多年前，有一个老人在伊朗贫瘠的高原上逐村游荡。他头裹黑色缠头，肩披驼绒色“阿巴”<sup>③</sup>。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硬汉子，是一位真主的教士——一位非凡的人物。他以独特的方式区别于新旧世纪交替年代里的毛拉们：这位云游阿訇向受苦受难、无权无势、穷似乞丐的农民诅咒主宰城乡生活的伊朗大地主。

在狭窄的粘土房里，贫穷和苦难是形影不离的客人。几代人的大家庭，挤在斗室里的一张小小的、往往是自织的四方地毯上，同吃、同住、同睡、同劳动、同嬉戏——他们共同分享着住房和家当：一两头牛、一两只羊和一头驴。每年，木瓜地、

---

① 洛雷斯坦是伊朗的一个省，位于伊朗西部。——译者

② 阿拉克是伊朗的一个地名，位于首都德黑兰和圣城库姆西南。  
——译者

③ 阿巴是阿拉伯人穿的宽大无袖的长袍。——译者

庄稼地、菜园和甘蔗园里的收成，他们顶多只能拿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归地主。这是按一个简单的算法办的，就是地主提供了三种生产资料：土地、水和种子；而农民只提供了一样东西：劳动。在这个老毛拉游荡的巴克蒂亚尔和洛雷斯坦交界的高原地区，农民的收入大都只够吃到仲冬，随后就必须寅吃卯粮，向地主预支来年的收成。医药局限在有点医疗经验的人开些草药的水平上，因而小病也会迅速导致死亡。在地主为装点仁慈博爱的门面而开设的农村诊所里，各种新流行的传染病随时在追逐着受害者。

那时，审判权统统掌握在封建主手里。如同把选举作为扩大自己财产的手段一样，他们凭借着审判权横行霸道：黑夜里夺占村庄，劫掠城镇；掳掠人口也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在七十年代的欧洲出现的某些似乎是政治极端分子的创造发明，在伊朗早有先例：绑票使富贵人家提心吊胆；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如数付款，那末人质可以不受伤害，获释回家……。在分配首批议席期间，地主早已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拉农民——投票牲畜——的选票了。在公布初选结果的疯狂日子里，也可听到某个落选议员的绝望呼声。这个议员本来估计自己能在选举中获胜，但最后却在使人捉摸不透的选举中一票也没有捞着。他对聚在一起的地主们诉苦说，“五千人答应投我的票，结果却骗了我，这一点我算是领教了。但我不知道还有我自己的一票。早知道，我应该投自己一票。”

在这个社会里，农村中的阿訇只能在博得富人欢心的情况下才能活下去。因为农民和村庄的主人，在收获结算中也收取伊斯兰教社会税，把它们分给阿訇、赤贫者，并用于建造

清真寺。仰人鼻息与这位在高原上游荡的老毛拉的秉性是格格不入的，简直比自杀还难受。在所有的集市上，他咒骂那些本应供养他的人，向他们挑战。面对独断专行的势力，唯一能保护他的东西，看来只有那条证实他同先知穆罕默德有血缘关系的黑色缠头了。

在伊朗，伊斯兰教创始人的直系后裔拥有“赛义德”的光荣称号，其中大部分被称为“阿加”<sup>①</sup>。但是，如果穆罕默德的亲属不是阿訇，那末，为了表示他们的特殊出身，要在臀部围上一条绿色的围巾。这是一种传统，今天在欧洲的许多伊朗地毯商人中仍可见到。

这位裹着缠头、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岁月里游荡在巴克蒂亚尔和洛雷斯坦之间的老人，对圣典颇有研究。许多善男信女都把他当作宗教问题的公正权威。他是一位阿亚图拉。这个称号在德文里译作“真主象征”或“真主化身”都不很确切。这位革命阿訇，冒犯封建老爷们万能至上的权威，未经许可就直截了当地成了伊斯兰教的主教一类人物，成了一位受过特殊教育并享有善男信女特殊公认的毛拉。关于他的出身，历史记载是模糊的，因为有关出生和死亡登记的书面记录在上个世纪的伊朗是没有的。据德黑兰今天的说法，他的父亲大概是十九世纪中叶从克什米尔流浪过来的。这一点他的近亲无法证实。但还有另一种说法：这位老阿亚图拉本人，在印度（也许是克什米尔）学习过几年——从他的言论来看，的确有许多圣雄甘地精神的印记。但是，祖籍也罢，本人在远方的学

---

<sup>①</sup> 阿加是伊斯兰国家的统帅、大官。——译者



习也罢,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印度精神显然在他的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致他给自己取名“赛义德·印地”。

在漫长艰辛的流浪生涯的最后几年,他让妻子和三个儿子回到他曾流浪过的中心地区。这是一个名叫霍梅因的小城镇,那里盘踞着几个大地主,是居住在周围地区的洛雷族和巴克蒂亚尔族人微不足道的商业中心。这个城镇位于海拔一千八百五十米、寸草不长的光秃秃的山坡上。这里的人们只有用毛毯蒙在头上,紧紧地蜷缩在简陋的、自制的火炉旁,才能度过寒冬腊月。这个地区,连同虎、鹿、狼——这些野兽今天仍在附近的山谷中穴居——曾使何马(Homa)这个五千年前传说中的国王和热情奔放的猎人赏心悦目。何马的两个相邻猎区的波斯文复数形式赋予这个城镇以何梅因(Homein)的名称——后来经过阿拉伯语化,成了霍梅因(Khomein)。在这里,赛义德·印地让他的全家住在面对清真寺、紧邻客栈的一间小宅里。这位怒气冲冲的真主的教士,常常从这里出发,骑马或者步行周游古尔佩甘、马赫拉特、昆萨尔和阿拉克的城乡。惊异的农民们听着他强硬的控诉,同时又向他提出忠告,但是,这位老人仍然无所畏惧。

他的末日终于来临了。一天,他在从阿拉克到霍梅因的途中,被一群由阿拉克地主雇用的农民团团围住,他们用木棒和农具殴打他,没有费多大功夫就结果了这个已经年迈而毫无招架之力的流浪者。

死者在霍梅因留下了三个儿子。最小的鲁霍拉(“主的灵魂”)才九个月,还在襁褓中。估计他是一九〇二年出生的(这方面也缺少详细记载)。后来有关他年龄的错误计算,是由于

西方的阳历和伊斯兰教的阴历在时间换算方面存在着差异。当时，大儿子已经离家外出，年幼的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还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之下。他的外祖父米尔萨·艾哈迈德也是一位有名的神学家。母亲死后，鲁霍拉和精力充沛的、虔诚的婶婶生活在一起。她以特殊的热诚管教着他，那怕是一丁点儿怀疑也要遭到严厉的谴责，结果，终于在他的心灵中激发了为真主而生活的渴望。

那时的伊朗城乡，实际上不存在什么西方式学校。只有毛拉们，多半在冬天的农闲季节里，把农民、地主和阿訇的孩子召集在一起，教他们念古兰经，并以这部经典作为唯一的教科书凑合着学作文。至于算术，只要学会将来做生意和缴纳伊斯兰教社会合理税捐时保证不吃亏就行了。阿訇之子鲁霍拉·穆萨维在霍梅尼的毛拉身旁苦学了四年。十五岁时——继母亲死后，婶婶此时也去世了——他的哥哥穆尔特萨（后来也是库姆的一位有名的伊斯兰教神学家）接替了教育他的责任。当时正值政治大动乱的年代。一九一五年，伊朗也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土耳其人和俄国人进入这个国家的北方地区作战，到处抢劫和蹂躏村庄。一九一九年，这个遍体鳞伤的国家，仍然在英国人手里，实际上沦为一个保护国。英国人的残酷剥削，在伊朗人民中激起了一股自发的仇恨浪潮。反叛的骨干是伊斯兰教会。从那时起，他们就把反对外国利益的斗争鲜明地标在自己的旗帜上。

对于鲁霍拉来说，想当一个毛拉早就毫无疑问的了。据人们目前所知，他先是到了伊斯法罕，并在十九岁那年，在阿拉克附近拜一位名叫哈伊埃里的阿亚图拉为师。此人可能是

当时最有名的什叶派神学家。霍梅尼对他无限忠诚。刚满二十岁的小伙子和老师一起来到位于德黑兰和霍梅因之间的圣城库姆。这个圣城最终决定了这个小伙子的命运。他认为在这里,通过神学研究和积极地参与社会工作,可以最忠实地继承他父亲的未竟事业。他和哥哥们深为老爹如此悲壮殉难所感动,都愿极力效法他。有一天——礼萨国王此时已经在德黑兰取得了政权——国王的官吏前来给每一个家庭赐姓。当时,这三个儿子都想随他们的亡父姓“印地”。但是他们的愿望都未能实现,因为政府认为,一个伊斯兰教的阿訇家庭偏偏用外国姓氏,这是不能容忍的。最后通牒毫不含糊:这三个年轻人,如果要保留父亲的姓氏,就必须抛弃从穆罕默德后裔那里继承来的缠头。不然的话,就必须选用一个在德黑兰官吏听来有足够波斯味儿的姓氏。对鲁霍拉·穆萨维及其兄长来说,做出这样的抉择是困难的。最后,他们当中只有一个想成为律师的兄弟,保留了父亲神秘的别名。另外两个兄弟,为了保留缠头而找了一个新姓氏。鲁霍拉按从小住到大的故城的名称姓了霍梅尼。霍梅尼就用这个姓氏开始了他作为虔诚和好斗的毛拉的漫长生涯。他从故城来到了什叶派中心库姆,脑子里所带来的故城记忆深深地打上了他老爹斗争的事迹和时代精神的烙印。所有这一切,后来就成了他伟大的终身信仰:“反对暴君的斗争比祈祷和斋戒更为重要”。他父亲在农村传经播道干的是这些,霍梅尼自己在伊斯兰教经典中读到的也是这些。

### 第三章 真主的兵

围绕着穆罕默德继承人的阴谋  
毛拉、麦地<sup>①</sup> 和伊马姆<sup>②</sup>  
公正——不仅在天堂  
抽打阿亚图拉

什叶派的伊朗人，象他们大约十三个世纪以前的祖先一样，他们今天仍主张为反对压迫者而斗争；他们希望先知穆罕默德诞生地麦加能复兴。由于历史的烙印，什叶派教徒比所有其他伊斯兰宗教派别更热衷于成为实现这一心愿的殉教者。这种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知死后不久爆发的流血冲突；伊马姆侯赛因，穆罕默德的外孙，于公元六八〇年在反对哈里发<sup>③</sup>贾西德的英勇斗争中死在卡尔巴拉（在伊拉克）城门前。他的死，直至今天仍然召唤着全世界八千六百万什叶派教徒去进行公开复仇和完成反抗不公正统治者的神圣使命。每年的

---

① 麦地(Mahdi)是伊斯兰教徒渴望降生的救世主。——译者

② 伊马姆(Imam)，阿拉伯语原意是“站在最前列的人”，转意为教长，是什叶派的最高宗教首领。——译者

③ 哈里发意为继承人，头四任系从穆罕默德亲信中推举产生，后来叙利亚总督当选，改为世袭。——译者

穆罕拉姆月<sup>①</sup>，什叶派教徒都要纪念当年的这个事件：这个历史事件的爆炸力，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宗教上，依然是非常强烈的。

和全世界的六亿穆斯林——从马来西亚到非洲心脏，从中国经过苏联直至苏丹——一样，什叶派教徒也拥护“信仰的五根支柱”<sup>②</sup>：（一）信仰以穆罕默德为其唯一先知的真主；（二）每天祈祷五次；（三）赈济穷人；（四）在神圣的斋月——莱麦丹月<sup>③</sup>，白天禁止饮食；（五）一生中至少要到麦加朝圣一次。什叶派和占伊斯兰教信徒百分之九十压倒多数的逊尼派教徒一样，他们也信奉一千四百年前由天使加百列显示给先知穆罕默德的古兰经为经典。

但是，伊斯兰教中的两大教派，什叶派<sup>④</sup>和逊尼派<sup>⑤</sup>，在先知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权和对伊斯兰法律的解释等问题上是不一致的。逊尼派认为先知的口述（逊纳<sup>⑥</sup>）也是信仰和教义的重要源泉。

伊斯兰教这两大教派之间的大争执起源于一次宫廷阴谋。事涉穆罕默德的第四个继承人。公元六五六年，先知的外甥兼女婿阿里被选为哈里发，五年后遇刺。于是，必须就如

① 穆罕拉姆月是什叶派教徒的一个斋期，时在伊斯兰教历第一月初十天内。——译者

② 指伊斯兰教必须力行的五功：念功、拜功、课功、斋功和朝功。——译者

③ 莱麦丹月指伊斯兰教历太阴年第九月。——译者

④ 什叶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小集团”、“改宗者”。——译者

⑤ 逊尼派系正统派，拥护哈里发统治，信奉追记穆罕默德生前言行的《圣训》，认为《圣训》应同《古兰经》同样受到尊重。——译者

⑥ 逊纳是根据穆罕默德的言行而建立的伊斯兰教教规的传统部分。

——译者

何继承哈里发的尊位达成协议。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因为这个职务集政治、军事和宗教大权于一身。哈里发是宗教的维护者，要为反对异教徒而斗争，并且要表现出对伊斯兰教的无比献身精神。但是，哈里发的权力也有着极其明显的局限性，归根结蒂，他的言行也要遵循古兰经的戒律。

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对他的继承问题没有留下明确的指示。穆罕默德死后三十年，信徒们又要来为阿里寻找继承人。他们当中的一派人坚持通过选举——只以宗教和本人功绩为决定条件——来确定继承人，这就是逊尼派。而另一派则要求把庞大的伊斯兰教宗教团体（倭马亚）的领导权让给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女婿阿里的直系后裔，这是什叶派。

这一根本分歧的政治影响今天仍然十分明显。虽然一九二四年奥斯曼帝国灭亡后，哈里发在政治上已不复存在，时至今日也没有哪一个阿拉伯领导人敢于取用这个称号；但是，由于按照逊尼派的解释，哈里发不允许世袭权力，因此在信奉严格的逊尼派中心地区沙特阿拉伯，尽管有独家统治的权力，但王位也始终不是天然继承的。

对于约占伊朗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什叶派教徒来说，先知的继承人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他未卜先知，有着超凡的智慧，白璧无瑕，是一种超人。按照什叶派的传统，被敬若神明的伊马姆阿里还有十二世继承人。这是一个倒霉的职位，因为他们当中所有人几乎都惨死于围绕着哈里发合法性的斗争中。按照什叶派的理论，最后一世，也就是第十二世伊马姆穆罕默德在八七三年还是个孩子时就处于“隐居状态”。许多信徒猜测，他隐居在巴格达附近的水槽里。但是，随着岁

月的推移,他终将成为“麦地”,成为救世主,那时将在人间建立起天堂。

在这之前,由他的代表——阿亚图拉掌管什叶派的精神财富,解释占兰经,讲授伊斯兰教规。伊斯兰教世界中政治、军事统治的最高职位哈里发仍然空着,善男信女们必须心悦诚服地等待世界的主宰归来,但是在信仰问题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必须承认布道者的权威。

“伊马姆”这个在到达胜利顶峰时授予霍梅尼的光荣称号(就连伊朗的宣传工具刊载时也要用大号醒目标题),在什叶派那里有着多种含义。在清真寺里,伊马姆扮演着领祷人的角色,但他同时也是所有信徒梦寐以求的、执掌着神权政治权力的神秘教主。

类似天主教教皇那样的宗教首脑,在什叶派那里实际上是没有的。伊朗神学家的精神领导,很少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取决于信徒们和毛拉们对最大的智慧和最大的虔诚的普遍公认。授予领导人的光荣称号,绝不是“伊马姆”这个名称,而是那个东方式的神秘词语“效法的源泉”。在许多人看来,当几百万伊朗人在同国王的大搏斗中宣誓效忠伊马姆霍梅尼时,从教会主教权威向救世主权威的过渡显然已经完成了。众望所归的救世主伊马姆似乎就这样降临了。甚至在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阿拉伯世界的报纸上,也终于把这位老阿亚图拉称为伊马姆,这一点至少暂时表示对霍梅尼的承认已经超越了他自己的教派。

伊斯兰教内部的两大教派向各自的神学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任务。逊尼派教徒认为,经典的教导可以按照类推法规则,

通过把当前情况同穆罕默德时代作对比，用来解释当代的问题。而什叶派的观点是：古兰经“为创造性的解释敞开着”。这就使他们的信仰有一定的灵活性，使神学的解释者阿亚图拉在人民的生活中具有非同小可的影响力。这样一来，单个神学家的智慧就比圣训的传统更重要了。伊朗的信徒们可以在大约七十个阿亚图拉中为自己选择一个信仰的指路人。要成为无可指摘的谦逊能干的圣人，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品德和学说。

这可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它绝不仅仅是个神学问题。什叶派教徒一直比逊尼派教徒更加接近生活和社会。什叶派在伊朗历史上向来是一支世界性的力量，说得更确切些，什叶派的宗教机构一直比逊尼派强大得多。它植根于信仰，立足于建派。什叶派学说诞生于直接反抗一位舍公理仗强权的统治者——哈里发的斗争中。因此，符合神意的公正也属于什叶派的教义，这种公正不仅在天上，而且在人间都必须实现。

凡此种种使人们明白了：为什么恰恰是什叶派教徒如此热衷于坚持伊斯兰原教旨是政教合一，是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制度上的统一。这个制度既要处理真主和人的关系，也要处理国家与公民之间、以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伊朗，直至二十世纪，宗教一直是政治上的一股爆炸性力量。自从一〇七七年国王亨利四世的卡诺萨之行<sup>①</sup>后，我们欧洲人便逐渐把这股力量给抛在一边了。地处伊朗中心的

---

① 卡诺萨是北意大利的一个城堡，一〇七七年教皇格里哥尔七世（约1020—1085年）在那里向前来赎罪的德国国王亨利四世（1050—1106年）宣布免予逐出教门。此后，卡诺萨之行就成了世俗君主向教廷屈服的代名词。——译者



伊斯法罕的建筑风格，在政教合一方面给人们的印象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显。这里的马哈丹国王广场——可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广场之一——及其两侧，把伊朗社会的三大支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王宫、清真寺和市场。

在伊朗历史上，存在着僧侣具体参与政治的一系列证据。这并不总是有利于国家的。由于波斯僧侣与日俱增的影响，波斯帝国在一六二九年阿巴斯大帝死后就日渐衰亡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衰老的恺加王朝的政治无能越来越明显，毛拉势力的增长越来越迅速，因此，阿亚图拉米尔萨·埃尔石拉西在一八八九年号召伊朗人禁烟时，实际上是以此迫使当时的国王纳西尔·埃尔丁取消拼命哄抬烟价的英国烟草公司对整个伊朗市场的垄断。

一九〇七年，软弱的恺加王朝的统治者穆萨法·埃尔丁，在那位居领导地位的什叶派神学家的逼迫下，对一年前制订的宪法（以比利时为样板）作出了一项重要保证：规定成立一个伊斯兰教宪法参议会，将来这个国家的每项法律、法令都必须经过它审核，以保证同伊斯兰教的要求取得一致。这样一来，政治化的僧侣的影响就越发强大了。

巴列维王朝掌权后，这部宪法的精神当然就立即失效了。然而什叶派要求对公共生活实施宗教最高监督的宿愿，经受了几十年有效的压制后，到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又重新证明是政治的烈性引爆剂，最后导致了国王统治的完结。

一九二四年三月，即上述宪法颁布将近二十年后，毛拉们出于神学的原因，拒绝了哥萨克领袖礼萨·汗成立议会制共和国的要求。这竟成了伊朗历史上一个奇怪的转折点。他们

的拒绝反而为这位巨人般的勇士自行加冕为国王礼萨、从而成为只赓续两代的一个王朝的鼻祖提供了方便。对共和制还是君主制问题作出这样的抉择之后五十四年的今天，又是这些宗教界人士以要求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的斗争结束了君主政体。在一九二四年，对他们来说，君主立宪要比以西方为样板的、权力分散的共和国更接近于他们所梦想的“天国”。但是，在一九七八年，伊朗几乎没有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毛拉认为，国王统治能实现他们当时的希望。

事实很快表明，礼萨是多么向往土耳其革命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政治幻想。凯末尔在伊朗的北方邻国土耳其致力于政教完全分离，并以此作为使这个近东国家靠拢欧洲的一个先决条件。具体地说：废除面纱和土耳其帽；废除伊斯兰审判权和一夫多妻制；在清真寺和学校里使用土耳其语。这种民族自尊运动的影响在以后几年、几十年里席卷了诸如埃及、突尼斯和巴基斯坦等国，但是受影响最深的是礼萨·汗统治下的伊朗。其动机和效果是不一致的：把令人赞叹的西方进步引进近东生活的每一个努力——从妇女节制生育到现代化经济管理——都遇到了宗教的阻力。时至一九七九年，沙特阿拉伯最现代化工业设施的开工时间，还取决于主管此事的伊斯兰阿訇是否及时地看到新月，来日是否黄道吉日。虽然伊朗的什叶派长期以来也有意对伊斯兰教作出新的解释，以便适应现代化社会。但是，巴列维王朝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七九年期间所实行的政教分离，对毛拉们来说却是不能容忍的。一九二四年三月，什叶派僧侣们在库姆没有满足礼萨大帝追求君主政体的愿望。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加冕

后，礼萨大帝立即把毛拉们打入政治冷宫。当阿亚图拉穆萨维·霍梅尼埋头研究伊斯兰教的时候，什叶派僧侣们已经开始向统治者提出巨大的挑战。在教会煽起的仇外情绪的压力下，礼萨国王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废止了那些古老的屈辱媚外的“投降法”。这些“投降法”，从十六世纪以来实际上使外国人几乎在任何犯罪情况下都享有豁免权，其中还包括免税权。但是，由于外国政府拒绝将来让它们在伊朗的人员受严厉的伊斯兰法律的管辖，礼萨国王就许诺实施一部民法。这就引起了库姆教会同王室的激烈对抗，并导致了一九二七年四月至十一月全国总罢工。

为了安抚毛拉们，其中包括特别积极的霍梅尼，礼萨国王在十一月派他的妻子到库姆去充当调解人。国王的妻子（他共有四个妻子）不堪愤怒的神学家的压力，不得不发出急电向丈夫求救。随后发生的事件就决定了此后数十年伊朗宗教领导和巴列维王朝之间的关系。国王带兵来到库姆，无视伊斯兰教最原始的戒律，穿着马靴跨入神圣的清真寺，用手杖抽打一名有权势的阿亚图拉，并残暴地收拾了他的敌手。

在伊朗东北的圣城马什哈德，又是这个礼萨，使用军事暴力迫使宗教人士改变服饰：国王一声令下，必须把长袍长裤换成西装。这样做的唯一收获是：为数不少的来自欧美的外交官和间谍，肩挎阿巴，头裹缠头，乔装打扮成毛拉模样来侦察这个国家的国土民情和矿产资源。前此不久，身着毛拉服的伊朗特务机关“萨瓦克”人员还感到局势特别保险。但曾几何时，情况变了。当霍梅尼正在把他的毕生精力献给宗教事业的时候，在德黑兰唯一一所医院里出生的王储穆罕默德·礼萨，

在他统治的漫长岁月里毫不含糊地把什叶派禁锢在一个隔离区，以此造成一种终于在一九七八年爆炸了的巨大压力。其所以如此，原因首先在于君主对于技术的迷信，在于他所接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与他的统治息息相关的历史要求。而要求确立王权正统性过份心切，就促使国王终于犯下了死罪：把二千五百年前阿契美尼德帝国<sup>①</sup>看作比此后一千年（即公元六二二年）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被流放到麦迪纳一事更重要的历史阶段。他在伊朗颁布了一部新的、追溯到居鲁士大帝的历法。但是这种“历法挑衅”是短命的，在一九七八年秋天满街示威的压力下，国王不得不立即收回成命，作为首批安抚措施之一。

一再被暴力措施镇压下去的毛拉们的反抗，始终伴随着国王礼萨·巴列维的整个统治时期。当他的首相哈扎·阿里·拉斯马拉——伊朗新保护国美国的一位朋友——于一九五一年在德黑兰市场大清真寺里被枪杀的时候，激进的什叶派领导人插了一手：刺客是市场里的一个二十八岁的木匠，是狂热的宗教派别“誓死献身伊斯兰”组织的死硬分子。他的行动是出于宗教上的垂死挣扎：拉斯马拉曾决定彻底取缔在这个国家里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的毛拉和一切宗教派别。首相死后十二天，国王的教育大臣也在德黑兰大学的清真寺里遇害，一年后副首相也身亡了。甚至什叶派的首领伊姆朱麦也在“誓死献身伊斯兰”组织的弹雨中殒命，因为激进派指责他准备同国王政权及其反毛拉政策大妥协。

<sup>①</sup> 公元前六世纪，居鲁士大帝建立了统一的波斯帝国，称为阿契美尼德朝。——译者

如果没有什叶派的不断反抗，民族主义者摩萨台是上不了台的——一九五三年仲夏，他曾在短期内把国王驱逐出国。在摩萨台的提名下，好斗的阿亚图拉阿布尔·卡塞姆·卡沙尼，一个受所有不信教的人憎恨的极端保守分子，被任命为伊朗议会议长。当他在日益公开活动的共产党人面前感到害怕时，才听任摩萨台垮台。卡沙尼曾说过一句显然表明宗教的政治要求的话。当国王政府半官方地考虑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时，卡沙尼很自信地保证说：“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国王在其统治过程中，曾在所有统治势力的同意下，向古老的伊斯兰传统发动过千百次挑战，其中包括对国内非什叶派中的少数派、尤其是对巴哈伊派<sup>①</sup>日益表示亲善。巴哈伊派是从什叶派分裂出来的，许多成员在国内担任要职。在推翻国王的最后搏斗中，狂热的伊斯兰群众在一九七九年初国王出走前几周里，以罢工和公开的暴力行动向巴哈伊派报复。霍梅尼的追随者号召伊朗城镇中的信徒们，抽走存在巴哈伊派（也有犹太人）主要成员开办的银行里的存款。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初，颇具规模的国家航空公司“伊航”的董事长阿里·穆罕默德·夏德米将军在家里被谋杀。穆斯林的狂热分子杀死了这个巴哈伊派的追随者，与此同时，霍梅尼及其顾问们却几乎每天在巴黎发出呼吁，要容忍和全面保护这个国家的宗教少数派。在这些戏剧性的日子里，甚至连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作为“圣经”所有者、而在宗教斗争中享有保护的犹太人，也

<sup>①</sup> 巴哈伊派是十九世纪伊朗一个强调人类精神一体的穆斯林教派。

——译者

惶惶不可终日。伊朗犹太人社团的代表甚至来到霍梅尼及其追随者那里，诚惶诚恐地想用巨款赎买他们的生存权利。在反对穆罕默德·礼萨的革命日子里，在大街小巷出售的阿亚图拉早年著作的语录使他们万分惊恐。例如：“我们的义务就是揭露（犹太人的）阴谋，直至世界尽人皆知，犹太人及其外国的幕后操纵者密谋反对伊斯兰，其目的在为犹太人统治世界开辟道路。”但是，在即将掌权的关键时刻，霍梅尼却安抚说：将保证异教徒以及无神论者的自由，只要他们不企图阴谋反对伊斯兰人民和伊斯兰国家。

在毛拉们争取使伊斯兰教在伊朗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和文明中发挥作用的漫长而顽强的斗争中，什叶派的中心库姆成了德黑兰这个首都、王都的天然对立面。在库姆，国王政策天天被视为新的挑衅遭到反对，就在这里，一位惨遭杀害的阿亚图拉的儿子、神学家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教冲突。而按照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这种冲突却是不应该发生的。

## 第四章 库姆风云

钻塔和尖塔  
进口尸体,出口毛拉  
真主的金融中心  
遗嘱引起混乱

二十年前,如果汽车载着不戴面纱的妇女穿过圣城库姆的狭窄街道,就会在半路上遭到石块的袭击。这是一个有许多朝圣地的城市。伊马姆礼萨(他是什叶派极盛时期第八世法定伊马姆)的妹妹法蒂玛陵墓所在清真寺的金色圆顶耸立在该城上空。这也是一个过去和现在非常不和谐地混杂在一起的城市。因为,到法蒂玛陵墓前水池旁来进行传统洗礼的善男信女们,甚至从水里都闻到了石池味儿。原来从一九五一年起,这里就开采石油了。

这座位于德黑兰西南一百二十五公里的圣城,坐落在一块不毛之地上。五十年代,它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期生涯。几个世纪以来,它是伊朗什叶派的梵蒂冈;半个世纪以来,它是从三百万人口的德黑兰市到波斯湾沿岸油田以及去伊斯法罕途中的重要铁路和公路枢纽;现在,库姆也同二十世纪最现代化的工艺技术有着直接的联系了。离尖塔和清真寺几公里的

地方，耸立着钻塔。这个城市周围的土地全是黑色的，几年前，一口有开采价值的油井因失控发生了井喷。放眼远眺，卡维尔沙漠的盐碱地就在库姆眼前。多年来，伊朗的特务机关“萨瓦克”，有恃无恐地在这个荒无人烟的辽阔地区，把国王最危险的敌人戮尸灭迹。死者被装进口袋，然后在盐碱荒野上空从飞机里扔下。这里的环境不宜生活，因此这个大沙漠边缘的城市和绿洲特别具有吸引力。对许多人来说，伊斯法罕及其清真寺成了天堂的缩影。库姆的美姿也曾一度名闻遐迩，但这座城市因遭多次侵袭，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前几年，以色列的农业专家曾试图在库姆附近，通过种植抗旱耐碱力特别强的树木，来一米一米地征服沙漠。

库姆人在全国是声名狼藉的。按照伊朗人的判断，库姆商人比历来传说中的伊斯法罕市场中的商人更狡猾、更吝啬。伊朗人熟悉和喜欢伊斯法罕一位布商的一句老话：当有人问这个布商为什么这么刻薄时，他回答说：“因为我曾经在库姆住过一夜！”

直至三十年前，朝山进香的人们还在这个城市里过夜，他们通常到这里呆上两、三天，一再围绕法蒂玛陵墓祈祷着，或者去给自己的亲人扫墓。今天，实际上还可以在库姆清真寺无偿地得到一块家族墓地，虽然墓区的地下墓道已经超出了清真寺的辖区。对什叶派来说，只有这个国家东北边陲的马什哈德城，在其重要性方面超过了库姆。在马什哈德，首先凝聚着对那位神圣的八世伊玛姆礼萨的陵墓的神奇信仰。库姆则由于其在伊朗的位置及其作为伊朗什叶派管理和教育中心所起的作用，而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朝山进香目标。正如伊

27

——继承王位。——译者  
——议和咨询会  
——一九七五年三



朗人所说的：“库姆进口尸体，出口毛拉。”

这个城市及其神学声誉吸引着许多人，年青的霍梅尼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霍梅尼花了将近十年时间，研究伦理学和信仰学，研究神学、哲学和伊斯兰教法律，开始了自己的生涯。在这里，他探寻了信仰的根源，领悟了同尘世紧密相连的宗教万能的奥秘。例如，在财政方面：在这里，大批钱财，还有首饰、地毯和大片田产、小块土地的捐赠地契，每逢礼拜被送到伊马姆的住地，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伊斯兰教的统治者以这个城市为中心，用真主的名义组织了自己庞大的财政和社会机构。这个社会机构，在年迈的霍梅尼和国王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的搏斗中，要比推行国王的改革纲领和社会纲领的福利机构更为有效。信徒们每年献给什叶派教会五千万到一亿西德马克，用作清真寺、神学院、学校和福利事业的经费。而事实表明，还有足够的钱用作巨额罢工基金。

伊朗国家教会在名义上没有自己的财产，它只掌管福利基金。因为，按照伊斯兰教的“五功”规定，每个什叶派教徒都有施舍的义务。这种自愿交纳社会税的范围规定得很详细，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作为“教会基金”，属于教会中央，中央通过全国的阿亚图拉们分发给穷人、先知的直系后裔（赛义德），并向各地教会提供资金。第二种社会税，即“社会基金”，由信徒们自己分发给需要的人，它约占动产的四分之一。除伊斯兰教税收制度的捐款、赠款之外，还有祭品和遗产奉献给伊斯兰教。在献祭品方面，马什哈德由于工作出色，更具有吸引力。每个礼拜，自愿捐赠的钱物被装上载重汽车，运往伊马姆礼萨遗产财物管理中心。在马什哈德，王室机构和宗教机构犬牙

交错：负责保管所有奉献给已经死了几百年的伊马姆礼萨的财物、祭品和礼品的私人遗产管理人，几十年来就是国王本人。

在库姆，神学家霍梅尼从对古书的研究中了解到一种在他几十年后高龄时仍然向往的国家政体：先知穆罕默德的伊斯兰天国。在一千三百年前，先知本人集立法、司法、行政和国家管理大权于一身。他任命大使，签署国书，宣判罪犯，监督刑罚。霍梅尼在库姆的早期著作中曾写道：“这种不朽的制度，到哈里发独揽大权为止，只延续了二百年，这是不合理的。”当时已经是神学教授的霍梅尼，对他虔诚的学生宣称，伊斯兰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神职机构，宗教戒律准确地规定了国家准则。虽然伊朗什叶派梦寐以求的、霍梅尼在库姆长期宣扬的那种世俗和宗教权威的统一——这只能是一种理想——全然不适合伊斯兰教的日常生活和历史，但是，他们始终主张这种统一。即使在今天，摩洛哥的阿拉维王朝和沙特阿拉伯的沙特王室<sup>①</sup>仍然坚持这种主张。按照霍梅尼的说法，伊斯兰国家与“其它国家体制的区别在于，伊斯兰国家的立法权受自真主，而其它君主国或共和国的法律则受自国王或人民代表。国家在伊斯兰教里的意思是，真主托付先知去实现和服从的法律。但是，现在先知已经去世了。他过去是伊斯兰国家的首脑。谁来继承他的任务呢？伊斯兰的法律学者，伊马

---

<sup>①</sup> 一九二六年，伊本·沙特自立为国王。一九五三年，伊本·沙特死后，其长子沙特即位。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沙特阿拉伯大臣会议和咨询会议决定废黜沙特，立费萨尔为国王，是为费萨尔王朝。一九七五年三月，费萨尔被刺身死，其弟哈立德继承王位。——译者

姆。”

在四十年代，霍梅尼还没有料想到自己会成为所有阿亚图拉所公认的伊朗什叶派首席教士，尽管他当时已经历了一段对那些推崇识途老马的伊斯兰教学者来说不同寻常的神学生涯。很早以前——他在库姆学习和任教期间的具体资料很少，而且相互矛盾，不值一提——在来自霍梅因的这个人获得什叶派最高学衔“伊格梯哈德”<sup>①</sup>之前，就已是进步的伊斯兰神学学生眼中的一位公认的导师。他所讲授的伊斯兰伦理课，在库姆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像圣城中那样的神学院，是不能同西方的大学相比的。它们既没有教学计划，也没有考试。学习可以延续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生。学生自己寻找他认为人品和学识出众，而特别希望向其学习的导师。在讨论中，他可以在同学们和学识渊博的神学家面前公开表露自己的理解程度。随着知识和智慧的增长，自己的影响和威望也会相应提高。在霍梅尼的教导下，多年来在库姆涌现了几百个后来在伊拉克、伊朗和其它许多国家工作的著名什叶派神学家。在叙利亚、黎巴嫩、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埃及和苏联，什叶派虽然居少数，但能量很大，特别是在也门，直至六十年代初，伊马姆仍作为国王统治着他们的天国。霍梅尼在库姆还享有作家的盛誉。到一九七九年二月胜利返回伊朗时，他已经把大部分用阿拉伯文写的三十多部神学专著摆上了伊斯兰高等学校的书架了。一九二八年，霍梅尼在库姆结了婚，他一生与什叶派神学

---

<sup>①</sup> 伊格梯哈德的阿拉伯语原意是“勤奋、努力”，转意为受人尊敬、德高望重的法学权威和逻辑演绎家。——译者

家阿加·米尔萨·穆罕默德·塞盖菲的女儿生活在一起，而且白头偕老，并成为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的父亲。两个儿子后来参与了戏剧性事件，女婿阿亚图拉埃什拉吉也是同国王搏斗的核心成员。

但是，除了他的学术经历外，到底是什么东西使霍梅尼名噪一时呢？那就是他对社会问题的个人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显然大大超越了什叶派神学家的本份。早在学生时代，尤其是在尔后的教授时代，他已经是一位为社会上的弱者而战的热情战士，这一点在当时已经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后来，他的学生不仅赞叹他讲课的思想深度，而且推崇他着眼于全人类的观点，除了钦佩他的学术和政治水平外，还敬重他本人的道德品质。霍梅尼谦逊禁欲，身体力行，直至高龄他仍然忠于这个原则。

在五十年代，他的名字对于广大伊朗公众来说实际上还是陌生的。但是，关于这个从事社会活动的教士的第一批机密材料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就送进德黑兰王宫了。在一九七八年底、一九七九年初对霍梅尼个人崇拜的浩大声势中，他的追随者们宣称，老国王礼萨早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就企图阻止霍梅尼讲课了。但是，今天再也见不到这方面的书面证据了。

当一九四一年国王在俄国人和英国人的压力下逊位时，霍梅尼在库姆又重新坐到打字机旁，写起他的第一本纯政治性书籍：《揭露秘密》。在这本书里，他非常尖锐地批评了伊朗国内文化、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弊端，以及危害伊朗人民的一系列国际阴谋（他指责那时正在南非流亡的老国王参与了这

些阴谋)。当时，这位年方四十，已经获得阿亚图拉头衔的宗教造反者，首次严厉地提出了“反抗暴君是穆斯林的首要职责”这个论点，这个论点在以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他的政治斗争口号。这个口号矛头所向，不仅针对德黑兰王室，而且直指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他宣传在传统根基上缔造一个“民约而治”的伊朗。

这基本上是什么派神学家们的老方案：反对外国势力的斗争，赋予毛拉们以一种进步的形象；而反对本国改革的斗争，则为他们涂上一层传统保守的色彩。霍梅尼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决不能凌驾于宗教之上。一切违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实际上都是非法的。但是，宗教领袖也不应谋求占有政府权力。他毫不隐讳地写出这一切，无比鲜明地摆出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但是，他也不必用这些话去同王室进行大规模的个人冲突。那个刚满二十二岁的新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另有别的伤脑筋的事儿；他必须经受一场对外国占领者的生死斗争。在事关君主政权生死存亡的严重对抗中，住在大学城库姆的那位神学家还只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配角。虽然他作为思想权威在群众中享有与日俱增的声誉，但是，直至一九六一年时来运转之前他实际上始终是这么个配角。

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阿亚图拉赛义德·阿加·侯赛因·博罗吉尔提在库姆一直是公认的什叶派首席教士，拥有表明其知识和智慧超过全国所有神学家和信徒的称号“效法的源泉”。他是一位安详、年迈的教士，而且肯定不是国王的固执的伊斯兰对手。但是，当他一九六一年享年八十六岁去世时，国王下了一着阴险的妙棋，试图削弱库姆作为反对国王政

策的抵抗巢穴的作用。他故意给伊拉克朝圣中心纳贾夫的阿亚图拉夏希·穆辛·阿尔哈基姆拍了一份哀悼博罗吉尔提逝世的唁电，希望以此把一个新的什叶派领袖确立在伊朗边界的那一边。他想把一个不会给他的统治权力制造麻烦的人推举为博罗吉尔提的继承人。

但是，从伊朗全国各地云集库姆参加葬礼的阿亚图拉们，对国王的旨意却置若罔闻。按照老传统，谁在打开的墓穴旁担任领柩人，谁就是继承死者精神遗产的第一个候补人。博罗吉尔提必须在一天内安葬。彼时彼刻在库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秘密。但可以肯定的是，有许多阿亚图拉显然在盘算当继承人，首先是土生土长的阿塞拜疆人卡希姆·沙里亚特-马达里，然后是来自马什哈德的穆罕默德·哈齐·米拉尼，以及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霍梅尼的追随者认为，博罗吉尔提死后，一个由政治上更积极的什叶派领袖当家的时代来临了。死者对政治的厌倦才使国王得以在八年前比较顺利地推翻他的首相摩萨台。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观点，因为处于领导地位的毛拉们起初支持摩萨台，但在他同国王搏斗的最后阶段却让他孤军作战。有些人认为，最终反对他的是当年五十九岁的霍梅尼的“少壮派”。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葬礼后，教士们是在没有明确表示谁是继承人的情况下离开库姆城的。对于什叶派来说，这也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事。在他们的历史上，新的领袖人物通常要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能产生，而且往往有许多阿亚图拉怀有这种要求。

从霍梅尼家族中，传出过一件关于一九六一年库姆事件

的轶闻，但其正确性无法证实。阿亚图拉们在葬礼前坐在一起，讨论今后的一切怎么办。显然，在关于将来由谁起主要作用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于是，他们请霍梅尼去查找死者的遗嘱。他拿来了装在一只小匣子里的字条，开始诵读，内容使他本人和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都大吃一惊。“我还没有到要从你们当中推荐某人当我的继承人的阶段”，字条里是这么说的。然后接着说：“但是，如果我今天参加你们的聚会，而且你们当中某个人真的要知道我的意见，那么，我不反对被选出来诵读这几行字的那个人……。”

伊斯兰问题专家认为，这件轶闻并不一定可靠，它和什叶派关于领导其教派的概念格格不入。但是，如果真有其事，那末它就说明了为什么霍梅尼从一九六一年起已经公开以众望所归的伊马姆的正统解释者和代表自居，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伊朗的阿亚图拉长期以来不承认霍梅尼的这一要求。他在群众中明显增长的威望和声誉，必然非常难于得到教会最高层人士的承认。即使是在他凯旋归来的时刻，也无法完全掩盖他们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

总之，在一九六一年的库姆，人们似乎对霍梅尼还怀有许多疑问。但是，不久他就向这个国家的信徒们和统治者显示，在他身上存在着多大的力量。而他的对手，把这种较量变成血腥冒险的那个对手，就是孔雀宝座上的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 第五章 冤家国王

从后门入宫登上宝座

国王的傀儡戏

居鲁士反对穆罕默德

流亡大演习

要想了解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政治生涯的开端，还得回过头来从他年方二十的时候讲起。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人入侵俄国。当时神学家霍梅尼刚刚获得伊斯兰教会的最高职称“伊格佛哈德”。在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德黑兰的老国王礼萨才真正认真地对待向来体弱多病、动作有点迟钝、自幼就有内向性格的王储穆罕默德·礼萨。身材高大的独裁者，把他那几乎从来就看不到眼的儿子领到地图前面，以手杖当指图棍给他讲解世界局势，特别是伊朗所陷入的绝境。如同在其历史上经常遭遇的那样，这个伟大的国家再次面临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危险，再次面临俄国和英国这两个宿敌的染指。英国人要支持苏联抵抗希特勒军队，但英国人的后勤供应线只能借道伊朗。

老国王告诉年方二十的儿子，说国家面临军事占领的危险。但是，当儿子天真地想说服父亲全力反击南北两路敌人



时，礼萨国王却挽着王储的手，把他带到正在等候他们的首相弗鲁格希那里，让首相向他讲明俄、英两军的实力。国王和首相心里明白，抵抗是毫无意义的。最后，儿子也信服了。礼萨国王忧郁地告诫这个年青人说：“你得作好准备，一年之内我也许不再坐在王座上了。”这次谈话竟成为一个漫长政治生涯的起点。

事实上，令人担忧的事件发生得比这位身材高大的独裁者所预料的还要快得多。一九四一年八月底，俄、英两国分别从阿塞拜疆和伊拉克侵入伊朗。五天之后，伊朗被分割成三个地区。只有沿首都德黑兰周围的伊朗中心地区的一条狭长地带，包括圣地库姆，仍在国王的统治之下。四个星期之后，占领者向此时已身心俱摧的独裁者发出了决定性的最后通牒：这位政治上独断专行、文化上愚昧无知的礼萨必须放弃王位，最迟不得超过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七日中午十二时。国王根本不用等这么长时间，他提前二十四小时就宣布退位了。如果此时对伊朗君主制度还能使用“统治”这个字眼的话，那么，这个统治者的角色实际上一夜之间就落到了他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头上了。到目前为止，他顶多只是个以花花公子和薄情郎闻名国际的人物。礼萨退位后，巴列维王朝在那些戏剧性时刻里居然没有很快覆灭，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一个政治奇迹。九月十六日，议会得悉国王退位消息的那天，老国王下令关闭了议会大厦的所有大门。连那些在大厦走廊上被老国王提前和自愿退位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的英、俄外交官，也不能离开大厦或打电话。因此，他们无法向世界宣布伊朗君主制度的覆灭。与此同时，王储正乘坐一辆破旧的汽车，从父王

的王宫绕道驶向议会。他乔装打扮，戴着鸭舌帽和墨镜，蹲在两排车座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后门溜进议会大厦。在表决厅狭长的过道里，穆罕默德·礼萨脸色苍白，神态不安，匆匆忙忙换上礼服，接受了他父亲的宝剑和佩带。当他在议会宣誓登基时，站在阳台上的英、俄外交官怒不可遏。他们又违心地默认了一个代表伊朗民族统一的象征。

但是，这位在瑞士罗塞寄宿学校受过教育的、年轻的“王中之王”，在伊朗尔后的岁月里所能起的作用却是够可怜的。为了当王子，而不是当外交官或军人，他曾接受过相应的教育。但是，他的知识远远不足以应付因列强争夺而造成的江山支离破碎的局面。后来他曾说：“当登上宝座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已陷入疑难问题的汪洋大海之中。”由于年轻和缺乏经验，他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对德宣战。两个月之后，他不得不坐在斯大林、邱吉尔和罗斯福这些政治老手面前进行谈判。大战结束以前甚至以后的时期，对这个国王来说是一个经历无数次政治挫折的艰苦学习过程，但豪华的私生活却使他尚能聊以自慰。

在这段时间里，他作为统治者的地位就象伊朗在国际上的地位一样可悲。后来，礼萨·巴列维在谈起那段岁月时曾自我解嘲地说：“我那时是一个由别人牵线的傀儡。”当国王慢慢下定决心，在列强争夺伊朗的角逐中，把宝押在美国这张牌上时，一种政治复兴的初期微弱征兆才趋向明朗化。

伊朗内政形势暂时也并不比外交形势更好些。由于普遍受到无政府主义的鼓动，不仅那些早先被老国王血腥镇压下去的各部落和少数民族开始重新抬头，甚至连早已被推翻的

恺加王朝的最后一批遗老和大臣也企图重新上台。在国王二十五岁生日那天，由俄国支持的伊朗共产党人竟然控制了各条大街。无数政治派别和政党麇集起来，进行地下活动。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经过艰苦谈判达成的撤出占领军的协定开始执行时，俄国人却首先向相反的方向——南部挺进，占领了更多的地区。当国王为此而大声疾呼时，莫斯科却提出撤军的先决条件：要求缔结一项实际上是把伊朗沦为一个保护国的条约，并要求伊朗承认以大不里士为首都的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猜测苏联想把手伸向油田的华盛顿，尚能助伊朗一臂之力。杜鲁门总统迅速以大规模的部队登陆行动威胁苏联人。斯大林让步了，苏军终于撤退。国王打垮了在大混乱中产生的、位于伊朗西北部马哈巴德的库尔德共和国以及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对国王来说，本该数十年不变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即伊朗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从此奠定了。可是，这一发展在国内，特别是在毛拉当中，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那时，在伊斯兰大学生中间已享有很高威望的阿亚图拉霍梅尼，已开始进行反对把伊朗的利益出卖给外国的宣传。在霍梅尼的态度里早已存在着一种一触即发的混合物，他既怀有厌恶朝廷的心理，又有不堪屈辱的民族主义情绪。

国王礼萨原先就是打着“伊朗人的伊朗”这面旗帜发迹的。他以伊朗自决的名义发动了反对恺加王朝的政变（恺加家族原属土库曼人，在他们统治的最后几年里，他们这些人把国家的财富主要挥霍在欧洲的各个疗养地和赌场上，挥霍在维也纳和巴黎最上流的交际场所）。但如今，他的儿子和继承

人却紧紧地依赖着美国，这在毛拉们看来，足以表明他儿子是民族事业的叛徒。一九四六年，因苏联拖延撤军，国王寻求并取得与美国的首次密切联系，这个关系后来主要通过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无条件地改造伊朗而得到加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个政策实际上就源源不断地向神学家、社会改革家和民族主义者霍梅尼提供了各种把柄。

但是，还有某种东西使孔雀宝座上的国王一再成为教士们的众矢之的，那就是国王对王室正统性的非常强烈的历史性需求。他的父亲穆罕默德·礼萨早已破坏了伊斯兰教的传统，从波斯古代统治者那里引用了巴列维王朝的名称。“巴列维”，从前巴息人<sup>①</sup>时代的土话对统治者就是这样称呼的。第二代国王仍旧忠于这条路线，当他后来于一九七一年把全世界的注意力引向作为其统治的精神文化基础的波斯波利斯时，他按照过去阿契美尼德国王居鲁士大帝的做法，给他自己的王太子取名为礼萨·居鲁士。

国王的联姻政策也适应着这种对王室正统性的需求。为了最终能向全世界证明，牧童出身的统治者之子也能名列伟人，国王礼萨在位时就亲自安排了当时的王储穆罕默德·礼萨的第一次婚事，给他娶了埃及国王法鲁克的妹妹法芙齐亚。这种高攀引起了埃及王室的极大愤慨，因为这样势必会把千百年悠久的王朝传统与一个暴发户等同起来。这段姻缘不久就告吹了，原因之一就是那个埃及女人并没有如愿以偿地生个儿子，而是生了一个女儿。

---

<sup>①</sup> 巴息人是波斯的一个游牧民族。——译者

离婚后，这位年仅三十岁的国王似乎把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一日视为其统治中一个更活跃的新阶段的开端。这一天，他在德黑兰大学的台阶上，因反应极为迅速，无比幸运地避开了一次暗杀。原来一名摄影师从离他很近的地方打开照相机，向他开了五枪。后来，穆罕默德·礼萨曾多次把这个事件称为他一生中的一个决定性新开端；这次挑战使他信赖自己的勇气，相信真主的力量在他一边。

这次暗杀事件后，国王加紧政治控制，通过取缔共产主义的人民党，大胆地在内政方面发出首次大挑战。与此同时，他开始实施大逮捕，限制新闻界的权利，并迫使议会亦步亦趋。一九五一年，德黑兰王宫里再次举行婚礼，在挑选王后时，政治又起了作用。王后叫苏拉娅，出身于分布极广、影响很大的巴赫蒂亚尔氏族的一个酋长家庭。国王希望与她的结合还能够实现王室同国内各传统势力派别之间的和解。当时，苏拉娅在那三个与一九七九年决定伊朗君主制命运的决战有重大关系的人之间，拉扯着一种不同寻常的个人关系。通过苏拉娅，国王不但同他所任命的最后一个首相沙普尔·巴赫蒂亚尔攀了亲，而且转弯抹角地同他的强大对手阿亚图拉霍梅尼也沾亲带故了。

但是，当时新娘和新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婚后不久，夫妇俩就操别的心去了。一九五一年，穆罕默德·摩萨台（他的母亲是恺加王朝的公主）被任命为这个国家的新首相。这也是国王采取的谨慎措施之一，目的在于把受王室控制的权力交给国内有影响的政派，以此来安抚他们。在巴列维家族的统治下，法律上是不允许恺加家族的人继承王位的，因此只

能见机行事，给他们的亲属授以高官，以此来软化他们。国王穆罕默德·礼萨仅仅任命了这个贵族家族中的三个人为首相（阿拉姆、阿米尼和摩萨台）。摩萨台是一个热情的爱国者，他为国家的发展斗争着，但任何地方也没有发现为此所必需的资本。伊朗仅有的唯一财富并不控制在政府手中，石油实际上统统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因此，他的纲领是简单明了的：“伊朗人民地下宝藏有的是，但被一条巨龙给困住了。赶走外国人，结束贫困，伊朗归伊朗人。”

摩萨台是被仇外浪潮推上台的。这股浪潮是在全国各地的清真寺，特别是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和大不里士的清真寺的一再说教下煽动起来的。一九五一年五月，国王违心地批准把多年来作为西方经济统治可恶象征的“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英国人起初哑口无言，尔后立即表现出一个大国通常的反应：伞兵空降塞浦路斯，在波斯湾游弋的英国舰载部队处于戒备状态，一个英国空军联队在伊拉克空军基地上待命起飞。在这次同西方的对峙中，摩萨台开始排挤了犹豫不决的国王，演出了一场鼓舞整个伊朗、但却触犯整个世界的违背理性的戏剧：摩萨台在议会里借各种机会哭哭啼啼，甚至昏倒在地；穿着睡衣接见怒气冲冲的西方外交官；每次演讲时都在议会讲台上摆满了饼干盒、茶叶罐和牛奶瓶。

毛拉们完全站在他一边。为了保护伊朗的石油，一位政治上的前沿斗士阿亚图拉卡沙尼甚至愿意组建一支二千万伊斯兰战士的大军。奇怪的只是：在伊朗的民族主义分子和什叶派最上层的教士团结一致反对英国殖民势力的日子里，却没有从阿亚图拉霍梅尼嘴里听到过任何著名的话语。那些日

子所发生的事件，在尔后的发展中几乎可以视为一九七九年事件的前奏，但霍梅尼在这里面所起的作用至今仍然不明不白。

在此期间，国王和首相闹翻了。国王认为，摩萨台的冒险把戏是致命的，因为英国政府不但威胁伊朗政府和所有伊朗国有化石油的买主，而且还指令其海军扣留和没收公海上装有伊朗石油的外国油船。

但是，火冒三丈的摩萨台得寸进尺，竟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同苏联签订一项将向苏联提供波斯湾沿岸机场和海军基地的条约。然而，这样一来，摩萨台的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许多上层毛拉如今感受到了一种来自东方的新殖民主义的威胁，于是他们撤下了摩萨台和伊朗共产党人，使之成了孤家寡人。一九五三年夏季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国王作出最后的努力，罢免了强大无比的首相，从而引起了德黑兰大街上疯狂的示威游行，其结果实际上又一次使摩萨台上了台。于是，穆罕默德·礼萨丧魂落魄，半夜三更带着苏拉娅登上轻型运动飞机，外出流亡。当时外国报刊用《君主制度在伊朗完蛋》、《国王从孔雀宝座上下台》的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一事件。这些标题在二十六年后倒真的变成了现实。

在这种似乎一切都完了的时刻，一个五十多岁的美国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金·罗斯福少校帮了国王的忙。不到几天工夫，他就把大批钞票分发给伊朗的突击队，动员各部队准备哗变，并亲自从敞篷汽车里向外抛钱，要求那些情绪激昂的人“你们跟着我喊：‘国王万岁！’”这时，国王正在罗马的“豪华”饭馆吃午饭，侍者正端上龙虾冷盆和冻鸡。一名记者冲进

餐厅喊道：“陛下，他们胜利了！”国王抬头瞧了一眼，说：“我早就知道，我的人民是热爱我的。”

礼萨·巴列维国王当时就这样行色匆匆地回到德黑兰。美国人拯救了他，但是他们现在要求君主实行真正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作为对他们雪里送炭般贷款的酬报。石油仍然国有化。穆罕默德·礼萨凭着重新滚滚而来的金钱许愿说，保证为全体人民谋求新的幸福。在返回德黑兰时，国王说：“以前我是一个通过继承而掌权的国王，但现在我是一个选举出来的国王。你们的态度使我可以相信，你们选举了我。”若干年后，人们才认识了这位判若两人的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他在尔后近二十年中成了国际政治的中心人物。这个君主许下了“自上而下闹革命”和“伟大文明”的诺言。这个自命不凡的独裁者多年来趾高气扬地宣称“伊朗是一个人说了算”。他凭借滚滚而来的石油收入，怀着迷信先进、追求先进的心情，把最现代化的工艺技术引进本国。这是一种孕育着两大致命弱点的憧憬未来的热情：既未考虑到伊朗的现实，也未考虑到政治的上层建筑。国王既害怕要求更多民主的所有左派，又惧怕象霍梅尼那样的抱怨民族资本受到损害和传统生活方式遭致破坏的宗教领袖。国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毫不妥协地强令自己的国家加速进步。对此，他曾满怀信心地说：“民主在古希腊和现代化工业国家里并没有起什么作用，那末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引进到我们这里来呢？”

就这样，在没有反对党和工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一个具有质询能力的议会的情况下，国王在此后的岁月里推行起那些人民既不理解，又不支持，也不参加的经济改革和社会



改革。他生怕石油带来的利益行将结束，遂于六十年代初迫不及待地掀起了“现代化伊朗运动”，当他发现几乎无人和他跑在一起时，为时已晚。精疲力尽的人民早就远远地落在后面了，他们又重新转向历来站在他们一边的那些毛拉们。对于其中之一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来说，现在，即一九六三年年初，殊死对抗的时刻已经开始了。

## 第六章 首次决斗

德黑兰上空的乌云  
“杀死独裁者！”  
士兵们冲击清真寺  
在狱中的人民英雄

当伊朗国王同教士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殊死决斗开始时，伊朗却远未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另一个事件几乎完全遮盖了德黑兰的流血事件。一九六三年六月，罗马教皇约翰尼斯二十三世突然逝世。人们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为死去的天主教首脑举行如此隆重的葬礼。因此，在欧洲人眼里，这两个人长期激烈冲突中的首次流血斗争几乎是悄悄地进行的。只有用历史的眼光才能清楚地看出，德黑兰在一九六三年上演的这场戏与十六年后使全世界为之窒息的那一场戏几乎完全一样。因为国王同霍梅尼一九六三年的这次角斗就已经引起了大规模的游行和大规模的死亡。

在德黑兰北面的萨阿达巴德，耸立着国王的夏宫。宏伟的首都，从这里向厄尔布尔士山脉荒凉的山坡延伸。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国王在这里凭窗远眺，在他面前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这一天，乌黑的浓烟正从城市的低洼处升起，浓烈

而具有威胁性地笼罩着统治者及其宠臣们和外国阔佬们的豪华别墅和花园上空。这些外国人在远离这座爆炸性城市的喧闹和拥挤的这个地方为自己建立了第二故乡。警察局和特务机关“萨瓦克”的头头，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国王传来一些非常糟糕的消息。城里的大市场已经烈火熊熊，市中心大片地区着火了。这就是说，人民正在暴动。

三年半前，国王第三次结婚，王后是法拉赫·迪巴（她与老恺加家族有远亲关系）。摩萨台在台上的时候，国王依靠严厉的警察措施的保护，才得以免遭公开暴力行动的殃及。但是在这一天，这位四十四岁的君主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而临事关巴列维王朝命运的时刻。国际舆论认为，国王正处于政治权力的顶峰。对君主制度的大规模进攻，并没有使他完全感到意外。这次进攻是从国王几个月后才看出其危险性的一个角落里发起的，躲在这个角落里的主谋，就是年已六旬、来自库姆的霍梅尼。他要与伊朗的神圣国王进行可怕的清算，他煽动人民投入一种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的狂热斗争中去。

在一九六三年的伊朗，凡是走上街头挥拳高呼反对国王口号的人，都必须作好最坏的准备。“国家安全情报署”，简称“萨瓦克”，对于三千多万伊朗人来说，它是害怕和恐怖的同义词。自一九五七年二月成立以来，恐怖史便伴随着它的历程。“萨瓦克”成了人们最爱谈论的恐怖话题之一。多年来，它随意捕人，非法刑讯，残酷折磨，以此镇压任何对国王统治的反抗。连美国神通广大的情报机关“中央情报局”，有一次在评价“萨瓦克”时也说：“这是一个在特定范围内进行工作的职业

性组织。不管怎么说，它是中东这类组织中最好的。它当然有不足之处，但却是有效的。……”

早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当国王号召人民就新的土地改革进行投票时，霍梅尼就对国王的政策发起首次闪电攻击。这个总共十九项的改革纲领名曰“白色革命”，是国王政策的核心。除了别的内容，这一纲领主张剥夺地主的土地。对于霍梅尼来说，这种政治暴行是完全违反伊斯兰教的教义的，他要求大家起来抵制。国王宣传机构后来曾致力于戳穿他们所认为的霍梅尼的真实意图，即所谓这是毛拉们对失去寺院香资所表示的愤慨。

当投票以国王获得绝对多数结束时，来自库姆的教长霍梅尼宣布连续举哀四十八天。伊朗的新年佳节正值举哀期间。因此霍梅尼告诚信徒们，绝对不要庆祝新年。三月二十二日，当倔强的阿亚图拉再次主持致哀仪式，猛烈攻击国王的时候，事态才变得严重起来，并出现了流血事件：伞兵部队袭击法齐亚清真寺，闯进祷告厅，以暴力镇压任何企图反抗的人。这一事件足以使大多数上层教士感到，往后还是不要介入政治为妙。为了避免全国范围的骚乱，国王不久又下令释放了这位狂热的教士，据说还附带地警告他：“除了自由、独立和外国势力的作用这三点之外，你可以谈论一切。”霍梅尼的回答却是：“但除此之外，我还要谈些什么呢？”他拒绝了阿亚图拉哈基姆请他最好迁居纳贾夫的邀请。“如果我们大家都走了，那么在这个国家里就没有捍卫伊斯兰教的人了。”他对库姆的信徒们自豪地说：“我准备让刺刀刺透我的心脏，但决不向暴君屈服。”在人头攒聚的追随者面前，霍梅尼想从国王

那里知道，是不是他亲自派伞兵到库姆来的，“他应当回答是或者不是。”国王是否因为要在城门前钻探石油，或者因为要与以色列秘密勾结，而要把库姆的宗教领袖处死？

国王忐忑不安，他害怕六月四日这个什叶派最大的举哀日。因为这一天，教徒们要纪念真主穆罕默德的外孙伊马姆侯赛因，他是被哈里发贾西德下令杀害的。这是整个什叶派世界对过去和现在的政治暴君的历史性愤怒达到高潮的一天。这也是宗教狂热分子，主要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城侯赛因陵墓，组织鞭笞己身以赎罪的教徒们游行的一天。在这一天，虔诚的信徒们出于内心痛苦要鞭笞己身。

对霍梅尼来说，这个纪念活动是发动新攻势的理想时机，而这个机会恰恰是国王自己提供给他。国王曾经把伊斯兰宗教界污蔑为“寄生虫”。关于他的敌人，他曾说过一段非常恶毒的话，“宗教领袖们在他们自己的粪堆里打滚，他们象蛆虫一样在污泥浊水里蠕动。你们应该象摆脱野兽一样摆脱这个污秽肮脏的阶级。无论是谁，无论他披着什么样的外衣，要是他自己还不觉醒的话，那么正义的拳头就要象闪电那样打到他的头上！”

六月四日，这一天是星期四，霍梅尼发起正面进攻，进行报复。他问信徒们，究竟谁是寄生虫：“是那些一无所有而且也不想有的人呢，还是那些把百万家私转移到国外去的人呢？”他还抨击国防费用方面的挥霍浪费，抨击营私舞弊和文化堕落。霍梅尼一手拿着伊朗宪法，一手拿着古兰经，咒骂说，暴君亵渎了这两件东西。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说教中（讲话稿已事先分送到全国各大清真寺并布置同时宣读），霍梅尼没

有直接点国王的名，他只说当今的“恶魔”和“哈里发贾西德”，但清真寺的所有信徒心里都十分明白，这是指谁。他讲话结束后，人们涌向库姆街头，齐声高呼：“打倒贾西德！”“杀死独裁者！”这是国王在一九五三年短期流亡后绝不希望再听见的口号。当特务们向国王报告了库姆所发生的难以置信的事件后，他犹豫了几个小时。一些顾问认为，与毛拉进行大规模的冲突是很不明智的，还是尽可能避免冲突为妙。但是这个建议完全违背国王当时为自己和他的王朝所制定的安全方针。

国王下令逮捕在库姆重新登台、并终于崭露头角的那个人。政治要求现在也增加了他的宗教威望。这里，国王所面临的敌人主要还不是神学家，而首先是一位要反对“不公正的、非法的统治者”的人民领袖。而且这位人民领袖又表现出无所畏惧和勇于挑衅的姿态。

当霍梅尼被捕并在严密监护下押往德黑兰附近的伊希拉塔巴德兵营时，骚乱才真正爆发了。骚乱的群众从圣城出发，涌向德黑兰，要去推翻国王。个别原先害怕会遭到国王秘密警察逮捕的人，在看到愤怒的群众团结得越来越紧密时，也显得不那么害怕了。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首都也变成了战场。愤怒的人群拥挤在被烧毁的汽车、遭到破坏和洗劫的商店、被毁坏的政府机关以及成了废墟的警察局之间，他们在霍梅尼的宗教狂与冷酷的杀人狂之间摇摆着。这位叛乱教士的成千上万张巨幅画像严肃地俯视着一片可怕的景象：在这宗教狂的热潮中，连不戴面纱的妇女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也被石头砸死。参与这次国王和霍梅尼之间的首次流血冲突的，绝不仅仅是少数以仇恨和攻击来猛烈报复国王政权压迫的狂热分

子。不，人群中同时也有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几个小时后，这股怒潮几乎席卷了这个伟大国家的所有省分。

然而，德黑兰始终是这场悲剧的主要舞台。现在国王后悔没有听顾问们的话。“逮捕霍梅尼是很容易的，他手无寸铁，”顾问们说，“但释放他可就成了难办的事，这意味着危险地丧失威信。”当人群开始冲击无线电广播中心时，国王向他的卫队下令开枪。坦克和装甲车驶向人群，战斗开始了。狂热群众的反击自行瓦解。冲天大火的浓烟很快便遮掩了德黑兰的天空，战斗在烟雾中继续着。

当时是死了几百个人，象伊朗报纸援引警方报告所写的那样，还是死了近一万人，象外国新闻界所估计的那样，至今谁也搞不清楚。国王起初很不冷静。当时看来他对霍梅尼的政治威力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他断定在骚乱的幕后除了阿亚图拉霍梅尼之外，一定还有其他人在操纵。他公开指责纳赛尔的埃及搞政治颠覆。但在私下他却认为前特务头子泰穆尔·巴赫蒂亚尔在插手。巴赫蒂亚尔作为五万伊朗特务的实力派头子，曾力图独揽政治大权。国王于一九六一年六月把他解职，并把他流放到瑞士去。骚乱开始的前几天，他确实离开了瑞士，有人看见他在伊拉克邻近伊朗的国境线上出现过。但是，霍梅尼和巴赫蒂亚尔两人在伊拉克流亡期间，直到很久以后才接触过一次。而当一度是伊朗所有拷问者的万能头子巴赫蒂亚尔试图劝说霍梅尼共同合作时，却遭到这位阿亚图拉的拒绝。他说，他虽然同前“萨瓦克”头子有着共同的目标，即推翻国王，但政治上走的不可能是一条道。

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当德黑兰市场处于一片火海之际，

国王虽然还能够把他恨之入骨的霍梅尼囚禁在牢房中，但他很快就发现，他不能象对待他的许多其他对手那样把这个新的挑战者长期关押在铁窗后面，因为此人的群众基础太强大了。他委托前国王卫队司令、“萨瓦克”现任头子内马图拉·纳西里将军从中斡旋。他是霍梅尼家的一位疏远多年的朋友。国王向他的阶下囚提出的第一个建议，证明穆罕默德·礼萨对待这个教士何等谨慎小心：“如果霍梅尼把他的住地从库姆迁往马什哈德（伊朗第二圣城），他就可以获得自由。”然而，这位阿亚图拉却冷若冰霜地反击道：“伊斯兰教的教义比国王的权势要悠久得多，我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

此后国王又试探了一下，这一次用的是威胁。他通过纳西里转告说：“别让我穿上我父亲的靴子。”在伊朗，这句话不仅是野蛮独裁政权的一个流行代用语，而且使霍梅尼回忆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老国王礼萨的靴子踩在库姆清真寺的地上轰然作响的情景。这位阿亚图拉怒骂着回答：“对你来说，你父亲的靴子大了好几号呢！”

这次对话以后，怒发冲冠的国王决定采取新的策略。首先，他不得不释放霍梅尼，以安抚群众。但是，特务机关“萨瓦克”已经受命制订一项解决霍梅尼问题的长远计划。十六年以后，内马图拉·纳西里从霍梅尼那里没有得到这次失败的调解的任何酬报，却作为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头号国敌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夜间在德黑兰被就地枪决了。



## 第七章 辗转流亡

黎明前的绑架

波斯人大街上的陌生人

“缠头行动”

打猎事故

礼萨·巴列维国王在自己的三十六年统治中险遭刺杀暗算的次数，开出单子来是很长的。然而，国王在统治期间所处境死的人，排起队来则还要长得多。不管怎样，这个孔雀宝座上的人，比他所有危险的敌人是活得长久些。其中只有一个人，多年来一再公开为谋杀暴君的行为辩护，却不知为什么一直幸免于难，即使在流亡期间也是这样。此人就是阿亚图拉霍梅尼。那时，即使冤家对头跑到国外，国王要想很快把他干掉，也只需派遣其特务机关的专家到国外活动就够了。约在一九七〇年夏末，前特务头子、尔后的阴谋篡位者、国王死敌泰穆尔·巴赫蒂亚尔，在伊拉克的一次“打猎事故”中丧命。事后，国王毫不隐讳真情，态度十分坦然，若无其事地微笑着确认说：“这是我们‘萨瓦克’干的。”但是，对那位自一九六三年三月起越来越无情地咒骂伊朗统治者的什叶派领袖霍梅尼，国王却连一根毫毛也没去碰他。

关于个中底细,目前至少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一九七九年二月才出现,它把一九六三年的事件描绘成一幅全新的、但对什叶派来说却难以想象的景象。霍梅尼胜利归来后,伊朗报纸曾揭露说:当时国王已悄悄地把这位对手提交特别法庭判处死刑。消息传到什叶派教士那里时,包括沙里亚特—马达里和米拉尼在内的杰出的阿亚图拉们,纷纷汇集到德黑兰南面的阿卜杜尔·阿齐姆王清真寺,作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决定:选举霍梅尼为伊马姆。这样,这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便可凌驾于法律之上,免遭国王的报复。

这种说法并不可靠,主要是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伊朗的神学家们本身就亵渎了神明。对他们来说,伊马姆毕竟是未来世界众望所归的领袖,即救世主。许多阿亚图拉直至政治斗争的最终阶段对霍梅尼所持的批评态度,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报道失实。这种揭露当然也有一条具体的论据:伊拉克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即霍梅尼从纳贾夫去巴黎三天后,概述了这个伊朗人十五年的流亡生涯,他说:“霍梅尼是一个在国内被判处死刑的伊朗公民,他是作为流亡者来到伊拉克的。”然而,一九六三年事件的直接参加者却没有出来协助彻底揭开这一秘密。

熟悉国王的人在寻找国王对冤家霍梅尼持克制态度的原因时,主要是按一般逻辑来推理的。早在一九六三年霍梅尼就已拥有不同寻常的威望,处死这样一位什叶派首领无疑会给国王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尽管这位倔强的阿亚图拉实际上长期不抛头露面,但在这些年,他始终是国王的唯一真正危险的心腹大患。支持他的并不是什么部队,也不是什么特

务机关的个别军官或地下党派,越来越支持他的是全体人民。因此在国王看来,一个活着的霍梅尼不管怎么的终究还可捉摸,但是一个死去的英雄则肯定会成为一个无法控制的殉教者。而波斯恰恰具有乘纪念民族殉教者的机会随时激发起血腥权力斗争的悠久历史。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在一九六三年六月的那些日子里终于决定采取不流血的长远解决办法,上面那些考虑可能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浓烟在首都德黑兰上空渐渐消散,死者亦被埋葬时(据传仅在库姆就死了三千名身穿白色丧服去迎击士兵的毛拉),霍梅尼又获释出狱了。为了平息群众的愤怒,国王甚至命令他那位几个星期以来曾通过广播电台激怒毛拉们的宣传大臣塔瓦佐里退休。

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的平静。十月份,霍梅尼又大骂起议会选举的骗局,因此被软禁起来。他在王家看守的严加看管下,在德黑兰北部的谢米兰呆了八个月。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他又重新露面,而且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狂暴和倔强。这一次涉及到美国人。一九五九年三月,国王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订了一项美伊安全条约。后来约翰·F·肯尼迪进入白宫,准备继续承担这个义务,当然附带一定的先决条件。他要求给在伊朗的美国军事专家以治外法权,不受该国法律的约束。此外还应象在美国的一个岛屿上那样生活。谈判持续了数月之久,但最后国王还是同意了。这就是为什么使霍梅尼如此愤怒的原因。一个魔鬼正在这里使昔日那个丧权辱国的“投降法”死灰复燃,伊朗人民又要屈服在一个外国的桎梏之下了。霍梅尼怒吼道:“伊朗议会为什么准许美国官兵逃避对他们一切罪行的惩治?为什么连他们犯下最严重的

罪行，甚至犯了反对国家首脑或宗教领袖的罪也是如此呢？为什么伊朗法庭的裁判权让他人骗走了呢？为什么为了仅仅利息就高达一亿美元的两亿美元贷款，就使我们自己的主权一钱不值呢？为什么我们要为嗟来之食出卖我们的国家呢？”

这就是国王下令对霍梅尼采取“特别行动”的时刻。这一行动显然是蓄谋已久的。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一小队军警由一名将军率领，在天亮前设下埋伏。库姆时间凌晨四点左右，这位阿亚图拉从住所前往清真寺做晨祷。士兵们在惊慌失措的随从眼前包围了这个步履蹒跚、银须冉冉的老人，把他塞进一辆军用卡车，飞速驶向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德黑兰—曼赫拉巴德机场，却没有告诉被劫持者此行的目的地。直到进入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机舱时，被劫持者才知道此行何方：流放到土耳其。国王为自身利益着想，在选择流放地点时煞费苦心。最后，他觉得土耳其人是一个理想伙伴，因为那里的逊尼派占绝对多数，他们对什叶派教徒只不过表达了一般的同情。此外，那里的伊斯兰教徒，自从凯末尔上台以来，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势力。再加上，土耳其和伊朗长期来就是西方防御集团中央条约组织中的亲密伙伴。于是，国王以为这下子可以一劳永逸了。

但对霍梅尼来说，一种崭新的生活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开始了。过去，霍梅尼身边朝夕簇拥着毛拉、学生和信徒。数十年来他已成为库姆血肉相连的一部分。如今他突然销声匿迹了，这完全是伊朗政府有意替他安排的。霍梅尼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一座表面魅力肯定堪与库姆媲美的城市里。这是古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布尔萨，坐落在西安纳托利亚这块肥沃的滨

海平原边缘。在许多大清真寺和绿色清真寺的圆顶和尖顶下，伊斯兰教的传统虽然仍在十五万居民（一九六四年）中继续存在，但这种传统却不同于在精神上哺育霍梅尼成长的那种传统。这里，在几乎终年积雪的乌卢·达格山麓，几乎找不到一个什叶派教徒。全部居民实际上都是逊尼派。霍梅尼住在一所两层楼的风子里（后来被拆除了），位于“阿西姆勒·卡德西”大街，意译就是波斯人大街。有生以来他似乎从未学会怎样使用钞票，但在这里，他每月要付房租一百五十土耳其里拉，当时合六十多西德马克。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安卡拉政府提供的一个土耳其佣人和一只猫。这只猫同大街小巷里的千百只猫一样，总是在招商旅店与小客栈之间到处乱窜。今天，那个土耳其佣人被霍梅尼的追随者说成是个双料特务；他当时受国王特务机关“萨瓦克”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委托，来监视这位老阿亚图拉在流放期间到底干了些什么。土耳其官方理所当然地辟谣说，他们并没有暗中插手。

今天无法知道，霍梅尼在布尔萨是否经常接见那些因明显的政治企图必然会使安卡拉政府感到恼火的伊朗来客；这位来自库姆的流亡者是否与土耳其的穆斯林建立过某种联系，是否在侨居国也试图进行政治性的布道活动。凡此种种，至今仍是个未知数。布尔萨本身对霍梅尼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当时他只在室内大扫除时才离开房屋，然后乘坐土耳其政府供这位神秘贵客逗留期间使用的汽车在城里兜风。他常去各著名的硫磺矿泉，或去那些长着著名布尔萨桃子的大花园憩息。

这段时间里，在安卡拉执政的是伊诺努总理，他是一位退

役将军，是凯末尔无可争辩的宗教继承人。与所有凯末尔信徒和共和党的领袖一样，他在政治上竭力主张政教分离。当时的劳工部长、后来担任总理的比伦特·埃杰维特，那时也初露政治锋芒。霍梅尼来到土耳其的前几个月，由于塞浦路斯危机，土耳其遭到国际政界的物议。在逗留期间的头几个月里，霍梅尼还经历了全国性的强烈反美浪潮。土耳其政府随后加紧转向邻国，当然也包括伊朗。

国王的死对头在布尔萨流亡了十一个月。在此期间，为了把这个被流放的人从信徒们的记忆中永远消除掉，特务机关“萨瓦克”在伊朗国内做了出色的工作。国王的特务们象搞其它工作一样，把这项工作搞得尽善尽美。任何人，哪怕他只是提及霍梅尼的名字，就有被投进监狱的危险。有不少毛拉，由于他们的忠心而吃尽苦头，有的因此而送命。甚至连霍梅尼的故乡霍梅因也受到惩罚，尽管它这位眼下最著名的儿子离开故乡差不多已有五十年了。多年来，伊朗信贷银行一直拒绝以贷款资助霍梅因的商人。为了永远抹掉这个令人憎恶的名字，政府甚至准备提供二亿土曼<sup>①</sup>（约合六千万西德马克），以便大兴土木，把这座只有七千居民的朴素小镇建成一个经济中心。这么做的条件当然是改变城市名称：未来的新城不叫霍梅因，而叫“雅利阿沙尔”，意译是“雅利安人之城”。

这个计划最终告吹了，因为国王的顾问们担心，敌视伊朗的伊拉克会在全世界面前嘲笑国王公开发泄对霍梅尼的仇恨。有一年冬天，霍梅因的一个姑娘遭到狼的袭击并被吃掉

---

<sup>①</sup> 土曼是伊朗货币单位。——译者

后，德黑兰的报纸竟把出事地点改为邻城古尔佩甘，因为霍梅因早已不再是新闻报道中引人注目的名字了。同时，“萨瓦克”在霍梅尼流亡后仍旧一如既往继续监视什叶派教会。几乎在全国所有的清真寺里，只要毛拉们一谈论国事民情，就会有国王的耳目在窃听和窥视。

有一个礼拜五，在德黑兰市中心的一个清真寺里，领祷人忽然心血来潮，让所有在人群中跪在厚实的波斯地毯上祈祷的毛拉们，把白色缠头从头上取下来。毛拉们十分惊异，面面相觑，最后终于犹豫地把缠头取下。这时，领祷人又要他们把绕得很巧妙的缠头散开，放在自己面前。毛拉们也茫然地照办了。他们心情紧张，不知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弟兄们，”领祷人板着脸说：“把你们的缠头快点重新绕好。”于是发生了如下的情况：在清真寺的圆型大厅里，有不少毛拉跪在他们引以为荣的散乱缠头前束手无策。“你们看，虔诚的弟兄们，”领祷人此时喊道：“不会绕缠头的所有毛拉，都是特务机关‘萨瓦克’派来的！”

尽管霍梅尼在布尔萨通过秘密的中间人能不断获得消息，但他仍然觉得这里太与世隔绝了——国王把远离伊朗国境的土耳其的这一地点作为他的流亡地并非偶然。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一位什叶派领袖。十一个月后，告别的一天终于到来了。这种情况，似乎符合所有当事人的利益——只是可能不符合国王的心愿。在土耳其所作的事后调查，今天表明，霍梅尼从一开始就想在伊拉克流亡，而不愿在土耳其作强制性逗留。从宗教的角度来看，这一结论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巴格达政府有好几个月显然不准备发给这位国王的敌

人必不可少的入境签证。直至一九六五年秋，国王在布尔萨的敌人才得到入境签证。当时，土耳其人正忙于塞浦路斯危机和大选斗争（一九六五年十月，德米雷尔所领导的右翼保守的正义党在大选中首次获胜），因此当伊拉克终于满足了霍梅尼的要求时，他们显然是很高兴的。

一九六五年十月某日清晨，这个伊朗人整理好行装，让人送到机场。当这位无家可归的库姆人到达巴格达时，伊拉克总统阿里夫曾到机场给予他所谓最高规格的接待。对伊拉克政府来说，这个政治流亡者现在恰好是一件政治礼物，是推翻伊朗国王政权斗争中可以随时打出去的一张政治王牌，因为，自从一九六四年冬末以来，这两个邻国之间原有的纠纷又充分爆发了。

起初，霍梅尼显然不知道在哪里才能找到一个新的安身之地。他在巴格达以北底格里斯河畔的萨马拉呆了几天，登上著名的“蜗牛尖塔”，站在宏伟的礼拜五清真寺的遗迹前面，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他在首都附近的卡齐迈因逗留，然后又到什叶派的伟大圣地卡尔巴拉落脚。一千二百八十五年前，被杀害的先知的外孙侯赛因的鲜血曾在这里使伊斯兰教分裂，什叶派就在这里由原先的一个政治分裂派别发展成为一个宗教团体。最后，霍梅尼在伊拉克什叶派的圣城、也是伊朗什叶派的圣城纳贾夫住下。先知的的外甥兼女婿哈里发阿里的墓碑就在这里。在这方圆几公里的土地上，呈现着一派生机勃勃的美妙景象，来自世界各地的什叶派信徒，带着死难家属的尸体，源源不断地来到位于幼发拉底河畔的纳贾夫，以便把死者安葬在那里。



令人尊敬的摩特嘉西德<sup>①</sup>也是来自纳贾夫，霍梅尼年青时曾向他们学习伊斯兰道德和伊斯兰法律。在霍梅尼之前，伊朗最有名的政治阿亚图拉阿布尔·卡塞姆·卡沙尼，也是在纳贾夫长大的，一九一九年他因进行反对托管政府的煽动，被英国人判处死刑，被迫逃往伊朗。

在伊拉克这座拥有镀金圆顶的清真寺的圣城里，霍梅尼找到了他所需要的环境。通往伊朗的国境线虽被封锁，但纳贾夫仍是什叶派世界的消息传递站。自一九六五年十月以来，他一直在这里讲课、传教和著书立说。他在纳贾夫的夏希·安萨里清真寺里的第一次伟大演说，被他的追随者录在磁带上，秘密地越过国境带回伊朗。从那时起，他的信徒每个星期都如法炮制。始终坐在一把土耳其式的椅子上，被教徒们团团围住的霍梅尼，在后来的岁月里，总是以一副几乎毫无表情的面孔，用单调的声调，翻来复去地讲述他的宗教信仰。后来，观察家研究了著作和录音讲话，认为这个伊朗流亡者的神学教义，尤其是一九七〇年前宣讲的教义，与什叶派的传统截然不同。霍梅尼在流亡期间的著述多得难于令人相信，他在流亡生活头五年中所作的演讲和传教，于一九七〇年出版成书时，竟有厚厚的六大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第一次自称“伊马姆霍梅尼”，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举止，显然是在为他的政治要求奠定基础。总而言之，一九七〇年这一年，对于这位阿亚图拉来说，似乎是一个特别的转折点。经过多年以宗教研究和传教

---

<sup>①</sup> 获得什叶派伊格佛哈德头衔的人被称为摩特嘉西德。——译者

为主的活动中，一个新的政治斗争的尖锐阶段开始了。这一年，伊朗国王下令在半个地球上追捕原先的亲信和刽子手巴赫蒂亚尔。同年八月，国王的特务机关在伊拉克以令人感到极度紧张的方式暗杀了前“萨瓦克”头子巴赫蒂亚尔。伊拉克人曾把这个长着大胡子的将军，从他在日内瓦湖畔戒备森严的别墅里接到巴格达，想叫他也像霍梅尼那样投身于反对邻邦伊朗王国的斗争。巴赫蒂亚尔受命组建游击队，并似乎取得了某些进展。

起先，伊朗特务谋杀他的企图曾多次遭到失败。一九七〇年八月初，伊朗航空公司的一架民航机在伊朗和伊拉克国境线上空被劫持。绑架者自称是巴赫蒂亚尔的狂热追随者，他们强迫驾驶员飞向巴格达。飞机在伊拉克首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流亡将军巴赫蒂亚尔立即出面接见了他的新交政友，于是伊拉克当局取得了一次反对国王的政治胜利。几天后，巴赫蒂亚尔带着他的狂热朋友，在靠近伊朗边境的地方游猎。他暴死在那里。据说是被那两个飞机劫持者中的一个，在打猎时“误杀”的。这两个人越过伊朗边境逃走了。巴赫蒂亚尔被埋葬在纳贾夫离霍梅尼住宅不到一箭之地的地方。

一九七〇年也是发生另一起死亡事件的一年。这起死亡事件对霍梅尼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六月一日，年迈的阿亚图拉夏希·穆辛·阿尔哈基姆死于纳贾夫。他就是九年前国王企图通过唁电立为什叶派新首领的那位阿拉伯神学家。那时，谁当首领的问题，实际上完全没弄清楚。霍梅尼的流放以及“萨瓦克”对他的名望彻头彻尾的压抑，使得阿塞拜疆人沙里亚特—马达里有机会作为库姆的精神领袖，越来越处于重

要地位。现在阿尔哈基姆之死，似乎全盘改变了宗教界的状况。国王又企图通过唁电对继承人的问题施加影响了。他给沙里亚特—马达里和德黑兰的阿亚图拉洪萨里分别发了唁电和唁函。沙里亚特—马达里的反应是赞同的。洪萨里则退回唁函，说：如果事关伊朗什叶派的领导权，那么，他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国王这种明显的阴谋诡计，挑起了库姆宗教界首领们采取共同的行动，他们在一九七〇年夏天，十分清楚而丝毫不致引起国王误解地澄清了最高权威问题：四十八个摩特嘉西德（获得什叶派伊格梯哈德头衔的人，实际上即阿亚图拉）给流亡的霍梅尼发去一份效忠电报，电文称：“我们坚决站在你一边！”几个签名者事后立即被投进监狱。

在随后的几年中，霍梅尼多次乘朝圣盛会之机在麦加露面，并在那里散发他写的政治宣传小册子。至于沙特阿拉伯是否曾试图在政治上阻止这位反伊朗国王的朝觐者，则世人毫无所知。当霍梅尼以越来越有力的言词越来越响亮地鼓吹伊朗革命的时候，当他号召采取具体的政治行动去结束伊朗国内的腐败状况，并在古兰经学者的精神领导下用议会制的神权统治去代替伊朗的君主制的时候，伊拉克政府由于与伊朗人的冲突日趋激化，当然对此不会加以阻挠。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的确是这两个邻国争夺波斯湾霸权危机的高潮时期。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拂晓前，伊朗军队大胆突袭并占领了波斯湾南端入口处的三个岛屿。这三个岛屿实际上控制着世界最主要石油中心的整个航道。伊拉克总统巴克尔向从世界各地乘飞机专程赶来采访的一大群记者保证：“我

们将用鲜血来保卫阿拉伯的每一寸土地。”

在此期间，由于两国的边境——从阿拉伯河到北面的库尔德——成了不许通行的前线，于是，霍梅尼的流亡地越来越成为政治朝觐者的圣地。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是侨居欧洲的伊朗流亡分子和毕业于欧洲高等学校的大学生。霍梅尼的目的是要“造就有朝一日能摧毁暴君宝座的一代信徒”。但是，这位神学家反对国王统治的孤军作战始终处在伊拉克当局严密的政治控制之下。在巴格达任职多年的西方外交官，在此期间甚至不知道霍梅尼就在伊拉克。他的作用仅仅局限在保证伊朗和伊拉克两地的什叶派互通消息的水平上。巴格达的当权者似乎也满足于这一点。他们认为，这个老人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来召唤人们与他一起推行反对伊朗的政策。此外，他们不得不经常担心本国的什叶派——据说，他们在数量上甚至居多数——会在霍梅尼的控诉性言词的影响下，在政治上变得不稳定。

这位流亡者通过录音带在信徒当中保持着反对国王的敌对情绪，他以此完全起到了伊拉克所期望的对冤家伊朗的分化作用。这是一场使用不同手段进行的决斗：国王企图利用库尔德人推翻可恨的伊拉克复兴党政权；而巴格达政府则想借助霍梅尼颠覆国王的独裁统治。

在侨居纳贾夫的所有岁月里，这位伊朗大阿訇和侨居国政府之间的友谊都是建立在政治理智的基础上的。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二年四月，尽管霍梅尼还在伊拉克，却有整整四万名虽然持有伊朗国籍但事实上世代居住在伊拉克的什叶派教徒被驱逐出境。这些驱逐行动的意图并不清楚，

霍梅尼对此也保持沉默。当时国王认为，伊拉克想把恐怖分子混在被驱逐的人当中渗透到伊朗来。另一些观察家则猜测，巴格达的逊尼派政权这样干是出于类似的担忧：伊朗国王也许会把他在伊拉克的人投入反对敌对邻国的斗争中去。

霍梅尼的存在也没能阻止伊拉克当权者在尔后几年里在全国各地发动对什叶派教徒的迫害、在纳贾夫禁止鞭笞己身以赎罪的信徒们举行著名的游行盛会，以及处决激进的信徒。一九七五年三月六日，当伊朗国王突然下令消灭他长期以来用伊朗金钱和武器加以支持的、以穆斯塔法·巴尔萨尼为首的库尔德人时，这两个邻国出人意外地和解了。霍梅尼这时才感到痛苦，并在政治上深感难堪。这时，伊拉克人突然把这位不再符合他们新外交政策的累赘的老人监护起来，因为他反对已与巴格达当局缔结和约的国王政府的呼声日益响亮。

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人们一再劝说这位流亡者稍微节制些。最后，霍梅尼感到自己已处于一种被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肯定视为软禁的境地。他再一次陷入孤立，但这一次只不过是一种强制性的在肉体上与世隔绝的状态，而在政治上，这位国王的老对手却已踏上未曾有过的老成的门槛。因为在伊朗，时代已经变了。在外国并未察觉的情况下，国王的统治业已动摇。这并不是由于他的政敌进行了一次新的危险的挑战而引起的，不，这主要是由于本身的无能而造成的。国王礼萨·巴列维乘坐在波斯魔术地毯上自我感觉终于接近了天边，但这条地毯却又猝然陷入旋风之中。国王本人也突然感到，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一个强暴的政权更虚弱的了。

## 第八章 国王罪孽

进步的狭长阴影  
人民寻求灵魂  
水渠衰败的地方  
福利始于王宫

几十年来，国王总是一再重复他那句傲慢的老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民拥护我。”国王在西方的朋友和他的秘密警察，不能或者也不想使他相信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外国和伊朗的臣属越是向这位万能的石油上帝和独裁者阿谀奉迎，那些想要及时警告他的人所能碰上的机会就越少。

但是，长期以来，人民已将这位与上帝齐名的统治者令人震惊的罪孽，一笔一笔记录在案。虽然他们不能公开谈论这些，然而，就在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的院墙后而，人们对此却议论纷纷。伊朗的毛拉在那里感觉到一种奇怪的现象：政府越是自信地大力宣传从伊斯兰中世纪跨入新时代，千百万伊朗人就犹如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那样，越来越紧密地团结在他们的宗教领袖周围。在霍梅尼流亡期间，留在库姆作为公认领导人的沙里亚特—马达里曾这样描绘这种发展：人们的命根子被拔掉了，因为宗教、清真寺和毛拉是他们的唯

一精神寄托。人们之所以转向我们，是因为他们感觉到，现代化和那种被大肆吹嘘的社会发展并不能带来心灵上的安宁。如果要追寻阿亚图拉霍梅尼在近几年流亡中威望不断提高的根源，那么就不能不看到：国王政权的深重罪孽成了革命运动的动力；推行多年的野心勃勃的王室政策，把大部分伊朗人民推到了霍梅尼手中。

可以认为，国王的确想大力推进“大跃进”——它是以“白色革命”，特别是以扶摇直上的石油收入为开端的——从而使全体人民最终得到利益。但在实际执行中，它却产生了一大堆弊端，不仅降低了这些改革的价值，而且部分地导致了社会状况的恶化。这是有许多决定性原因的。首先，国王把他的每一项改革都大肆宣传为天才之举，从而使他所推行的社会改革，自动地把任何批评和任何修改的可能性都拒之门外。“不可能出现差错，也不能承认受到过挫折”，这种态度，不仅使人们原先要加以改革的古老农业走向崩溃，而且还破坏了伊朗精神上的一致性，并导致了现行社会制度的衰败。而与此同时，却未能找到一个至少同样有效的社会制度加以代替。这场革命毁灭了传统的手工业。那种连所有欧洲国家在工业化即将来临时曾经历的过程，在伊朗，从多方面看来却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因为一揽子现代化计划，是强加给一个伊斯兰教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是以欧洲人的逻辑和欧洲人的思想意识为基础制定出来的。而且还因为伊朗的现代化是在史无前例的时代压力下推行的，根据谨慎的估计，石油蕴藏顶多可开采四十年。最后一个原因是，向工业化时代突飞猛进的行动是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即丝毫没有在工艺技术训练和

政治教育之间进行协调。

当政府首次公开承认“快速进步遗憾地与那些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和社会福利计划受挫的不足之处形影相随”的时候，流血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业已到来，王室的自我批评此时此刻再也没有人洗耳恭听了。

第二个，也许是最决定性的错误，即源于上面已经提到的专制社会结构。由于特务机关“萨瓦克”的建立和扩大，由于一小撮廷臣把国王同伊朗人的日常生活完全隔绝开来，致使人民不能公开表达他们的真正忧虑，甚至连那些能反映政治和社会弊端、有端倪可察的征兆也无法上达君主。事实上，国王建立了一个使自己与任何不愉快的消息完全隔绝的制度。为了取悦于他，为了不失去国王的隆恩，他的顾问、溜须拍马的人和那些驯服工具，伪造了一幅往往失去政治真实性的持续进步的美好图景。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在伊朗君主面前那种非批评性的、有时甚至是一味恭顺的态度也加重了这种幻觉的色彩。

在国王远离祖国和宝座几百公里，流亡到埃及的日子里，他才顾影自怜地认清了他作茧自缚地建立起来的幻想世界：“我的顾问在我面前建造了一堵墙”，他这样对埃及总统萨达特诉苦说，“这堵墙把我和我的人民隔绝了。”这位几十年来权势显赫的人，曾经多次对本书作者夸下海口，在他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事情是在他不知道和不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此人此时此刻却不得不承认：“我不知道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当我清醒过来时，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人民。”

对人民的疏远和苛求、工艺技术进步和政治僵化之间的



明显矛盾,是不幸的主要根源。它们最终败坏了国王的所有工作,尽管这些工作的本意无疑是好的,尽管西方欢呼某些工作是“进步的和符合时代潮流的”。在一个按照霍梅尼及其大量追随者所设想的穆斯林国家里,政府的主要任务简单地说就是,尽量少干涉人们的私生活,建立一个能容许公民作为一名善良的穆斯林生活的环境。而伊朗君主却没有为他们实现这一最基本的愿望。因此,德黑兰政府越是不能实现这些原则,霍梅尼关于建立一个公正、俭朴和民约性政府的梦想就具有日益强烈的吸引力。

这一切都是从最起码的人权开始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统治者对于人民所持有的严厉态度。在他看来,历史书籍似乎也确认了这种态度,因为具有二千五百年历史的伊朗,只有采取铁腕手段,才能始终保持强大。相反,控制稍一放松,这个国家总是成为外国利益的玩偶。这些清楚地表明了国王多年来的政治信条:“对于一个准备消除不发达状况,向工业国家迈进的国家,必须严加治理。”进步必须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进,“直至伊朗经济上发展到可以毫无危险地采纳民主方式”。在这个信条指导下,伊朗人民被迫处于一种政治上备受压制的状态中,其结果是,一九七七年在德黑兰的补选中,一百五十万选民只有六万人在选民册上登记。鉴于政治活动毫无意义,其他人都觉得,投票是一种可耻的交易。最后,只有一万八千多名首都居民投了票,胜利者仅以不满八千张选票而获得议员席位。占压倒多数的伊朗公民,都是在避开特务机关“萨瓦克”注意的原则下来进行他们的政治活动的。

近四十年来，国王对外依赖一支强大的军队作为威慑武器，对内仰仗当时的特务机关“萨瓦克”作为恫吓工具来支撑其专制统治。那种在工业化时代恰恰是绝对必要的百家争鸣的政治状况被斥为非法活动。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学里上学的六万名留学生，对这种政策是一种持续的威胁。因此，王室的控制机构始终在严密地监视他们。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当霍梅尼的追随者不仅占领德黑兰王宫，而且还攻占首都几座监狱时，监狱里关押着一万一千名囚犯，其中主要是政治犯，虽然在几个月之前，国王的几届政府曾一再打开牢门，企图安抚被激怒的群众。在拥有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的国家里——它曾经在穆罕默德·礼萨崇拜的榜样居鲁士大帝统治之下——王室以合法的名义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与此同时，“我的国家没有政治犯”这句自我表白却是国王频繁的出访场合的标准语录。

在这方面，“萨瓦克”和官方的司法机关，多年来对付反对派的手法所起的作用简直就像一种奇怪的抽彩中奖游戏。有时公开诉讼，有的案件事实上已宣判死刑。那些有确凿证据，表明要谋害国王性命的阴谋家，又突然被宣判无罪释放，或者悄悄地得到赦免。与此同时，却有几百人因对君主的安全有过一些极为轻微的冒犯而失踪，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官方对此则只字不提。

几十年来，伊朗实际上是处于没有政治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因而心怀不满的公民的交谈便逐渐被宗教所垄断。对王室的计划感到灰心丧气的人都麇集在宗教周围，只要他们还没有滑到恐怖分子的激进活动的邪路上或参加信仰共产主义

的伊朗人民党。国王在其统治期间十分惧怕毛拉和阿亚图拉的实力,曾下令迫害过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因禁或杀害过其中一些人,然而国王始终不敢对这个唯一明显的抵抗巢穴发动公开的全面攻击。长期以来,当所有秘密的反对派似乎已被打入地下或被特务机关全面渗透瓦解时,唯一有势力的反对派却从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的群众中产生出来。当毛拉越来越把他们的抗议人格化,使之成为国王的一个具体对手——霍梅尼时,这种势力对国王来说显然更加具有威胁性。

一九五三年,君主制濒临生死存亡的边缘,因为当时国内各政治派别十分活跃,并已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及其剥削性的石油政策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共产党人、欧洲式自由主义的反对派政治家、宗教领袖,甚至大地主,那时都肩并肩地在摩萨台的领导下共同进军,几乎迫使王室屈服。但在一九七八年,致命的危险之所以威胁着国王及其君主制,主要是因为人民中的各种派别已经感到迷惘,失望,甚至绝望。长期来,连许多公民都感到欧洲的进步有一种闪烁的魅力,但是在不容忽视的社会和文化崩溃的征兆下,这种进步又突然被视作一种精神上的病态。面对商业衰退和国家过多地管制市场,商人们怨声载道。由石油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迫使当局不得不实行物价管制,国王往往只有动用其一体化的政党<sup>①</sup>,布置在全国各市场的机动稽查队和打击组织,才能确保物价管制。农村居民苦于传统农村生活的解体,这是城市工业扩张的结果。

---

<sup>①</sup> 一九七五年三月,伊朗国王为了加强王室统治,宣布取缔各政党,实行一党制,成立伊朗民族复兴党。原各政党领导人都宣布取消自己的党,参加新党。——译者

在郊区,千百万昔日的小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沦为流氓无产阶级,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分享经济繁荣的好处。自从过分加以颂扬的土地改革实行十五年以来,农民占伊朗总人口的比例从百分之七十五降至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七九年初,当国王离开伊朗时,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力在城市以外的地方劳动。

一九六三年发起的“白色革命”,本应使人们感到农村生活有所改善,并能铲除中世纪的农业结构。据比较可靠的统计证实,土改前,全国大约有四万个农庄。其中百分之八十五属于大地主和宗教慈善机构,约百分之十由国家控制,自耕农的土地只占百分之五。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点八的水源,都被那些自己并不躬耕土地和牧场的民间大地主和教会慈善机构的执事所占有。六十年代初期,实际上只有少数伊朗大地主还居住在农村,那时谁要想在社会上有点威望,就必须拥有四十或五十个农庄。有的人甚至占有五百个乃至更多的农庄。长期以来,所有想对这种天壤之别进行改革的尝试,都在伊朗议会里遭到失败,因为国民议会实际上已经成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俱乐部。他们要获得多数选票是毫无问题的,因为作为地主,他们拥有足够数量的、依靠地主乐善好施方能生活的农民,这些农民必然被迫选举自己的债主。当摩萨台显然是用投机政策把国王逼到后台时,国王开始把王室的土地卖给农民。穆罕默德·礼萨虽然想以自己的行动作为政治资本,并号召大地主效仿他的榜样,但封建主对此实际上毫无反应。

当一九六一年粮食收成很不景气,全国面临饥荒威胁时,国王不得不向美国请求小麦援助。这时,美国总统约翰·F·

肯尼迪——正如人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决定实行政治讹诈，迫使国王采取大规模征收措施。当时，国王在一片欢呼声中贯彻了这一措施，并使它后来成为“白色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措施的作用至今仍有很大的争议。成千上万的伊朗农民通过土改得到了拥有自己土地的权力，并以此确立了他们与伊朗国家及君主制的崭新关系。虽然土改打破了旧的封建关系，但它并没有给农业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突破，反而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传统的农村生活瓦解，旧式大家庭遭到破坏，农业生产也遭受了严重损害。

事态发展的后果不仅在短期内是灾难性的。伊朗农民花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劳动建设了著名的“卡纳特”<sup>①</sup>，也就是地下蓄水渠（伊朗现有这种水渠五万多条）。整个亚洲，其中包括中国，都模仿着修建了这种水渠。它们把地下水或伊朗内陆山脉积水层的渗水积聚起来，灌输到生长著名长穗稻的稻田、茶园和桑园。在伊朗，水是最大的财富，远比石油贵重。自从大城市的吸引力把大批青年农民诱出农村以来，全国许多地方的灌溉系统便开始衰败，从而使几百年来苦心经营才得以维持下来的垦殖业——可阻止伊朗内陆沙漠的扩展——山穷水尽。

因此，这些年来，毛拉和阿亚图拉在每个星期五举行公众祈祷时，都喋喋不休地散播他们的最大忧虑：“古老的村社已经分崩离析，农民的灵魂随之消逝。”而十年前，伊朗还能够向外国出口谷物、大米和食糖。

---

<sup>①</sup> “卡纳特”在波斯语中的意思是水渠。——译者

虽然后来生产有所提高，但它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以及生活与消费习惯的变化。当国王凭借最新式坦克、电子计算机以及钢厂和西方塑料制品公司的发展实现了“伟大文明”时，农业生产却无声无息地跌入危险的深渊。一九七八年，国内生产的小麦，不到需要量的百分之八十，大米甚至不到伊朗人自己消费量的一半。

近些年来，访问过伊朗这个经济奇迹国家的人，只在德黑兰的街道上走马观花，自然看不到上述情况。这里，还不能忽视精神生活的变化。摩天大楼戏弄似地把清真寺的尖塔遮掩在自己的阴影里；公园成了停车场；商场和豪华的上层居住区之间的马车道变成供一百多万辆汽车奔驰的马路，变成奢华宽阔的林荫大道。拿破仑时代的古老家俱、用以保护私人珍宝的电动安全设施、锦缎服装、彩色电视机和各种时髦的奢侈品，在琳琅满目的橱窗里使人垂涎欲滴，但只有万贯家财的富贵阶层才能买得起。大饭店的宴会厅每夜都被预定一空。伊朗的上流社会总是在同一个社交圈子里聚会欢宴，其中有恺加王朝的一千家名门望族和巴列维王室的五十个家庭。在国家拿出几十亿巨款用来支付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技术人员以及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专业技术工人的工资的同时，却有几百万以牧羊和工资低微的苦力为业的伊朗人，在恶性通货膨胀中挣扎。

这种发展是王室执意赶上未来时代和强令跨越几百年历程的必然结果。因为在解决实现工业化国家所必需的技术和精神要求方面，这个国家既没有必要的全民基础教育，又缺乏基础设施。大大增长的电力消耗，一再造成整个伊朗电网的

损毁。进口货物的狂涛，堵塞了港口，船只不得不在港内停泊长达几个月的时间，等候卸货；满载供应这个国家货物的卡车队，一眼望不到头，终日拥塞在边境关卡。这个国家在变成一个巨大的进口公司方面远比它力图实现现代化进展神速。这个渴望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虽然能够凭借自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以来几乎直线上升的石油价格购进外国工艺技术，买得起克虏伯公司的产品和协和式飞机，然而，国内那些编织地毯的乡巴佬，一夜之间不可能变成工程师和程序编制员。在压力过重的火车站里，在船舶堵塞的码头上，大批机器生锈，水泥粘结，水果腐烂，肉类变质。

无休止的投机性的资本主义，连同政治上的营养不良，使伊朗极易被西方成就的闪烁外表所吸引。沽名钓誉和“一本万利”的角逐，甚至使西方成就的某些最成问题的东西——赌场、夜总会和利欲熏心的色情电影业，也在伊朗的大城市里泛滥成灾。平时一向严格的王室检查机关对此却显得极为通融。愤怒的伊斯兰教人士估计，这种做法的背后一定有政治目的。他们认为，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是为那些对政治和社会极度失望的人民找到一种醉生梦死的办法，独裁政权希望这类西方“文化商品”能起到使人民愚化和不问政治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在高举霍梅尼旗帜进行反国王起义的初期，电影院、酒吧间和赌场——据说其中有许多是由巴列维家族成员控制的——首先被焚毁的原因，尽管阿亚图拉拒绝对此承担直接责任。从流亡地开始，霍梅尼一直就这种十分有争议的西方先进外表向德黑兰的“魔王”提出三项主要责难：破坏了传统的伊斯兰文化瑰宝；独裁政权强制人民接受殖

民主主义的陋风败俗；挥霍人民的财富来喂肥了残忍的王室商业。

国王的财富有着十分雄厚的基础。在一个一切（包括奴隶）都属于君主所有的国土里，国王虽然先是放弃他的地产，尔后又把私人财富转交给“巴列维基金会”，但是，这个基金会是一个介于慈善组织和家族托拉斯之间的独创机构，是一个显赫权势与不可胜数的财富相结合的混合体。

几十年来，这个以慈善装璜门面的“巴列维基金会”有三种作用。首先，它是王室家族的重要收入来源。据一份未经发表的基金会报告透露：“寻找王朝创建者（礼萨·汗）的近亲和远亲，并满足他们的需要，绝不是基金会任务中最微不足道的项目，因为福利应该始于王室家族，基金会对于自己骨肉同胞的需求不能坐视不理。”其次，是通过直接财政投资，控制经济命脉。此外，还要直接从这个国王私人钱柜里拿出大笔款项，赠与那些效忠于这个政权的追随者，主要是军队将领。

不久前，《金融时报》曾开出一份关于王室家族插手经济的清单。它涉及面广，轰动一时。国王、他的姐妹和王亲国戚至少在一百零五个工厂企业的财政上插了一手，合股经营了十七家银行和保险公司、二十五家冶金和矿山公司、近五十家建筑公司和数量类似的食物厂。巴列维家族控制了二十四家豪华饭店，实际上垄断了旅游业、公寓居住区、商业中心以及附属的水泥和钢铁制造业。他们在摩托车和汽车轮胎厂拥有股份，并分享汽车生产和公路建设业的红利。此外，他们还拥有食糖加工厂、面包厂、醋厂、空调设备厂、取暖和家庭用具制造厂、乳酪厂和棉花种植场的股票。他们垄断了伊朗教科书



的出版,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它在销售额方面比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领先,居世界第七位)获得一笔数目不清的利润。一九七六年,一家法国报纸刊登了一份从该基金会的瑞士银行账户上摘抄下来的一九六二年一个月的存款。它证实,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有一千二百万美元从石油公司转到“巴列维基金”的账上。

在阿亚图拉霍梅尼到达德黑兰之前,国王和他的亲属及大臣们就及时地把他们的应急款项存入瑞士银行。当霍梅尼还在法国流亡期间,他就要求将这笔钱偿还给未来的伊朗政府。伯尔尼联邦政府、瑞士国家银行和联邦大银行立即拒绝了他的要求;为了把几十亿款项偿还给德黑兰,霍梅尼必须向瑞士法院提出这笔存款是来自盗窃和私吞公款的证据。即使有证据表明巴列维的这笔款项是通过持续非法征税而获得的,但要把这笔钱偿还给德黑兰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朗没有和瑞士签订相应的协定。

对伊朗新政府来说,要想收回王室在外国公司的股份及其在伦敦、瑞士、纽约、法国、南非、塞舌耳群岛和加利福尼亚贝弗利山丘上的房产和地产,终究是鞭长莫及的。留在德黑兰的有一把在外表上象征着王室权力和东方灿烂艺术的孔雀宝座,上面镶嵌着二万七千颗钻石,总值一千二百万西德马克。仅国王的王冠上就镶有三千三百颗钻石。

在国王和霍梅尼争取伊朗人支持的决斗中,被严加控制的德黑兰报界,总是一再故意指出什叶派教会储藏在圣地马什哈德和库姆的那些财富。但这种宣传运动,甚至在穷似乞丐的阶层中都毫无影响。从一九七八年秋开始,越来越多的

伊朗人响应霍梅尼的号召,不再向国家纳税,相反,他们却自愿地把他们的钱交给伊斯兰社会基金会。

据国际统计机构的客观数字表明,在一九六三年“白色革命”后的十六年里,伊朗已从贫困的魔爪下解放出来,这是王室社会改革的结果。然而,实际情况与这些统计数字并不完全相符,因为这些数字把全民的社会增长率给拉平了。被大肆吹嘘的伊朗工业革命,却把本来一直就很悬殊的贫富差距大大扩大了。“在伊朗只有一个革命,它来自上层”,这是国王礼萨·巴列维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种上层的王室革命,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却不足以影响人民自愿放弃发自下层的革命。

## 第九章 暴乱伊始

老爹戴上了黑纱

阿巴丹的烽火

两个星期的春天

最后一座堡垒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年迈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在他的流亡地纳贾夫戴上了黑纱。他的四十九岁的儿子穆斯塔法在父亲身边突然死去。穆斯塔法是一位神学家和研究伊斯兰法律的学者。公开的死因是心肌梗塞，而霍梅尼的朋友们却断言，他是被伊朗特务机关毒死的。难道这位不屈不挠的对手终于得到了要他永远放弃斗争的戏剧性警告吗？这件事，将永远是个谜，因为霍梅尼要利用宗教传统，使这个问题永远无法弄清楚。对“萨瓦克”的巨大怀疑，不仅与他的臆想相吻合，而且还适合他的政治计划。这位阿亚图拉拒绝验尸，因为按照真主的旨意，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埋葬死者。后来，当有人问霍梅尼是否真的相信谋杀的说法时，他十分谨慎地搪塞说：“如果不是，为什么这次死亡能够发出使伊朗出现爆炸性局面的信号呢？我不能断言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我的儿子在他死去的前一天晚上还十分健康。有

人曾向我报告,那天晚上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在他周围走动。第二天一早他就死了,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怎么知道呢?”当这一神秘死亡的消息传到伊朗什叶派的古兰经学校时,伊朗现代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时期便开始了,这一时期在一年以后以国王的下台而告终。

差不多与霍梅尼在纳贾夫埋葬他儿子的同时,在伊朗的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一些对他们来说极不寻常和难以置信的事情。国王再次赴美进行正式国事访问,从华盛顿通过卫星转播来的影片,映出了在白宫前反对国王的伊朗人和美国人同美国警察进行混战的场面。以前,一直充斥着美化王室报道的伊朗电视台,突然播出“打倒国王”和“处死独裁者”的喊声。

这个不寻常的事实,在德黑兰所起的作用,就象一根点燃了的导火线。在首都的商场里,忠于霍梅尼的商人,忘记了平时对国王特务的无比惧怕,大声高呼,死因值得怀疑!在首次游行示威尚未组织起来之前,这些人便被捕了。在德黑兰一座清真寺里举行的对死者的丧事礼拜中,领祷人如此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怀疑,致使始终在一旁监视的“萨瓦克”分子立即把他带走。在这种形势下,那些后来被国王频繁撤换的特务头子,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们强迫《消息报》编辑部发表了一篇反对“共产主义阴谋家”霍梅尼的质量低劣、并可一眼看穿的煽动性文章。

这样,那位多年来完全销声匿迹(许多伊朗人也许确实忘记了他)的人,突然又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强烈注意,一夜之间,再次成了一位有争议的斗士。一九七八年一月九日,在对他

记忆犹新的库姆，神学家们发起了一股反对粗野诬蔑的抗议浪潮。军队用暴力结束了这场游行。官方报道，九人死亡，但实际上却有七十人躺在棺材里。

对巴列维王朝来说，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十分可怕的，因为，暴力的时钟在库姆已开始转动，而且在尔后的四十天里发出尖锐刺耳的鸣声。按照什叶派的传统，人们在自己的亲属或朋友死后第四十天要再次特别虔诚地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和哀悼。实际上，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伊朗一直是在与这四十天同样的节律中经历着相同的过程：送葬的队伍；警察的暴力镇压；新的更大规模的哀悼仪式。这是一种再也无法阻止的过程。这种过程的每一次重复，总是更紧密地同痛恨与复仇的心情联系在一起。在国王与挑战者霍梅尼之间的戏剧性决斗中，人民悼念死者的强烈动机，实际上已大大超过激进的政治口号，而成为公开反抗。

这种针对伊朗国王的愤怒民情，是在一个困难的阶段中爆发的。去年八月，人们普遍对经济衰退、火箭式的通货膨胀、超负荷的电力系统的持续损毁，已如此明确地表示不满，致使国王火速组成一个新政府，并许下了很多新的诺言。同时，国王已紧迫地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预感，他说：伊朗人现在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成熟了。这就迫使他放松对国内的管制。国王答应进行自由选举和顺利地实施民主化进程。当然，在这一发展的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其它动机。随着吉米·卡特出任总统，以及比他的前任更明显地把人权摆到更高的位置上，卡特很快便陷入尴尬的窘境。因为他如果想要东方共产党政府尊重人权，必须同样迫使美国的盟国也这样做。而

伊朗在这方面恰恰首当其冲。对于国王来说，稍稍打开国内的政治阀门还有第二个原因。他的儿子很快就满十八岁了，国王开始考虑如何平静地让出孔雀宝座。因此，他的顾问们向他献策，利用几项自由化措施来安抚反对派。他采纳了这个建议。从一九七七年秋天开始，知识分子可以给国王写请愿书——法官们委婉地请求他稍微给法院一点独立性，记者和作家小心谨慎地提醒他注意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为了不使这种发展搞过了头，国王及其制度的维护者，一直控制着这种发展。凡是反对派的活动过分公开的地方，警察便接踵而来，但警察已不象过去那样穿着制服，而是换上便衣，手持棍棒。这样一来，便使当局能更加容易地处理善后事宜。因为他们现在能够在残暴的殴斗行动后公开对“匿名无赖散播的消息”表示遗憾。

国王一方面实行严加限制的自由化；另一方面又重演多年来的故伎，对来自下面的每次反抗都报以来自上面的迅速镇压。第一批骚乱就是在介乎上述两者之间的不稳定气氛中使国王大吃一惊的。在从库姆到伊朗最北部的大不里士的血腥事件发生后约四十天里，当警察向送葬示威的愤怒人群开枪时，西方国家大约才第一次了解到这些突发事件。工业国家的人们读到这些事件的消息时，首先感到相当惊慌失措。欧、美政客顽固坚持的那种陈词滥调，突然显得不那么正确了。伊朗究竟是经济和土改的神话国家呢，还是在国王光芒四射的奠基人影响下成了政治僵化的堡垒呢？但是，从根本上讲，世界对此并没有深思熟虑。人们习惯地认为，伊朗国王的权力是无边的。他们确信，他将很快结束这次不可救药的、落

后的毛拉们的造反。国王再次企图用他父亲的方法处理这些事情。五月十日，他以恢复安定和秩序为名，派遣一支伞兵部队开进宗教反抗的老巢——库姆。当时，年逾八十一岁的沙里亚特—马达里正代替霍梅尼在那里坐镇。他实际上属于温和派人物。但是，甚至连他都认为国王的残暴行径太过分了，他说：“我们的人民认为，单单是这一突发事件就足以引起革命，人民绝不会忘记对什叶派领袖的攻击。”

当时，马达里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多么正确。因为，在伊朗城乡到处悬挂着什叶派领袖霍梅尼——几十年来，国王对他进行了其他毛拉所未经历的迫害——画像的日子很快就到来了。动乱迅速席卷全国三十多个城市。每发生一次游行和新的流血事件，萨阿达巴德王宫里的国王，在美国人的不断劝告和他自己的特务机关发出越来越有力的警告之下，更加感到无所适从。在无法决定采纳哪种建议的情况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决定在这一巨大挑战期间推行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这一政策最终还是导致了伊朗君主制的必然灭亡，因为这种强硬和让步的混合物，加速了街头革命发动机的运转。那时还在伊拉克流亡的阿亚图拉霍梅尼，首先看出国王已开始自坠深渊。因为，国内街头上一再造成新的死难者的哀悼所酿成的反对王室政权的全国性怒潮——正如这一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已证实了国王的让步究竟允许这个国家的人们在政治上能走多远，如果人们还想认真就此尝试一下的话。

初夏，统治者让法拉赫王后的首席宫廷顾问向他提交一份关于不满情绪的真实背景报告。因为王室对“黑色和红色

反动派”——这是国王对伊斯兰教士的称呼——的力量的恐惧与日俱增。报告写得严酷无情。它首先抨击了把每个伊朗人都拉进去的一体化政党——伊朗民族复兴党，指责它领导软弱、组织松弛、官僚主义和政治上麻木不仁，并认为，骚乱是低收入阶层对政府虚假的许诺以及官员和当局欺压百姓所引起的失望的必然结果。

至于这份报告对暴力行动的宗教背景谈了些什么，一直是个谜。八月初，国王惊慌失措地向他的人民保证，按照多年来他所感兴趣的西方民主模式，最大限度地实行政治自由。以往，他一直认为多党制国家是“耍猴的马戏团”；现在，他却保证允许组成各种政治“派别”，但是这些政治派别首先必须纳入一体化政党的范围之内。然而，这些漂亮话说得显然太晚了。因为，这时已经没有人真的相信那个对人民不屑一顾长达三十七年之久的人会愿意保障自由、法制和宪法。因此，伊朗城市的街头，仍然是不断爆发高举霍梅尼老人画像，举行示威游行的场所。欧洲之所以忽视了夏天几个月中爆发的抗议浪潮，也有着和十五年前什叶派领袖与国王之间的首次决斗时完全相同的原因：又有一个教皇——保罗六世躺在灵床上，尔后逝世的还有约翰·保罗一世。

但是，八月二十日的大火再次引起各国对伊朗的注意。由于迄今尚未查明的人锁住了太平门，在阿巴丹的一所电影院里有三百七十七人被烧死。那天晚上（国王正在庆祝他推翻摩萨台后重新掌权二十五周年）令人惊恐的场面成了一场骚乱的信号。但是，悲哀和绝望的狂飙并没有朝国王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把熏死的、烧死的和混乱中踩死的人在阿巴



丹草草公葬的头几个小时起，居民们便开始怀疑政府关于不幸事件起因的说法——大火又是宗教界疯狂分子放的。伊朗人更多地认为，火是政府自己放的，其目的是把人民的积愤从国王那里转嫁到毛拉身上。于是，这场大火突然变成了一个革命信号，它使绝大多数人民更加紧密地与那些把这个国家里的一切罪孽都归咎于国王的人联合起来，首先是与霍梅尼联结在一起。虽然此时霍梅尼正在远离阿巴丹四百公里的流亡地纳贾夫，但他完全清楚地知道：“国王及其走狗烧死了几百人！”

一个星期之后，国王匆忙地撤掉了他的首相阿穆泽加尔，改头换面——把一位十分虔诚的牧师之子谢里夫·埃马米摆在愤怒的人民面前。国王交给他的任务是，竭尽全力，力挽狂澜。他受命谄谀毛拉们，那种迫不及待的劲头被许多伊朗人一眼看穿。在埃马米任内，德黑兰最大的报纸刊登了一张新的民族英雄霍梅尼的画像，全国民众很快在家里的窗上和墙上贴上了这张画像。早在上任的第一天，这位首相就以伊斯兰年历代替了王室日历，并下令关闭了在宗教上有争议的赌场，而且还解散了什叶派神学家一点也不喜欢的妇女事务部。

现在，每逢宗教忌日，伊朗的电台和电视台便改变原定的节目。政府对任何一个宗教领袖的死亡都表示哀悼。国王允许埃马米在他绝望地转移视线的策略运用上继续再走一段路。他第一次给予示威群众对王室政策阴暗面表示愤怒的权利：“在全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允许发表不满和叹息。”他可以下令禁止国王的亲戚卷入财经交易。在群情激愤的同时，国王正

忙于调查王室家族的私人金融交易是否一点也没有作弊行为。而在此期间，年迈的霍梅尼在纳贾夫却门庭若市，德黑兰政府邀请、甚至恳求他回国，还表示，他过去的罪过已被遗忘，他已得到赦免和宽恕。然而霍梅尼——他的画像已在成千上万的商店、办公机构和工厂里把国王金光闪闪的旧照片排挤掉——十分顽固，毫不妥协：“只要国王在伊朗，我就不回去。”他确信，政府请他回国只有一个目的，即让他沉默。

除了上述措施外，埃马米还打开了监狱；以贪污罪控告昔日的政治显贵；清洗特务机关；进一步放弃新闻检查。但是，那阵霍梅尼从一开始就不相信的春风，只吹了两个星期。九月八日，也就是反对派宣告举行总罢工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军队向示威群众开了枪。这种杀一儆百的做法，意在煞住不服从命令的风潮，因为为数众多的人，无视刚刚张贴出来的军事管制法令，再次焚烧银行、影院和饭馆。这天是复仇的吼声达到高潮的一天。最终使全国陷入瘫痪的大罢工的几个星期开始了。电话接线员率先停止工作，教师随即响应，接着是官员，最后是石油工业的工人。

这个国家逐渐陷入一种使全世界不得不认真考虑的状态，因为伊朗的石油生产与各国息息相关。正当越来越多的人横遭死难的时候，年迈的霍梅尼在精神上鼓舞人心的谈话以咫尺天涯的距离传到这里。他在录音磁带里对群众呼唤道：“鲜血终将战胜利剑！”他在远方向罢工的人们鼓励说：“你们正在为我国人民做出巨大功绩。”而对那些朝本国沸腾的人民开枪的士兵，他则警告说：“离开你们的兵营吧，你们正在败坏自己的声誉。”绝不是所有高举着他的画像、示威反对国王的

人都象这位正在国外流亡的宗教领袖那样坚定。对许多人来说，真正推翻国王的念头还是完全不可设想的。他们认为，争取君主立宪制的战斗更有前途，因为这比较现实。即使在伊朗的毛拉当中，意见也不一致。阿亚图拉库米在马什哈德对他的信徒说，已死去几百年的神圣的伊马姆礼萨在梦中拜访了他，并向他抱怨说，霍梅尼煽动穆斯林对立，他的命令是违反伊斯兰法规的。有些人相信这位阿亚图拉的说法，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的梦是政府的一个诡计。霍梅尼的热情追随者有时看到他晚上拍的照片就象看到月亮里的圣人。

此时，完全被隔绝在王宫中的国王本人，头一次打破对这位头号敌人保持沉默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他问外国记者，如果波兰裔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公开以反波兰的内战相威胁，号召波兰军队叛乱，并煽动波兰人民举行反对共产党政府的起义，那么，全世界将作何反应呢？国王相信，全世界肯定会认为，这位教皇已失去理智。可是，看管什叶派小羊羔的牧羊人<sup>①</sup>霍梅尼却始终吸引着世界的兴趣。国王还以更阴暗的色调描绘道：如果出现一个穆罕默德和马克思奇怪混合体的伊斯兰政权，那么，伊朗将分裂成三个或四个自治部分，莫斯科将立即把里海沿岸地区作为“伊朗斯坦”并入版图。国王向报界人士引了赫鲁晓夫的话，伊朗终将成为“一个熟透的苹果，我们只需等待它落入我们的手中。”

同时，国王还试图退居幕后，以逃避对血腥事件承担个人责任。一向以能在这个国家主宰一切引为自豪的他，突然又

<sup>①</sup> Oberhirte 在德文中的意思是教长，但也可直译为首席牧羊人，这里是双关语。——译者

扮演起局外人和非知情人的角色。在执行军法管制的训令上没有他的署名；在屠杀和兜捕问题上，他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七日，也就是油田开始全面罢工后一个星期，英国 BBC<sup>①</sup> 称为“破坏和仇恨的地狱”的最严重骚乱爆发后两天，国王向人民保证：“我也听到了你们的革命呼声，我是以真主的名义，受人民的委托承担伊朗君主制守卫者这一神圣职务的。我保证赞同你们为之战斗，甚至为之献身的一切。”

不过，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前已结束了首相埃马米的调停使命，并把政府权力交给了军队。军队现在是最后一个在愤怒的人民面前保卫巴列维王朝的壁垒。如果这一壁皇在年近无情的霍梅尼打击下土崩瓦解，那么国王礼萨·巴列维及其王朝就将寿终正寝。

---

<sup>①</sup> BBC 系英国广播公司的英文缩写。——译者

## 第十章 遥控革命

苹果树下的人  
埃米尔感到害怕  
录音磁带的胜利  
与一位十八岁女郎“结婚”

这两幅画像无论如何也无法并存：一位是强有力的东方国王，他在愤怒的人民打击下，突然吓得发抖，人民结成数十万计的浩浩荡荡大军上街示威，声嘶力竭地吼叫——完全出于对另一位更好的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渴念；另一位则是年迈的老人，他此刻正远离暴乱中心四千五百公里，穿着朴素的灰色衣服，安详地、超尘脱俗地坐在苹果树下的蒲团上沉思默想，身边围坐着长着大胡子的毛拉。这就是他的画像。在一九七八年十月下旬的日子里，群众就是举着这幅画像，穿过德黑兰、火不里士、马什哈德、伊斯法罕和伊朗其它城市的街道。这张倦乏的面孔，在那深黑色眼眉和大白胡子的衬托下，显得更加阴郁、更加奇特。一天，这位流亡者到了法国首都机场。不少法国人认为，对于一个神职人员和流亡者来说，他的超重行李显然是太多了。不少人揣测，在这些来自巴格达的箱子里，一定有数量巨大的、属于教会的无价之宝。但是，这

位业已遥控伊朗革命将近一年的、性急的阿訇，使所有这些人感到羞愧。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这位已被流放十四年的叛逆的什叶派阿訇，在他七十六岁高龄时，带着一小批私人藏书来到他的第三个流亡地。他的第三个流亡地为什么恰恰是法国呢？这纯粹是出于偶然的原因。他原来计划中的旅游目的地科威特表示不愿接待，波斯湾沿岸的这个小小产油国的埃米尔害怕因此而引起政治上不愉快的事情，因为当时无人预测，伊朗的较量到底将怎样收场。对酋长们来说，关于伊朗国王被推翻的念头是难于设想的，而且会危及自身。海湾绝大多数产油国的统治，实质上比国王的统治更为专制。然而，与穆罕默德·礼萨相比，酋长们得天独厚的地方是：从科威特到阿布扎比之间的酋长国，根本没有伊朗那样多的民众。阿拉伯海湾沿岸的富裕公民，现在早已愿意为赚取像潮水般滚滚而来的大笔金钱而在政治发言权方面作出小小的牺牲。在酋长们看来，天天与那些组织严密、其中绝大多数受过教育而且十分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打交道倒是唯一的真正问题。没有他们，海湾酋长国高度技术化的生活就无法运转，水就不流，灯就不亮。不过，产油国的统治者们在宣传上、财政上和军事上为他们的政治狂热付出代价。比起其南部海湾诸国的同事来，埃米尔贾比尔·艾哈迈德·萨巴赫在自己家园里对这一政治忧患更感头痛。据秘密统计表明，科威特大部分是移民，他认为没有理由因接待年迈的阿亚图拉霍梅尼——何况是个什叶派人物——而在他的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酋长国里为自己增添新的负担。

正因为如此，这位老态龙钟的穆斯林领袖又一次面临向

何处去的问题。在东方，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阿拉伯政府尚且不愿得罪国王，而以色列根本不中霍梅尼的意。告别纳贾夫对他来说毕竟是轻松的，因为那所他最后与十二个随从居住的三间一套的破旧房子，日夜受人监视。“伊拉克政府受伊朗国王的委托对我施加压力”，几个星期后他说，“为了继续战斗而离开这个国家，是我神圣的宗教任务。”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霍梅尼离开纳贾夫后第三天，伊拉克的当权者、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在解释他的政府为什么突然拒绝什叶派领袖政治避难的原因时说：“如果我们让我国成为霍梅尼的一个避难地，而他又要从这里破坏伊朗的内政，那么，我们必须反对。我们已向霍梅尼说明了这个态度，并要求他尊重这一安排，否则就要重新审查他在伊拉克居留是否合适。可是霍梅尼却回答我们说：‘我将继续我的政治活动。如果这不合你的意，那么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同时，这位伊拉克副总统利用这个机会，间接地对本国什叶派神学家谈到他们的前景：“我们尊重宗教领袖，并支持他们为教育人民而做出的努力。但我们唯独不允许教士替代政治家，正像政治家不能替代教士一样。”

霍梅尼就这样再次踏上旅途。这一次，他可不再是一个孤独的、被人忘却的伊朗国王的对手，而已是伊朗人心目中的伟大英雄。但是，当德黑兰和巴格达政府认识到他们犯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时，为时已晚。告别邻近伊朗边境的伊拉克朝圣中心这个比较与世隔绝的地方，使这位伊斯兰教的火神终于成了国际新闻的明星。霍梅尼日益增长的政治声誉，很快也给伊拉克造成许多内政问题，因为他在伊朗点燃的“伊

伊斯兰革命”火焰，不久也迷惑了伊拉克什叶派，他们很早以来和他们的伊朗邻居一样苦于相同的忧虑：在他们那里，政治与伊斯兰的要求也并非绝对一致。但是，霍梅尼终于做出更多使巴格达政治家神经过敏的事情来。他刚返回伊朗，就把越来越多的库尔德人带到他精干的指挥部（其中还有外交部长卡里姆·桑贾比），不言而喻，伊拉克复兴党政权面对他们的政治复苏，会经常吓得发抖。

在到达巴黎的头几天里，这位忧郁的东方人，便迁居到巴黎以西三十公里的诺夫勒勒夏托。对法国人来说，他目前几乎不再是一个怪物。他迁入一座属于一个利比亚人所有的两家合住的别墅——这立即引起人们对这一运动的秘密赞助人进行种种政治揣测，利比亚人后来也不断加以证实。在一次访问罗马时，利比亚外交部长阿里·图尔基大肆炫耀，他的国家通过为伊朗反对派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性援助，才使他们有可能推翻国王。早在三年前，利比亚国家元首穆阿迈尔·卡扎菲就对本书作者着重指出：“国王是所有阿拉伯人的头号敌人。”当国王实际上是在霍梅尼逼迫下出走流亡时，利比亚人同样满怀希望地显示了他们的下一个政治行动——推翻沙特阿拉伯君主制。

霍梅尼刚到巴黎，就让人在安静的谢弗勒兹大街旁新总部的屋前花园里支起一座蓝色的帐篷式清真寺。他的二十五名随从把他们用波斯文和法文书写的标语贴在帐篷的四壁上：“若屈辱，毋宁死”以及“阿亚图拉霍梅尼根据真主的裁决结束了伊朗国王延续二千五百年的统治”，当然此时此刻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法国人起初很乐意看一看他们城郊的这种东



方式热闹场面的外观，看一看这位包着缠头的人。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而沉缅于祈祷和反省的时间却有六至八个小时。巴黎报纸的读者在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而斗争之前，就了解到了他那由水果、果仁、酸牛奶和干酪组成的食谱。

霍梅尼咄咄逼人的决心和尖锐刺耳的语言与巴黎郊区田园诗般的景色之间的不协调，也使法国人感到迷惑不解：难道一位经验如此丰富、如此英明的人（他能在面部表情丝毫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动声色地演说几个小时），一位真主的诚洁教士也要对最近几个月来报纸通栏标题下所报道的所有事情负全部责任吗？欧洲人怎样才能理解，一个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国家在经济明显蒸蒸日上的情况下，突然又如此戏剧性地使自己国家的历史倒退到昔日的陋风旧俗上，倒退到那些虽然认为国王是个独裁者、但仍不愧是一位开明的技术治国论者的人所称道的中世纪。当霍梅尼早已胜利地结束了与国王进行的搏斗时，欧洲人对这一奇迹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阿亚图拉穆萨维·霍梅尼在巴黎为西方报界举行的头几次记者招待会上，西方记者就对这位来自东方的新民族英雄那种备受赞颂的救世主风采大失所望。他们发现这位高龄老人业已疲惫不堪，并且注意到，在他的战斗口号中，陈词滥调简直是太多了。他们察觉到，霍梅尼非常厌恶回答太具有批评性的问题或异议。但是，他对贪污、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浪费、人情疏远和依赖外国利益的抨击，却是可以理解的和实际的。从根本上来看，凡此种种本来就是十五年来老问题。也许正是这种老调重弹，部分地说明了他成功的原因。霍梅尼突然被一批人所簇拥，这些人非常清楚地懂得，在二十世纪

最后四分之一的年代里怎样兜售这位年迈老人的观点。他们当中最首要的人物是霍梅尼的儿子艾哈迈德·霍梅尼和他的女婿谢哈贝迪纳·埃什拉吉，他俩显然属于精干的政治顾问班子。另外还有一位宣传能手穆罕默德·贝赫什蒂，他在伊朗建立了一个宣传系统，其效率不久便使王室的单一新闻系统——霍梅尼认为它每年支出一亿多美元去征服西方的人脑——望尘莫及。贝赫什蒂手下的人，每天把霍梅尼的讲话和答记者问录在磁带上，用电话把这些讲话传到设在伊朗圣城库姆的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秘密总部，然后再从那里将这些讲话通过电话继续迅速下达到伊朗全国九千个清真寺。那里的磁带录音机也已接在电话线上，有足够的青年人自愿随时抄写和复印这些消息，并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就在人民中散发数百万份。

这种以全面展开的伊朗人民运动为基础的传递消息渠道，是王室新闻系统无法与之匹敌的。另一个无法匹敌的原因是，德黑兰报界在国王于一九七八年初发起的短暂自由化阶段中感觉到了一丝新闻自由的浮光掠影，因此，他们不仅不愿意，而且也没有能力把已经搞了三十多年的宫廷报道再继续下去。霍梅尼的新闻系统是那样的完善，致使谢里夫·埃马米和沙普尔·巴赫蒂亚尔两届政府甚至无法信守对进一步要求新闻自由的压力作出让步的重要保证，并把记者再次投入监狱。这种逮捕维妙维肖地清楚表明，面对这种完善的遥控式革命，当局显得多么软弱无能。

还有一位人物是七十四岁的毛拉马哈茂德·塔莱加尼。他曾是德黑兰大学的神学家。现在他虽已高龄，但仍想在政

治基础工作方面考取博士学位。特务机关“萨瓦克”把他监禁了十年之久，致使他现在只能跛行。他指挥着——有时还从巴黎发号施令——伊朗每日的游行和巷战。战斗起初当然是由于军队的意愿而引起的，因为霍梅尼曾一再要求他的追随者进行非暴力的示威游行。当德黑兰街道上的伤亡数字越来越大时，他才感到总有一天“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总不能老是用赤裸的胸膛对着枪杆子”。偏偏就是这位数周来一直组织着全伊朗的每一次示威游行和每一次罢工的塔莱加尼老人，在思想上是与霍梅尼典型一致的。他没有把这项工作交给在伊朗近战实践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地下政治家，而交给了一位毛拉。“我们在斗争的组织方面绝不允许再出现过去那种令人担忧的情况”，他在巴黎对“大赦国际”的代表解释说：“应正确认识伊朗社会的同一性及其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愿望，并在行动、指挥和组织的能力上、以及在为自己的思想和计划而斗争的坚定性上，表现出虔诚和正义。”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冬季，有数十人（后来发展到几百人）几乎一直聚集在诺夫勒勒夏托霍梅尼总部，这些人中，不仅有狂热分子，还有一些持怀疑和担忧态度的伊朗人。后者也在密切注视着这位目前世界上最杰出流亡者的活动，某些人有时也大摇其头，并说：这位年老的阿亚图拉已经不了解他长久以来没有亲眼目睹的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他显然不再熟悉伊朗的实际问题以及他要与之斗争的那些人了。最重要的是，霍梅尼排斥他所不懂的经济计划和客观的政治组织，而没有这两样东西，一个在许多领域里已经现代化的国家是无法生存的。他们对霍梅尼那种“真主在必要时将为我们指出解

决办法”的老生常谈极为不满。某些人，冒着潮湿寒冷的天气，站在帐篷式清真寺前青烟袅袅的火堆旁，公开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这个老家伙太冥顽不化了，把复仇的感情作为主要的生活准则，是不足以建立一个新政权的。“霍梅尼是一股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说，“但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消灭他的敌人方面。霍梅尼是一枚导弹，可是导弹给人类留下的只能是一片废墟。只会破坏而不会建设是霍梅尼的本性。”

聚集在巴黎这位什叶派领袖身边的那群随从人员，当然要反驳这种说法。在这些人当中，不仅有长期忠于他的穿着拖鞋的毛拉，而且还有一位前伊朗癌症研究人员——为了伊斯兰运动他已离开自己在得克萨斯州的医学实验室；阿亚图拉的随员中，还有一位身穿时装、结着漂亮领带，来自华盛顿的语言学家；那里还有一些来自巴黎的经济学家。“在伊朗有许多有才干的政治家”，在一间空荡的房子里，霍梅尼在接受采访时总是坐在同一个角落的地上，他解释说，“统治当局没有为所有这些人提供为人民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才智的机会，现在他们正协助我，正运用他们的经验和学识向我通报所有必须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他们显然不限于向这位革命首脑通报情况，伊朗各地的真主步兵部队，在冬季也从诺夫勒勒夏托领受关于解决他们大小问题的具体指示。卡维因清真寺的大毛拉，曾在这段时间对一群外国记者说，他也定期打长途电话与巴黎<sup>①</sup>磋

---

<sup>①</sup> 这里是指霍梅尼设在巴黎郊区诺夫勒勒夏托的总部。——译者

商——据说，全国各地的清真寺都是这么做的。一遇到问题，就拿起电话向这位在法国流亡的老人或他的一位随从请示。在德黑兰有几百个小男孩成天在街头出售录有阿亚图拉最新指示的盒式录音磁带。

巴黎政府起初虽然对霍梅尼及其战友们的战斗精神感到担忧，但最后还是按照“少一点外交上的顾虑，多一些政治上的远见”的信条，玩了一局外交险棋。早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法国外交官就在私下说，他们几个月来已经书面拒绝了国王的要求。横遭非议的前内政部长兼总统顾问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在秋季访问伊朗不下五次。据非官方的消息说，他回国后对君主制能否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作出了致命的判断。法国人希望在他们所押的赌注上能收回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如果霍梅尼真能返回德黑兰，并把美国顾问赶出这个国家，那么法国实际上必然要在伊朗的经济方面扮演一个角色，其作用无论如何也会比巴黎目前与国王保持的那种颇为紧张的经济合作关系大得多，因为如果没有外国专家，一个伊斯兰的伊朗也无法存在下去。

成千的法国头面人物，似乎忘记了应低三下回地去讨好伊朗国王。以前，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甚至曾尾随伊朗国王赶到坐落在瑞士圣·莫里茨市的索菲雷塔冬季山间别墅，向他有礼貌地鞠躬；而现在，霍梅尼却可以从法国的土地上号召人们杀死暴君。在此期间，美国却依然傻乎乎地天天向伊朗国王表示敬意。长期以来，法国人早就以敢于冒险的独特政治方式著称于世。他们的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间比所有其他西方国家都早。在第一次与巴勒斯坦人的领袖

阿拉法特欣然握手言欢方面，凯道赛<sup>①</sup>的外交官也比其他欧洲人早得多。

为了在礼仪上做到天衣无缝，巴黎政府请鲁霍拉·霍梅尼不要滥用他的宾客权利。但是这只老狐狸非常清楚地知道，法国允许他在这里设立总部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在伊拉克流亡的头几年也是这样——而是因为各自的利益并行不悖，所以他能无动于衷地威胁道：“如果这里有人对我施加任何压力，我将不呆在法国，反正有许多我们可以去的地方。但是，这样做将使法国的威望因此面受影响。”这也就是说，并不是巴黎政府给予某人什么恩惠，反而是这位在此栖身的库姆人赐福于法国。法国人发给他一份旅游签证，从而使霍梅尼可以比较放手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如果他被当作政治避难者来接待，那么他就必须保持沉默。

法国新闻界只有一次曾惹怒了这位导演革命的大师，那就是把这位圣人与一位“美丽如画的十八岁波斯女郎”的结婚消息传得世人皆知。冷酷的盛怒通过几十个电话像潮水一样涌向全欧洲那些传播这条来自巴黎的爆炸性消息的报社。原来这条消息与霍梅尼刚才在巴黎所作的说教完全背道而驰。当时，正好有一群女权分子抱着怀疑的态度参谒他，这位白髯老人在回答她们提出的有关他是否要把一夫多妻制带回伊朗去的问题时强调说：“一个妻子足矣。”究竟是什么事情引起这次关于结婚的报道呢？这显然使欧洲的读者难于理解。原来，为了能给越来越多的来自伊朗的政治朝圣者提供饮食，

<sup>①</sup> 法国外交部位于巴黎凯道赛街，所以凯道赛成了法国外交部的代名词。——译者

霍梅尼的随从人员雇了一位年青的、十分虔诚的、波斯血统的女厨师。但是，什叶派的传统必然使她不能过于勤勉，因为作为女人，她不能经常在一个陌生的男人面前出现，也不允许露出手和头发，这使得女厨师的工作并不是那样轻松愉快。什叶派信徒解决这类困难的办法叫“*Sigè*”，即形式上的一种临时婚姻。如果信徒把女性亲属托付给一位去麦加的导游，那么大约也将结成这种临时婚姻。这可能促成“彼此相亲相爱”，但这种结合未经许可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霍梅尼夫人始终是——不管所有报纸的报道如何——那样一位波斯女人：她五十年来一直是他的结发妻子，而且也和他一起生活在法国，不过所有来拜访霍梅尼的人看不见她而已。对这位七十六岁的老人来说，在巴黎的三个月只是出于一种政治诱惑。

## 第十一章 国王出走

法拉赫的朝圣之行

扩音器战争

德黑兰的狂欢节

从霍梅尼大街到霍梅尼大街

冬天突然降临德黑兰，寒冷刺骨，大雪覆盖着坦克和新坟，寒冷侵袭着经常不生暖气的房舍。深受缺油断电之苦的居民急需衣服、燃料，特别是食品。新民族英雄霍梅尼和惊慌失措的美国人很快便一致认为，军方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他们也许能够以越来越高的流血代价把大城市的街道置于自己的暴力之下。然而，就连上述这点本事，也只能局限于一定的时间和某些地区。他们无法把那些决心以持续罢工来粉碎巴列维王朝统治的人赶回工作岗位。凭借武力显然不能维持这个国家的生计。尽管军政府执政，但警察机关和许多公共事务机关背离国家权威当局，倒向伊斯兰活动分子的倾向还是越来越明显。甚至一再出现这样的日子：旧秩序、旧政权的最重要任务似乎倒是一起来破坏这种秩序。在德黑兰执政的将军们显然没有能力控制部队、地方警察和那些受人煽动的不可靠的“萨瓦克”特务。从许多城市还传来反霍梅尼示威游行



的消息,但是这场大规模起义的组织者常常顺藤摸瓜,成功地发现,在这股逆流后面,有一批忠于国王的地方头面人物所雇用的无赖。

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邻居互助和伊斯兰协作自发地展开。大批衣服以比往常低廉得多的价格赶制出来并投入市场,基本食品在流动货摊上廉价出售,对一些最贫穷的人还免费供应。不过,警察或军队有时在夜间赶来抢劫、砸烂、甚至烧毁这些商品。商人竞相减价,以显示自己的社会良心。西方记者每天都能听到下面的话:“如果过去政府对我们说,我们卖一盒糖果只能要十个土曼,那么我们就要十二个。今天霍梅尼对我们说,我们应要十个,那么我们只要九个就够了。”这是一种把握一切的精神。但每个人终究都会明白,这种精神只在这一伟大的挑战时刻才会发挥它的作用。在拥挤的医院里,医生——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特权阶层——不计报酬地连续工作。医院门前设立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社会系统:只要医生在楼上喊一声,新送来的、在没完没了的巷战中负伤的人需要什么药品,那么此时在下面街道上站着的志愿人员,主要是大学生,便拿着罐子、盒子和帽子涌进大街小巷,到处募捐,然后赶到距离最近的药店采购。人们还向医生的汽车捐献汽油,甚至连街道也被志愿人员清理干净,这在血腥的游行和混战后往往是一项可怕的工作。

同时,冷酷的浪潮也席卷着居民,它表现在一种我行我素的心理状态中。人们怀着这种心理展出和传看重伤员和死难者非常可怖的照片。那些狂热分子要把司法权夺到自己手里的日益增长的倾向也反映出这种情绪。鲁霍拉·霍梅尼一再

从巴黎发出警告：“人民革命”不能泛滥成全面的无政府状态。然而，国王的追随者已经遭到血腥的清算。私刑业已试用到被押送的犯人身上。在德黑兰的埃斯梵德广场，坐在汽车里的拉蒂菲将军，被人们认出后，便立即被拦住，并从汽车里拖出来，痛遭群众拷打。一位毛拉拚命冲上去扑在这位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人身上保护他，但是已经太迟了。连那些不属于霍梅尼和即将诞生的“伊斯兰共和国”追随者的人，在这种明火执仗的街头暴力威胁下，也乐意否认自己的真实信仰。一天中午，在首都一条宽阔的阅兵大道上，人群拦住了一辆梅塞德斯牌小汽车，人们估计汽车里可能坐着几个特权阶层人士。三个乘客跳下汽车后，振臂高呼“霍梅尼万岁”和“杀死国王”的口号。于是人们就让他们把车开走了。这时，一位行人大叫起来，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汽车里的三个人是“萨瓦克”高级特务。

在那些发生在大街上的可怕冲突的冲击下，小心谨慎地把几万美国人和欧洲人疏散到国外去的行动，从十二月中旬起变成了毫无秩序的大规模外逃。外国工业康采恩逐渐停止了他们的生产。在使馆建筑物、西方公司办事处和外国人饭店的门前，已堆放了许多砖块，以备筑墙堵门。欧洲女人如果非要上街，那么都得用黑面纱把自己的脸蒙起来。这种面纱当时已成为伊斯兰革命的象征。甚至连法拉赫王后——多年来她一直是按西方模式进行的伊朗妇女解放的最高象征——也立即用面纱蒙得严严实实，赶到伊拉克圣城纳贾夫朝圣，并在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陪同下，访问了几周前阿亚图拉霍梅尼发布反国王号令的地方。新年之际，王后说：“我将逆

来顺受”。然后又忧郁地补充说，“如果必要，我宁可当场就死。”国王也在毛拉面前屈服了：“我曾以自己的言行为宗教信仰工作过，我已经把这些写在我的书里。我修复了几座圣城，而且到那里朝过圣。”但这些话显然没有给年迈的霍梅尼和人民群众留下什么印象。霍梅尼首先从这些低声下气的姿态中看出，这位国王已经在政治上赤裸裸地暴露在他的人民面前。国王茫然地、犹豫地坐在尼亚瓦兰王宫里，不断打电话请国内的所有政治人物向他解释，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其中有一个人后来摇着头说：“当时是很冲动的。国王看上去根本不理解，为什么人们都反对他。”他的感情在痛苦和忧郁的警告——卡尔·马克思亲自在霍梅尼的画像下疾呼——之间起伏波动。

军队是他的最后一根真正支柱。但是，军队中令人不安的发展倾向也不容忽视。霍梅尼不断向士兵发出的不要再开枪打死自己兄弟的号召大见成效。为了重新调整部队的部署，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每天都在进行。当局把士兵派到尽可能远离他们家乡和朋友的城乡去作战。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它标志着，在新兵当中开始出现道义上的反抗。当时，在人民中流传着关于士兵的新故事和传说。据说，一些绝望的青年军人，无视开火的命令，不是把枪口对着伊斯兰兄弟姐妹，而是指向自己的指挥官。在德黑兰，人们向士兵抛鲜花，试图把他们争取过来。

首都军法管制最高司令官曾经使用武力，镇压过一次由阿亚图拉霍梅尼煽动的叛乱。一九六三年，奥维西将军也是宗教暴乱时期的军事行动首脑，那时他成功地恢复了平静。

而现在他却碰到了一位完全不同的对手：狂热而组织良好的群众。他们面对着军队，扯开自己的上衣，高喊宗教口号，直接扑向机枪火舌。这种激情，使有些人想起数月前的另一起血腥事件——在遥远的圭亚那，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有时，革命者也戏弄那些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当坦克和冲锋枪向人群开火时，霍梅尼的人，手里拿着录音机，跟着军人一起跑，把战斗的喧哗声录下来。夜晚，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从扩音器里传出炮弹的轰鸣声和机枪的哒哒声，被吓得要命的士兵惊愕地缩成一团，人群顿时沉浸在一片幸灾乐祸的气氛中。

当然，在一幕要求其作者付出最大牺牲的戏剧中，这只不过是一次短暂的间歇。国内几乎没有一家工厂开工。只有碰运气才能得到诸如土豆或牛奶一类食品。拿着刺刀的士兵看守着加油站，供电每隔几小时便被切断一次，从天然气输送管里抽出来的只是空气。现在每少生产一百万桶石油，便使这个国家每天减少外汇收入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通常是六百万桶的日产量，已锐减到一百万桶以下。这个居世界第二位的石油生产国，在汽油及取暖用油供应上也突然宣告枯竭。对石油需求几乎是万万不可中断的美国，已答应向石油巨人伊朗提供石油，这条通过电传机发向全世界的消息，引起了种种奇怪的感觉。正在各大洋航行的超级油轮接到返回海湾的任务。以往似乎是那样取之不尽的输油站，现在，突然不得不把石油抽回来。

此时，反对派的知名人士纷纷乘飞机赶到巴黎，参见年迈的阿亚图拉霍梅尼，试图小心谨慎地劝他回到和解的道路上来。首先赶来的是长着山羊胡须的迈赫迪·巴扎尔甘。他是

一位被伊朗人视为摩萨台的真正继承者的政治家。接踵而来的是“民族阵线”领导人卡里姆·桑贾比。这两个人竭力主张，在保留国王作为象征性的、但在政治上无权的君主的情况下，逐步过渡到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权。他们认为，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可以执政，但不应实行统治。他们并不是以愿意给国王一个职位而享有名气的人物，他们的这种立场是出于对军队的害怕。他们认为，与军队对抗并不能使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发生变化，而只有在取得军队的赞同，至少是容许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国家的政治改革。但是，霍梅尼这个永不屈服的人，根本不想在经过几十年斗争后的今天——胜利已经在望——放弃战斗，采取新的策略。他固执己见，以倔强的精神创造了令人难于置信的业绩。所有在伊朗发誓反对国王的人都逐渐赞同了他的立场。当桑贾比离开诺夫勒夏托小镇的时候，他已不再是国王私下所期望的民族和解的新文官政府的妥协性候选人，而变成了一名不屈服的人：“国王必须下台”。在君主制反对者的队伍中，已经不再有人能够推行一条违背霍梅尼意志的路线，因为在群众的眼里，这位什叶派领袖已成为这场反抗斗争的唯一象征。

从一九七九年一月初开始，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威廉·沙利文开始郑重其事地催促国王出走。他说，紧迫的休假疗养现在不能再推迟了，因为王室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在政治上所作的所有尝试——总是只有反应而没有行动——已经彻底失败。首先是自由化的保证没有实现；回到比较开明的君主制度的许诺也未兑现；把政权交给王太子礼萨·居鲁士的秘密交易迄未成功。当然，如果权力交给王太子的话，必须暂时先

让一个摄政委员会代理执政。以前，通过把权力由父王闪电般地交给太子这种手法，君主制业已苟延残喘地度过了三十八年。现在，诸如此类的建议都被霍梅尼十分恼怒地加以拒绝了。当美国人于一月份具体地请求国王离开这个国家时，巴列维屈服了。他怀着懊丧而又不能理解的心情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先是成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然后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真的感到无所谓，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国家投入一场内战呢？图个什么呢？”

在此期间，美国人开列了一份关于各种可能在德黑兰出现的政治发展趋势的单子，并根据美国的利益加以摸底排队。由于保留一个至少是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努力或将权力交给王储的尝试未能实现，因此只剩下三种选择：一是在温和的反对派人士领导下的共和国；二是以霍梅尼为象征的伊斯兰共和国；三是最不希望出现的军人统治。因为华盛顿担心，军人政权很容易滑入左翼军官的政治航道，或者成为利比亚的翻版。因此，国王在离开伊朗之前，必须马上组织一个得到军方容许的、尽可能被大多数人民接受的文官政府。适合担任这一角色的人选只有一个：沙普尔·巴赫蒂亚尔。他在反对国王的斗争中，有着白璧无瑕的悠久历史，但是他与霍梅尼及其追随者之间，在一个主要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区别：他认为，政教必须分离。巴赫蒂亚尔以国王必须立即离开伊朗为条件，接受了他的职务。他要求将领们返回兵营。最终，他将因扮演这一角色而徒劳无功。但是，他上任的那一天，却被伊朗人民视为大喜大庆的日子——当然并不是由于他的缘故。

一月十一日上午，天气寒冷，阴云密布。但是到了晌午，

艳丽的蓝天拨开云雾，阳光照射在厄尔布尔士山脉的斜坡上。德黑兰市内又有几万人示威游行。此时，一架蓝白色的波音—727客机缓慢地在这个四百万人口的城市上空绕了一圈，然后向西飞去。统治伊朗人民达三十七年之久的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坐在飞机驾驶舱里，长久而深情地向“他的城市”——这个如此长期的独裁统治中心——俯瞰最后一眼。几十年来，他在这里一直生活在一种认为自己是受三千四百万人民所爱戴的君主的幻觉里。他打心眼里满怀希望，在其统治人民的后期，他所理解的进步能导致一个良好的结果。而事实上，他现在却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离开他的国家，在耍了各种各样的花招之后，在千百万人民所痛恨的情况下，悄悄地溜出了自己的王国。此刻，人民群众正在向另一位命运莫测的人欢呼。

仅仅是启程出国的表面气氛，就驳斥了关于他只是进行一次较长时间的休假疗养的正式上谕。机场上的秘密活动使人推测出，这是一种非常意味深长的离别。当巴赫蒂亚尔首相在机场上通知国王，议会刚才已对他的政府投了信任票时，在场的只有几个朋友和一小群经过挑选的记者。国王的出走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已陷入没有法制和无政府状态。记者们灵巧的手多年来训练有素，对每句金口玉言只作记录不加评论，此时此刻，记者的手记录着国王最后几句话：“正象我所说过的那样，我是去休假，我已经很累了。”但是，把一名想要匆忙地吻国王鞋子的士兵不耐烦地扶起来的力气还是有的。当穆罕默德·礼萨扶着妻子走向专机的舷梯时，他的眼泪已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王后看上去还算沉着镇定，但这显然是

借助于镇静剂的作用。两个星期来，她已把王宫里的奇珍异宝打点成随身携带的小件行装。

“危难时刻亲朋稀”，这个道理在飞行的头几分钟便显现出来了。曾把两家王室兴高采烈的合影照片装饰在安曼市郊哈希米亚王宫客厅里的约旦国王侯赛因，给了伊朗国王一个闭门羹——他认为，收容会产生内政问题。沙特人也谨慎地加以拒绝。只有曾凭借数以亿计的伊朗巨款，重建起苏伊士运河沿岸弹痕累累的城市的安瓦尔·萨达特表现得落落大方。当无家可归的国王夫妇自从德黑兰恶梦以来第一次走下飞机时，二十一响礼炮响彻阿斯旺机场上空。萨达特甚至从开罗用几架专机拉来了一大批陪客到埃及南方这座尼罗河畔城市参加盛大宴会，表现得非常热情。不过在政治上，他也是冷淡的。

广播电台播送国王出走消息的时间在德黑兰持续了三十分钟。这条消息在全国引起一场尽情纵荡，一场政治狂欢。人们载歌载舞，把鲜花插入士兵的枪口，第一批伊朗国王的头像从君主制的纪念碑上滚落下来。一群狂热的人把国王头像从钞票上剪下。新的纪年开始实行，地理名称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凡是此前以国王或王朝命名的街道、广场、村庄和城市，现在一律改称“霍梅尼”。这一天，人们可以在德黑兰像玩耍似地乘车从霍梅尼大街穿过霍梅尼广场到霍梅尼村去。此时，一股清洗的浪潮已经开始，它首先把驻在世界各国首都的忠于国王的大使逐出了他们的办公室。

当霍梅尼的随从人员从伊朗短波电台收听到这条消息时，正值诺夫勒夏托时间上午十点整（比德黑兰时间晚两个



半小时)。两天前，这位阿亚图拉还在抗议国王可能的出走，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必须因他所犯的一切罪行而受到伊朗法庭的审判。”此时此刻，那些以往一向很严肃的毛拉也哈哈大笑和纵情欢呼。但当他们的头头兼英雄得知国王飞离的消息时，却依旧丝毫不动声色。他只讲了几句话，第一句是属于宗教的：“真主伟大”；第二句是属于政治的：“这只是我们胜利的序幕”；最后，他还补充说：“在真主的帮助下，我将很快回到伊朗，回到你们中间，并成为你们的仆人。”

## 第十二章 重返家园

正义者的睡眠

两个首相——两个朋友

武器冒充柑桔

当“不朽旅”哭泣的时候

离霍梅尼“第一号革命飞行”成为现实的日子还有十六天。在这些日子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才能阻止众望所归的“伊斯兰共和国”的战斗洗礼。一支每天早上坚定地高呼“国王万岁”口号的陆军部队守卫着德黑兰。被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任命为首相的沙普尔·巴赫蒂亚尔已经宣誓忠于宪法,但同时又被迫进行民主改革。他铁了心,一定要坚持下去。“一位首相决不在一位大阿訇面前屈服”,他说,“难道你们想用一种新的专制政治取代过去的专制独裁体制吗?”巴赫蒂亚尔绝望地奋战,试图使经济和官僚政治重新充满活力。但这只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每天都听到所有政府部门陆续转向霍梅尼的消息。当巴赫蒂亚尔在电视摄像机前保证,即使在没有外交部的情况下他也要继续执政时,其言其行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而此时此刻,在巴黎市郊诺夫勒夏托镇的谢弗勒兹大街旁却挤满了深色的大型轿车。

此情此景使人想起了在波斯波利斯遗址上旧世界的使者来到波斯，列成长队参谒神圣国王的著名浮雕。在二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来自伊朗的政治家、来自欧洲的商人、来自美国的外交官和来自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记者，都在等待这位石油天堂的未来主人的接见。但霍梅尼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宽宏相待。商人们有时只被接见三分钟便回到马路上；记者们在提出第四个问题后便被送客出门；来自伊朗的政治家只有在事先就辞去国王任命的职务时，才能获得召见的机会。为了接待这些人，此处炊烟日夜不息，凡是前来拜访霍梅尼的人，都能吃上一顿白糖豆饭。

在这种喧哗的热闹场面背后，隐藏着这位阿亚图拉在其一生七十七年中所要经历的最大挑战。伟大的胜利已经唾手可得，这位看来不会妥协的花岗岩似的人物，现在突然不得不讲究点策略。国王出走之后，他怎样才能在不迫使军队投入血腥决战的情况下，使伊朗国内的革命精神旺盛地保持下去呢？怎样才能赶走巴赫蒂亚尔，而又不至于挑起内战呢？霍梅尼逐渐面临这样的困境：如果他推迟回国的时间太长，那么，初期爆发的激情巨浪便会在德黑兰渐渐平息，一场在正统的什叶派分子和目前还算克制的马克思主义分子之间争夺政治战利品的战斗将迫在眉睫。但是，如果他过早地返回，最终将不利于全国各兵营内发生重大转变，而霍梅尼正对这种变化寄托了自己的全部希望。越来越多的士兵，特别是空军，已经在转向伊斯兰运动，他们是在街头上那些令人可怕的景象的压力下，以及在教会进行持久的心理战中采取这一行动的。毛拉天天在施加压力：“军队必须当机立断，一条是通向真主、

通向伊斯兰教和伊朗独立的道路；另一条是倒退到独裁专制和流血牺牲的道路。”这些话动摇了军营里的人，使他们心神不定，处于政治逻辑和昔日效忠之间的矛盾中。关于将军们已开始处决逃兵的流言，从全国各地传到德黑兰。

霍梅尼从流亡地鞭策群众一再举行新的示威游行。国王，这个以往斗争的头号对象几乎已被遗忘，群众此刻需要新的现实的敌对目标。因此，沙普尔·巴赫蒂亚尔便成了一个政治幽灵，成了一只防护面具——未被摧毁的国王权力实际上还隐藏在它的后面。这位首相的确已陷入一种难以忍受的境地：只有在霍梅尼同意的情况下，国内的石油才会流出；只有霍梅尼下达命令，火车才会开动；只有霍梅尼愿意，商店才会开门。几个星期之前，正直的巴赫蒂亚尔律师还在议会中拥有压倒多数，而现在，新议员每天都摘下帽子，恭顺地朝巴黎方向鞠躬致敬。那些由政府首脑派往法国、到这位无所不在的阿亚图拉总部去的秘密调解人，却一去不返。他们在霍梅尼别墅的门前拆除了所有与国内政府联系的桥梁。

一月份即将结束时，德黑兰的街道和医院再次经历了恐怖景象。军队想用暴力来维护巴赫蒂亚尔的权威。但适得其反，他们反面以此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当霍梅尼预告他即将回国时，德黑兰的首相只好为争取时间再玩弄一些新花招。伊朗的所有机场一律关闭，据说“是因为天气恶劣和出于技术原因”。士兵从准备接待那位人民宠儿回国的专机上拆去了起飞装置。巴赫蒂亚尔早已明白，在统治这个国家方面，他已经大权旁落。出于担心人民和军队之间会爆发迫在眉睫的大屠杀，他试图延缓霍梅尼凯旋归国的时间。他想亲自飞往巴黎，

与霍梅尼达成一项逐步交权的协议。但是，那个老家伙不愿意接待他，阿亚图拉简短而冷淡地说：“辞职以后才可能进行一次会晤。”在伊朗人中，已经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连真主也想见见霍梅尼。”这位什叶派领袖说：“可以，但要等他辞职以后才行。”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当行装终于在诺夫勒勒夏托打点完毕时，伊朗军队的精锐部队手持致命武器，耀武扬威地驱车穿过德黑兰市中心。国王卫队威胁地吼叫：“国王万岁！”但是，突然之间，躲在门窗后面的居民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原来，在武器林立的行进队伍中，士兵们站在卡车上，手里挥动鲜花，凯旋般地高高展示出一张张霍梅尼画像。分裂的茵苗业已如此深入地扎在兵营之中。人们的心里充满着一种喜悦、害怕和没有把握的复杂感情。没有人知道，事态将会如何发展。对前几天事件所抱的担忧，暂时被这狂热的场面所掩盖。五万名军人佩带白色袖章，以示自己是霍梅尼的士兵，他们将在二十四小时之后免遭由于群情激昂而造成的可怕混乱的袭扰。沉重而珍贵的波斯地毯，被送到玛德雷舍·阿拉维伊斯兰教女子学校。这里距议会只有几百米，位于首都北部富人居住区和南部贫民窟之间的交界处。圣人将在这里设立他的总部。含酒精的饮料顿时从城市中勉强维持营业的饭馆里消失了。

在谢弗勒兹大街旁，人们此时正在冻僵了的苹果树的阴影下，把飞机票分发给一百五十名将随同参加这次伟大飞行的记者。对每张机票，毛拉们索取现金三百四十五个西德马克。然而，在这行色匆匆的最后时刻，流亡者鲁霍拉·穆萨

维·霍梅尼本人却不得不怀疑，多年来望眼欲穿的回国时刻是否真的业已临近。一个“保卫宪法战士指挥组织”在伦敦已经宣告，将击落这架专机。因此，阿亚图拉没有让伊朗妇女和儿童随同上机，连那些在最后的岁月里陪同他的亲密随行人员也不得不乘下一班飞机动身。“你们是否与我同机并不重要，”霍梅尼安慰他们说，“唯一重要的是，你们要在斗争中继续忠于我。”

巴黎外交部的克洛德·沙耶来到已经全面封锁的法国首都机场，以便为这位深奥莫测的阿訇送行。他在西撒哈拉冲突中因担任与阿尔及利亚所支持的“波利萨里奥”阵线谈判的中介人而出了名。他是一位多谋善断的外交官。一星期前，他曾秘密地对记者说，这位重返家园的霍梅尼不出八至十五天便能掌握统治伊朗的大权。此刻，在机场上，他的信心就更大了：“我敢把我的赌注翻一番。”这架一点十五分离开法国土地的白色大型喷气式客机没有标在机场各候机厅的大型预报板上。这的确是一次奇怪的特许飞行：飞机第一层舱里的酒吧间已被撤除，当有人请求空中小姐提供烟酒时，她们只得表示歉意。她们不能进入头等舱，因为那里正坐着这位年迈的老人。他身裹黑色斗篷，沉默地靠在舷窗旁，凝视着夜色。在最后几个小时里，对所有陪同他的人来说，他的举止成了这位深奥莫测人物的绝对神秘性的最后明证。在他面前矗立着七十七年生涯的顶峰。这是在经历几十年战斗、凌辱和流亡之后的凯旋。现在，实现全部希望的时刻就在眼前，国王已被推翻，梦寐以求的“伊斯兰共和国”业已在望。当飞机几乎还没有达到飞行高度时，霍梅尼就站起身来，慢慢地顺着螺旋形楼

梯走上大型喷气式客机的上舱，跪下来祈祷着。然后他让人拿来两条毯子，躺在飞机的地板上，安然入睡。正如不得不经过他身边到飞行员驾驶舱去的、惊奇的机组人员所说的那样，“他睡得非常安详和深沉。”

当白雪皑皑的厄尔布尔士山脉的山脊终于在飞机下方出现时，一位美国记者匆匆跑到霍梅尼面前，提出此时此刻他有何感想的问题，霍梅尼俯瞰那座目前确实位于他脚下的城市，在飞近德黑兰上空时十分简短地回答道：“没有。”

突然，“法国航空公司”在起飞准备时所持的担忧似乎就要变成现实。由于害怕军方通过封锁飞机跑道进行最后一次抵抗，因此这只空中巨鸟只运载了一半乘客，以便在紧急情况下飞机有足够燃料作巴黎—德黑兰航线往返直线飞行。大型喷气式客机在城市和南部贫瘠的农村上空转了大半圈，因为此时地面还没有发出允许着落的信号。过了一会儿，信号出现了。飞行员对准飞机跑道飞行——但是在距离地面几百米的时候，飞行员又不得不再次把沉重的飞机陡然向上拉起，因为此刻有一架军用飞机正在第二跑道上起动，现在降落也许太危险。没有人知道，此时此刻究竟有几百万人正注视着天空。

伊朗电台在当地时间八点三十分第一次报道，飞机已出现在首都上空。九点三十九分，这位老人经过将近十五年的流亡后，确确实实踏上伊朗的土地。人群被阻隔在远离机场区域的地方，“只有”一千二百名政治家、毛拉和记者拥挤在一起，充当欢迎委员会。聚集在这里的人们早已知道，霍梅尼在他重返家园的头几分钟要对他们说些什么，不外乎是一些简

短而又辞不达意的讲话，而且总伴之以反对国王和外国对这个国家控制等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他说话时声音很轻，毫无表情。他的话本来也未必那么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他的到来。“统帅来了！”

此刻，全国城乡千百万未能直接参加机场上欢迎仪式的人们勃然大怒。电视台的技术人员特意中断了罢工，以便让全国人民能通过电视共同分享这一全民同乐的时刻。当这位白髯老人在一位法国飞机乘务员的搀扶下走下飞机舷梯的情景刚刚出现在屏幕上时，转播却中断了，图象顿时消失。伊朗人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温文尔雅、笑容可掬的国王，扩音器里响起国王赞歌。原来，在这几分钟里军队开进了电视中心。他们感到自己受骗了。霍梅尼派的电子技术人员在这天早上没有象往常那样以国王赞歌开始播放节目，而是以一支爱国民歌开始播音，这已经超出军官们今天所能容忍的限度。在伊朗许多城市里，恼怒的居民把自己的电视机从窗口抛到大街上。

沿机场到贝赫斯特—扎哈拉墓地三十公里的道路上，过去群众示威时的那种愤怒气氛现在已不复存在，宗教哀乐所渲染的愤懑和悲观失望的情绪也烟消云散。数以百万计的人群沉浸在一片极度兴奋的狂热之中。霍梅尼疲倦、呆板、心不在焉地招手致意，消失在人群的海洋里。一群人想见见他，摸摸他，从而引起了一派混乱和拥挤的场面。站在汽车顶棚上的保镖们不得不毫不留情地把潮水般涌来的人群阻挡住。手握方向盘的司机早已看不见道路，甚至驱车压了人。当汽车在人群中再也无法开动时，直升飞机赶来把这位伊马姆送到



革命烈士墓去。在这千百个最近几个月来死去的人们安息的地方，霍梅尼对伊朗过去和现在的政权进行了清算。他威胁巴赫蒂亚尔首相：“我将迎头痛击这个政府。”他问群众，由一个非法议会和一个非法君主任命的代理政治家怎么还能合法地掌权呢？人民将用二十年时间，才能把由于国王的土改和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破坏弥补过来。“他把这个国家毁掉了”，霍梅尼激愤地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扩建的唯一东西实际上就是伊朗的墓地。”阿亚图拉还是头一次在他的讲话中运用了一种戏剧性的表达方式：举起手，握紧拳头。然而，就连这么一个姿态也显得有些做作，同他严肃呆板的容貌极不相称。

在讲话的结尾，霍梅尼向一直阻止他取得胜利的军队发出呼吁：“我对武装部队有一个请求，我们很希望你们能保持独立，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忧虑的时代，我们已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青年人的血。我们为此不惜以我们的荣誉孤注一掷，我们的阿訇不得不因此遭到逮捕和刑讯。我们现在所期望的一切，就是你们的独立。将军先生，难道您不想独立吗？少校先生，难道您不想独立吗？难道你们真的想当一辈子狗腿子吗？”这次讲话后爆发出来的崇拜情绪，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只有一辆救护车才最后得以把这位重返家园的人从混乱中解救出来。人群高呼“真主伟大！”但也高呼“霍梅尼伟大！”

这种激奋情绪延续了好几个小时，好几天。设在市中心的总部变成了一个圣地，在那里，霍梅尼伫立窗旁，让人们向自己凝视、雀跃。但此时此刻，他仍然是一个把严厉报复心理

隐蔽起来的戴着假面具的人。在他回国后三天，另一位人民领袖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不快。他在库姆说：“远离一个独裁政权生活的人，要成为一名激进分子，是容易的。但是，当人们必须在枪林弹雨的持续威胁下生活时，那么也不得不寻求另一种策略。”他还说，任何人无权自称自己单独垄断了唯一真正的伊斯兰教义。这一天，沙里亚特—马达里的话在报界只引起一点点怜悯。

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当霍梅尼任命一个唱对台戏的政府时，巴赫蒂亚尔首相仍自信地说：“这简直是个笑话。”但是，新革命政府首脑的名字最终还是战胜了沙普尔·巴赫蒂亚尔。阿亚图拉说服了七十三岁的迈赫迪·巴扎尔甘担任总理职务。这时，巴赫蒂亚尔原先关于必要时逮捕对台政府成员的威胁反而成了一件难堪的事。自摩萨台时期以来，这两位目前在德黑兰相互对峙的首相就一直是知心朋友。此时此刻，巴赫蒂亚尔自己也直截了当地承认：“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尊重他。”对霍梅尼和巴扎尔甘来说，他们结合在一起是相当重要的一步。他们在信仰上是一致的，但在政治策略上却有分歧。巴扎尔甘主张通过一系列小型的非暴力步骤，逐渐将君主制转变成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在国王统治下，他受的苦远比霍梅尼大得多。这位长着小白胡子的瘦弱而秃顶的人，曾在摩萨台手下充任过刚收归国有的伊朗石油公司首脑，他因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坐过四次牢，但仍然是一位温和派人士。

他是霍梅尼所需要的那种至少能把部分军队联结到他的新伊斯兰运动上来的桥梁。作为人权主义者和政治家，作为

技术专家和伊斯兰教的虔诚弟子，巴扎尔甘没有敌人。他曾写过一些西方怀着浓厚兴趣拜读过的、关于霍梅尼的书；传统的伊斯兰教的价值怎样才能与一个以工业技术为主导的现代化社会协调一致。要对付这个人，巴赫蒂亚尔既没有个人的决心，也没有必要的支持。因此，霍梅尼起用一个代理政府的朋友作为对手，并向这个代理政府提出了挑战，这是到目前为止尚不出名的策略家霍梅尼所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巴赫蒂亚尔继续战斗的日子肯定不会再拖延下去了。二月九日，星期五，在德黑兰市郊法拉哈巴德兵营里的军校学生，聚集在一起，再次从电视里观看了关于霍梅尼回国的七十分钟的影片汇编。许多人为发生的事件所感动，跳起来大笑欢呼。于是，在电视屏幕前爆发了一场同忠于宪法的士兵进行的争执，接着便交手搏斗。这一切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人从外部进行煽动。当霍梅尼的口号刚一响彻整个兵营时，岗哨立即发出警报，向驻在拉维萨姆的国王精锐部队“不朽旅”指挥部求援。几分钟后，满载士兵的车辆滚滚驶过德黑兰市。国王卫队的第一批士兵刚到达法拉哈巴德兵营时，震惊的霍梅尼追随者纷纷冲向那里的武器库。有人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阿亚图拉的总部。晚上大约十点半，成千上万的人从附近的房屋里冲到大街上。对他们来说，国王和伊斯兰革命之间的最后决战现在肯定是开始了。

突然之间，人民用以保卫自己领袖的武器也出现了。早在霍梅尼返回国内的头几天里，这些武器就已秘密地分发下去。许多武器是在过去几个月当中从利比亚、阿富汗弄来的，但主要是由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供的。

后来据说，在许多早已运到库姆的柑桔箱子里装的就不是柑桔。

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这一天，群众掌握了武器，士气大振。黑夜中，几万人无视宵禁令，在法拉哈巴德军事基地和霍梅尼寓所周围构筑街垒。坦克驶近了，但没有介入。国王卫队与忠于霍梅尼的士兵展开的战斗很快就超出了兵营地区。当时，德黑兰市几乎在经历着一场使人人颤抖的内战。大批人手持武器，冲向军事基地和监狱，抢劫军火库，并释放几千名犯人，其中还稀里糊涂地错放了许多新近被捕的“萨瓦克”首恶分子。在随后的星期日那一天，就有整整一千人死于非命。然而到了二月十一日，却发生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完全难以置信的奇迹：所有警察兵营的人员首先加入了起义者的行列。随后，德黑兰最高军法管制司令官迈赫迪·拉希米将军下令停止战斗——他的前任奥维西早已前往美国“检查身体”。后来，伊朗武装部队统帅部在与巴赫蒂亚尔首相会晤后，宣布中立，并命令士兵撤回兵营。而巴赫蒂亚尔自己却销声匿迹了。

十二点整，孔雀宝座彻底倒坍了。这时，成千上万人开赴王朝的最后两个据点：“不朽旅”兵营和尼亚瓦兰的国王冬宫。这支精锐部队的每一个人都曾举手向国王宣誓效忠。士兵当中有许多人十分忠于国王，甚至相信他是长生不老的，因此得名“不朽旅”。现在，国王卫队面对汹涌而来的人山人海，把坦克炮口瞄准着他们。人们距离重型坦克只有几十米远，最后一场浴血大战似将一触即发。正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奇迹：精锐部队的士兵们从美式和英式坦克里爬出来，从碉堡里

钻出来，将自己的手提武器交给霍梅尼的卫队。那些在过去几个月里在大街上枪杀了数以千计的示威群众的军人，惊慌失措、丧魂落魄地消失在人群之中，有的还痛哭着。原来有人曾带来了一大批的便服，伊朗王国最忠诚的士兵便穿着外国的汗衫和裤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的确是一句双关妙语。

“没有一支军队能够用来持续镇压本国人民，而与此同时，自己却不遭受损害。”近东专家阿诺尔德·霍丁格早在德黑兰事件证实他的论断之前，就这样写道：“当士气和战斗力危险地下降时，军事将领会认为，保存自己的工具比维护对国王及其政治目标的忠诚要重要得多，这样的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这就是在伊朗最终导致一支军队以战史上最快的速度土崩瓦解的根本原因。阿訇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以此到达了其一生的顶点，他从国王的敌人变成人民的朋友，最后成为统治伊朗的主人。

占领德黑兰北部的尼亚瓦兰宫成为推翻君主制的象征，而攻占“不朽旅”兵营则是军队失败的标志。最优秀的军事专家曾准备使用这支军队来对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然而，如何对付赤手空拳的群众对武装到牙齿的军队的叛乱，在他们的锦囊里边却没有什妙计。

### 第十三章 警察下台

弗朗肯施泰因<sup>①</sup>式的怪物  
美国中央情报局毫无察觉  
穿长袍的卡尔·马克思吗？  
废铜烂铁终将威胁着它

伊朗发生的巨大转变最后集中在两次特别飞行上：国王飞走，霍梅尼飞来。王冠换成缠头，从而引起了世界政治的大改组。此时，在世界上的许多权力中心，一张张因此而目瞪口呆的面孔，不但与伊朗人民的欢乐气氛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他们在政治上对伊朗事件怎么也不那么容易理解。难道这里不正是推翻了一位几十年来在人民中播下恐怖种子，因而被西方人权政治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国王吗？难道这里不正是赶走了一个无情驱逐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因而被莫斯科、直至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当作宿敌的帝国主义分子吗？难道这里不正是褫夺了一个以伊朗历史的荣光为赌注，妄图

---

<sup>①</sup> 弗朗肯施泰因是英国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在其一八一八年所著小说《弗朗肯施泰因》中的生理学研究(他创造一个怪物而自己最后却被怪物所毁灭)。这里是指作法自毙的意思。——译者

成为整个地区、乃至大半个阿拉伯世界的卫士和警察，因而被全体阿拉伯人视为潜在敌人的近东君主的权力吗？然而，可以看出，当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出走，霍梅尼归来时，不论是美国的民主主义分子还是阿拉伯的首长，不论是莫斯科的共产党人还是北京的共产主义者，对此都不感到高兴。

年迈的阿亚图拉的胜利，使西方惊慌失措，使东方一筹莫展。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充其量不过是反应的强烈程度有所不同。任何地方的反应都没有华盛顿那样强烈，那里的政治家认为，自越南战争以来，这是最大的外交危机。欧洲的反应恐怕也不算小，那里的将军因此而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值夜班。随着国王穆罕默德·礼萨的下台，西方政策的基础倒塌了。所有人曾经盲目地相信这一基础是永固的。在能源供应中心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中央条约组织这两个西方防御体系的接合部，一位不出名的人接管了指挥大权，而且还是一位公开对美国人、英国人和所有“帝国主义分子”表示厌恶的阿訇。西方在苏联和世界石油天堂之间制造的封锁被粉碎了。

亨利·基辛格说：“伊朗的局势对西方来说是一个悲剧。”霍梅尼胜利之后，美国和欧洲的战略家们纷纷扔掉过去的防御方案——而抽屉里又没有可供选择的其它方案。当人们在德黑兰欢庆新“伊斯兰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美国技术人员正在悄悄地把设在与苏联交界的伊朗北部边境一线的秘密监听设施撤走。美国已制订出应急计划，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弄回当初华盛顿投其所好卖给伊朗国王的极其先进的尖端武器。在新偶像霍梅尼周围所掀起的纷乱气氛中，一张也许为某些外交官所熟悉的面孔在德黑兰消失了：埃里希·冯·马尔博

特。据官方称，这位美国人到此地来是为了就停止业已决定了的武器的供应问题进行谈判。但这个人过去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已证实他是一个抢险专家——在越南战争行将结束的日子里，他接受了一项危险而又麻烦的任务：在共产党敌人到达前，尽可能多地抢救美国的秘密物资。

这支近东和中东最强大的军队，在伊朗以十分奇特的方式失去了自己的统帅——国王。在国王当政的鼎盛时期，军队曾是他最喜爱的玩具：“五、六年内，伊朗将上升为世界上第五大军事强国。”——在谈到这一自豪的看法时，国王特别强调指出，伊朗当时拥有四十多万士兵，二千二百辆坦克、四百多架战斗机、三十艘战舰和一支全世界最强大的气垫船队。一位毛拉突然接管了这支武装力量的最高政治控制权。但它是否会迅速地落到更加危险的人手中，这是无法预测的。

一九七九年初，随着国王的垮台，一个使人神魂颠倒的狂妄自大的幻想破灭了。自英国人结束在苏伊士以东的历史使命后，国王曾有计划地将这一幻想变成现实。为此，国王从伊朗——世界第二大产油国——出售其乌金所得的利益中，抽出四分之一的美元用于购置军火。有二十多万美国人靠给伊朗生产军火生活。仅仅在伊朗，有将近五万名美国顾问、技术人员、退休将领和代理商，从事把伊朗军队和美国武器熔为一体的事业。这种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是伊朗人民起义的根源之一。“至今，外国人始终在干涉我们的事务，”霍梅尼在他流亡的岁月中说，“我们只不过是外国利益的帮手，只有在人民自由、国家独立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进步。”维护独立本身并不是国王的目标，国王完成了三项根本任务，其中



至少有两项是为人作嫁。他想守卫与苏联接壤的长达一千八百公里的伊苏边界，为了自己，也为了西方。他想替波斯湾那些毫无防御能力的阿拉伯小酋长国充当警察和保镖——工业国因此而赞赏他。最后，他还想以一支威慑部队与邻国和宿敌伊拉克对抗。对于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这些近东石油的最大主顾来说，伊朗王国具有一种几乎是无以伦比的重大意义，它自觉自愿地保卫着贫油国家的生命线。此外，它在中东还是沟通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之间相互联系的唯一秘密桥梁。

“对我们共同的军事稳定来说，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比伊朗更为重要的了，”早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吉米·卡特就这样说过，当时他正举杯向笑容可掬的石油上帝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敬酒。这位美国总统兴高采烈地补充道：“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对一位站在我面前的国家领导人更多地表达我个人的谢意和友谊。”一年后，霍梅尼老人的上台，在华盛顿激起不同往常的感情冲动，主要是恐慌和担忧。虽然美国人可以指望他保卫伊朗的北部边境以对抗苏联，但真主的这位杰出战士，一开始就断然拒绝充当控制所有油源的警察；“对我们来说，这个地区的战略意义，与那些用贪婪的目光注视这里的人所想象的截然不同。”

而国王以前采取的行动则与此不同。在每次外交危急关头，他都明确地支持西方。他毫不顾忌国际压力，向以色列、南非和罗得西亚提供石油；他曾于一九七三年呼吁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立即结束石油危机；在越南战争的高潮中，当一支美国航空母舰编队因为燃料耗尽丧失活动能力停泊在印度洋时，他悄悄地派一艘满载的油轮前往支援；在印支决战开始

时,国王甚至指派一中队鬼怪式飞机开赴西贡;他以必须防止政治匪徒袭扰通向石油天堂入口为借口,占领了波斯湾的三个岛屿;他派遣几千名士兵,帮助阿曼苏丹镇压了一场发生在边陲省分佐法尔的叛乱。

这种拔刀相助的精神,诱使华盛顿、伦敦、巴黎及其它地方的最高政治家逼迫他们军备工厂的流水线加速运转。他们为伊朗军队制造并提供了西方防御集团北约尚未装备部队的飞机和导弹。他们还为伊朗发展了当时许多富裕的工业国家也根本买不起的侦察系统。但在这些年里,有不少美国及欧洲的外交官和将领开始提出疑问:伊朗国王贮存如此规模的毁灭性武器究竟要干什么。难道在西方民主主义分子的不断爱抚下,这里最终将产生一个弗朗肯施泰因式的怪物吗?一九七五年初,在一本题为《波斯人来了——伊朗国王怎样征服世界》的书中所描述的恐怖故事,使几百万西方读者感到震惊。这是一本充满惊险内容的启示性幻想小说,许多居领导地位的军事专家认为,它是很现实的。战略家预言,再有十年,伊朗将在军事上压倒大部分邻国。当然,要认真地向苏联挑战,王室军队的兵力显然还是太小;但要对付东部和南部的邻国,保卫自己的国家,这支军队却又显得太大了;因为巴基斯坦自从孟加拉国分离出去以来,重创未愈;阿富汗太落后;土耳其是传统的朋友;海湾诸国本身还缺乏防御能力;伊拉克的人口只及伊朗的三分之一。

霍梅尼阿訇的胜利,公开给国王建立这样强大的军备究竟是为为什么的问题作了一个最后的答案。伊朗国王把他的军队搞得如此庞大,无非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巩固自己的王朝。

国王不断以配备新型的武器系统宠溺其将领，据他本人认为，他们是国内唯一能够给予君主制毁灭性打击的力量。他以一种严格的、唯命是听的等级制度和金钱诱惑使这支军队实际上不会去造反。一切重要任命都通过国王本人。指挥系统亦只有通过他才能相互衔接。伊朗军官的生活穷奢极欲，即使与君主国其它特权阶层相比也是没有先例的。他们除取得超级薪水外，还有配备佣人的免费别墅和那些只有少数人能享用的度假中心以及设在德黑兰的内部商店——军官们可以廉价地免税购买西方奢侈品。哪里出现青年军官——这些人从事政治活动，并批评军队过多地受外国影响（每十名士兵就有一名美国顾问）——闹事，国王就在那里强硬地镇压。仅一九五四年就有整整六百名军官被枪毙或判处长期监禁。

国王以抵御来自北方“红色侵略”的名义，用几十亿石油美元，不仅为其将领购买了医治职业病的良药——武器，而且还使美国对他在国内采取的镇压措施保持沉默。一九六一年春，约翰·F·肯尼迪再次威胁道：将要“严厉审查伊朗在美国全球战略计划中的作用，如果伊朗王室不采取步骤，改善国家的内政健康状况的话”。对此，国王本人深感不安，并宣布开始进行一次“白色革命”。然而，先前业已承诺的改善这个国家的状况，结果到头来只不过是一种橱窗式的装璜。自那时以来，美国一再要伊朗尊重人权，但也只停留在毫无束缚力的要求上。美国在波斯湾的政策越是依赖伊朗国王，那么因施加太大压力或者甚至因与反对派进行接触而冒犯他的风险也就越大。没有任何人能比阿亚图拉霍梅尼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悲剧性的关系。在漫长流亡岁月的传经讲道中，霍梅

尼一再批评美国的武器援助是对伊朗暴力政权的直接支持。

这位年迈的什叶派领袖的上台，的确使自由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大为震惊。作为伊朗王朝最亲密盟友的美国，惊惶失措地注视着国王的没落和霍梅尼的胜利。美国国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又揭了一些使美国人再次感到丢脸的老底。如同在一九七四年希腊和葡萄牙事件，以及越南和近东十月战争时期那样，一个对世界政治极其重要的转变又使这个西方的领导国家感到毫无准备。从毫不留情、开门见山的检查中，人们可以看出，霍梅尼及其人民革命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遭到忽视。原来，伊朗国王已受到美国人如此高度的宠爱，致使在华盛顿掌权的那些政治家根本没有胃口去对国王的权力基础进行严肃认真的分析。少数对巴列维王朝坚固稳定的传说表示不相信的美国外交官和秘密间谍的意见被束之高阁，他们的论据无人过问。

为了不惹怒国王，历届美国总统始终派遣那些在私人关系上与王室政权亲近的大使到德黑兰赴任。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首脑理查德·赫尔姆斯曾得到驻伊大使职务，因为他与国王曾在同一个瑞士寄宿学校上过学。应对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九年秘密轰炸老挝平民负责的威廉·沙利文，在担任德黑兰外交使团团团长时，把大规模群众示威贬为“小事一桩”。当几十万人已经高举霍梅尼画像在伊朗各城市游行时，沙利文而对着画像还一再问道，“这个老家伙，这个在巴黎的捣乱分子，他的名字叫什么来着？”美国政府和伊朗王室沆瀣一气，致使前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直至最后仍在著名的、也是臭名昭著的“巴列维基金会”的管理委员会里任职。凡此种种，使人恍

然大悟，为什么美国情报组织——中央情报局——没有得到从伊朗反对派中收集情报的许可，为什么有人指示它从伊朗特务机关“萨瓦克”那里接管情况分析的任务，为什么它没有派精通波斯文的间谍。

在戏剧性的一九七八年，美国情报组织五次编写并提供了一种关于伊朗的文件，五次的结论都是：“国王还可执政十年。”当大批群众已经开始在德黑兰死于非命时，中央情报局还一再向白宫的总统打保票，伊朗“既没有处在革命阶段，也没有面临革命前夜”。作为公众舆论第三根支柱的美国报界所采取的一种罕见的不予置评的方针，也在伊朗事件中表现出政治上的冷漠和象中央情报局那样的麻木不仁。一向喜欢与政府政策保持明显距离的新闻界，对王室的镇压措施却令人吃惊地充耳不闻，而且对国王反对者的真正实力——特别是什叶派教会的内情——非常不感兴趣。当霍梅尼及其人马已经站在掌权的门槛边时，报界仍然认为他们是一种“宗教狂热分子和马克思主义反对派之间奇怪的混合物”。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被贬为“闹事”或“骚扰”；人民起义在最后阶段所得到的形容词还是“狂热的”和“无理性的”。所有这一切，必然使政治首脑们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伊朗是一个“稳定的岛屿”。

当理查德·赫尔姆斯于一九七九年年初绝望地逼迫华盛顿政府故伎重演，使伊朗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时，国王早已失败。过去，无人听取诸如参议员弗兰克·丘奇一类人的忠言，丘奇多年来一再指出：“我们正在信赖一座终将朝我们和我们盟国倒塌下来的空中楼阁。”如果这座楼阁倒塌，成为废墟的将不仅是伊朗国王的伟大战略形象。面对霍梅尼这个怪物，

美国和同它站在一起的整个西方，都将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伊朗事件显然未能使苏联的日子更好过些，这倒是—个小小的慰藉。苏联也无法与阿亚图拉及其毛拉们打交道。虽然国王几十年来一直受到被禁止的、忠于莫斯科的伊朗人民党从苏联，尤其是从东德土地上发出的抨击，但苏联也没有从国王的垮台中，真正捞到什么政治利益。尽管伊苏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决战，尽管国王以西方的名义扮演着警卫的角色，多年来，伊朗王国还是与苏联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虽然国王已经把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一直推进到“萨瓦克”的刑讯室里，但东欧的大学，还一再把博士帽扣在国王的头上。在克里姆林宫的眼中，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不失为一位举止和野心尚可理解的人，与他可以卓有成效地展开贸易——一九七八年的贸易额至少达到十一亿美元。莫斯科可以同他谈判石油供应问题，以克服八十年代在本国供应中将紧迫出现的短缺局面。到一九八一年，伊朗通向苏联的输油管将铺设完毕。但与此相反，苏联的政治首脑在很大程度上无法理解年迈的长着大胡子的阿亚图拉及其按先知穆罕默德的榜样建立起来的什叶派天国。对苏联领导来说，德黑兰的毛拉甚至是一种威胁。因为沿伊朗边界的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居民在风俗、文化、特别是在他们的信仰方面，与伊朗人民极为接近。他们始终不断地反抗莫斯科政府剥夺他们民族特性和迫使他们改变信仰的企图。在夺取伊朗政权的决战中，为“伊斯兰共和国”而战的斗士们，一再指出了霍梅尼的国家必将产生的带头作用。

但是，国王最忠诚的战士之一亨利·基辛格仍然推测，在

毛拉的长袍后面隐藏着莫斯科伸来的长手。他认为，“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计划，如此完善的示威游行决不可能发生。”理查德·赫尔姆斯十分有把握地说：“那些关于苏联插手是没有证据的谣传，纯系废话。‘克格勃’就在那里，我们必须动用中央情报局。”像伊朗这样的群众运动，完全出乎美国间谍和政治学教授的战略理解力的意料之外，同样也是克里姆林宫所没有估计到的。

伊朗事件的惊涛骇浪迅速冲击到邻国，它改变了中东激进国家和温和国家之间的均势，但主要还是改变了沙特阿拉伯的作用。这个国家的中世纪政治结构所承受的颠覆压力将比以往更加猛烈。很早以前，美国政治学家就批评过：“我们把自己在石油中心地区的安全建立在两个君主国的基础上，如果其中一个垮台，那么另一个也会动摇。”沙特阿拉伯也存在与伊朗类似的问题。它的社会也跨入了二十世纪，它的政治统治距离民主主义的标准比国王领导下的伊朗还差得更远些。在沙特人眼中，国家、王室和石油收入互相交织，纠缠不清。与巴列维统治下的情况一样，王室家族在这个沙漠王国的经济中起着与伊朗情况相同的支配作用。美国人在沙特阿拉伯也拥有与他们在海湾彼岸的伊朗所具有的大致相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霍梅尼发现了德黑兰王室统治的滔天罪孽，而沙特王室自从这个君主国成立以来，就小心翼翼地尊重教会的正统观念，并认为自己是保护麦加和麦迪纳圣地的卫士。因此，沙特王室在男女授受不亲直至妇女戴面纱等方面，都比一度准备照此实行的伊朗国王更加坚定地遵守伊

伊斯兰教义。沙特阿拉伯是一个逊尼派的宗教国家，霍梅尼正是想为伊朗什叶派实现这样一个宗教国家而奋斗了一生。但他们的相互理解却仍然是有限的。“真主、古兰经、霍梅尼”这句伊朗群众在他们示威游行时为来自库姆的圣人高呼的口号，在逊尼派教徒看来是一句虚伪的亵渎神明的言词。沙特人对伊朗人民在他们的“伊马姆”霍梅尼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个人崇拜感到十分厌恶。

“伊斯兰共和国”在德黑兰刚一宣告成立，美国人就赶紧派遣他们的国防部长访问哈立德国王。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将要顶替伊朗国王在西方战略计划中所承担的角色；防御锁链再也不能够沿伊朗北部的苏联边界走向来设置，而只能沿阿拉伯海湾沿岸展开。随着霍梅尼接管政权，一项新任务便在一夜之间落到了诸如巴林、迪拜、特别是阿曼苏丹一类酋长国头上，至于酋长们和埃米尔实际上是否能胜任，那就不得而知了。虽然阿亚图拉在胜利初期就明确表示，伊朗的政策将要采取与以色列激烈对抗的路线，并在德黑兰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作为第一位国宾热情接待，然而阿拉伯世界许多国家的首都，对伊朗发生的变化所表现的喜悦气氛，充其量不过是口服心不服。伊朗君主制垮台后，约旦和摩洛哥一类王国，深感在政治上面临更加严重的威胁。各亲美政府担心仇外的浪潮会从伊朗泛滥出来。埃及总统萨达特则为那笔伊朗国王为支援埃及国内重建规划而慷慨大方地交给他的几十亿美元外汇担忧。即使在阿拉伯激进分子当中，也没有因推翻伊朗国王而表现出真正的胜利喜悦。在直到一九七五年为止一直与伊朗国王誓不两立的邻



国伊拉克，什叶派教徒很快便活跃起来，并拿着霍梅尼——也是他们的最高宗教权威——的一封信，要求政治自治。流亡纳贾夫期间的阿亚图拉有整整十年曾是伊拉克当权者用以对敌对的君主制邻国进行地下斗争的一个备受欢迎的政治工具。但随着霍梅尼的胜利，巴格达多年来在霍梅尼身上所要的把戏，突然变成一个政治爆破筒了。

虽然国王和霍梅尼在伊朗权力顶峰上的位置交换引起了巨大变化，但伊朗军队即使在伊斯兰革命者欢呼胜利之后也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实力工具。这支军队于二月十日和十一日在几乎毫无战斗的情况下被打败了，当时他们似乎陷入一种不知所措、不相信自己力量和团结的境地。但是，他们的战斗力毕竟还是未受损害地保留下来了。四十多万名几十年来习惯于每天早上高呼“为真主、国王和祖国而战”的士兵，成了毛拉们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的伙伴。作为政权重要支柱的武装力量，不是休戚相关地站在霍梅尼一边，而是一开始只想同他及其政府妥协的基础上共存下去，这是霍梅尼的很本弱点。尽管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军队打过白旗，但他们还是能够猛烈战斗的。军官中的指挥阶层——当然不包括那些已被枪毙的权势显赫的高级军官——认为，即使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陆军依然是国内唯一能够维护国家和保持统一的力量。如果霍梅尼的魅力一旦消失，它就能起决定性作用，但是，这支军队的弱点也将很快显现出来。如果没有大批美国教官，如果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已经不再受到优待）不再源源不断地提供零备件和补给品，这支军队的前途将是阴暗的，一堆废铜烂铁终将威胁着它。

## 第十四章 人间天国

库姆故居

救生艇——伊斯兰教

理论和实践之间

第一次对真主的亵渎

格兹先生的冷藏库巷六十一号住宅座落在伊朗圣城库姆市内。它朴素而陈旧。当这所房子盖好时，连老态龙钟的房主本人还没有出生呢。在内院弯曲的小水池周围，长着六棵低矮的小树。自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国王派人前来逮捕阿亚图拉霍梅尼以后，简朴的书房里的老式硬木写字台至今已有十五年无人动用了。曾经塞满整个房间，使室内显得协调的那些书籍，已被“萨瓦克”洗劫一空，杳无踪影。无论是在布尔萨，还是在纳贾夫和巴黎，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总是一再梦想回到这所住宅的安稳的环境中去。当胜利的时刻到来，革命者替他们所崇拜的人物在德黑兰准备好最华丽的房子时——当时已腾出许多宫殿——这位老人断然加以拒绝。他的梦魂所依，仍然是圣城库姆。铸定他特性的是其精神，而不是德黑兰那种乱哄哄的花花世界。

当霍梅尼就要重见自己的故城时，他还谢绝迁入库姆的

商人想作为礼物送给他的那座较为宽敞和漂亮的住宅。他不同意人们为他的安全起见在房子周围架设铁栅栏。霍梅尼当时已有七十七岁高龄，很快便到达他动荡生活的尽头，但他多年来养成了朴素的秉性，对奢侈毫无兴趣。他十分固执，看不出有什么可信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栅栏会改变也许是前世注定的命运。毕生所要做的工作，几乎快结束了。库姆市民兴高采烈地在他们的还乡人面前展示出霍梅尼曾为之奋斗终身的极乐世界。在距德黑兰以南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天国”已经成为现实。对此，有许多伊朗人，即使在霍梅尼取得胜利之后，也无法相信或不愿相信。在德黑兰，当沙普尔·巴赫蒂亚尔不得不把抵抗滚滚而来的伊斯兰浪涛的最后斗争进行到底时，这里，已经开始实行新的纪年。国王亲自任命的库姆老市长，自动下了台。军队撤离这座城市比其他地方更早些。这个地区已无人再遵守宵禁令。现在得由毛拉给官员分派日常工作。警察自动解散。佩戴白袖章的年青穆斯林，负责管理法律和秩序，并负责指挥交通。冻肉已从商店里消失，因为屠宰牲畜不符合伊斯兰教义。许多商人关闭了商店。农民们每天早晨从农村赶来，在大街上出售自己园地的产品。巴法罗·比尔和约翰·韦恩曾在银幕上驰骋的影院，已全部被烧光，没有人再考虑重建。犹太人入股生产的酒精饮料，甚至“百事可乐”，亦被严格禁止。在库姆的大街上，看不见不戴面纱的妇女。所得税被取消了，财务官员都得另找工作。毛拉从所有信徒那里收取五分之一的收入，用于资助穷人、医院和公路建设，但也用于购买为应付困难时期而贮存在“伊斯兰之家”的粮食。法院也被关闭，所有犯人都由一个由

宗教领袖所组成的委员会审理。然而，霍梅尼所期望的却是：库姆应首先没有罪犯。

在取得伟大胜利后的日子里，这座城市就这样成为霍梅尼按照一千三百年前的样板而设计的政治乌托邦的模特儿，以便使它在伊朗，甚至在远远超越国界的地方，变为现实。他的斗争，几十年来只针对一个具体敌人——伊朗国王；但他的胜利，却应超越国界。“我是一个能把这个被剥夺权利的伊斯兰民族的要求表达出来的发言人”，这位年老的阿訇自信地说，“因此，我能够把它的呼声，转达给其他民族。”伊朗报纸的结论说得更加明确：“伊朗革命是一股席卷整个中东的巨澜。”这些话根本就不需要讲得这样清楚。即使没有这些野心勃勃的要求，霍梅尼以真主名义发动的暴动，也会被评价为一个国际信号。这场革命，对一部分人来说，是预示伊斯兰潮水即将到来的最后一波具有警告性的冲击浪；在另一部分人眼中，它则是在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斗争中所呈现的希望的象征。

长久以来，没有任何一次革命，象现在这样如此口口声声地声称以真主为最高统帅，不仅要战斗到底，而且还取得了胜利。先知的虔诚士兵，曾在战场上（特别是同以色列打仗时）一再遭到失败，而这些失败，从根本上使信仰是否有效成了问题。现在，他们终于无往而不胜了。因此，这次成功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对六亿信徒来说是如此，而且对所有长期以来就神魂颠倒地或震惊地密切注视着伊斯兰运动——它的政治潜力、它的社会吸引力、它的宗教力量——的那些人来说，同样也是如此。但是，伊斯兰教的这次伟大胜利，却使这次伊朗戏剧性事件的许多目击者感到迷惘。这是因为欧洲人很难理解

象国家学说一样受到崇拜的宗教所具有的广度，当斗争把人间和天堂的目标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时（穆斯林几乎不能承认这样一种区别），误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霍梅尼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从一种比较狭隘的宗教意义上过高地估计了伊斯兰教的爆炸力。他们在伊斯兰教的名义下，还综述了伊朗革命的一大堆根源，然而这些根源在第三世界各民族中都普遍存在着——即使在那些不向麦加方向顶礼膜拜的民族中也存在着。

可见，决定这场反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神圣王国的殊死战斗胜负的东西，并不一定是那种对霍梅尼“天国”的渴望情绪。不！决定这场决斗胜负的是对“不公正的统治者”的积愤。什叶派造反者的奋起反抗有着特别牢固的历史基础，这一点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把国王从孔雀宝座上赶走的人，也并非一定是作为“阿亚图拉”的霍梅尼。不！这个人作为民族英雄的霍梅尼。对于他的神学教义，即使在决战阶段，也是有争议的，而他那种因正直和政治上的不屈不挠所形成的个人威望，却是毋庸置疑的。促使几百万伊朗人上街战斗的动力，决不是那种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不！真正的动力是因独裁者滥用权势打破旧的政教平衡而引起的愤怒。当然，这并不是近东的特产；在独裁政府粗暴地反对宗教的所有地方，宗教作为一种反抗工具总是更为普及、更为强烈。迫使伊朗人民起来造反的原因，也不是霍梅尼那种复兴先知穆罕默德时期古老的贝督因人<sup>①</sup>的社会幻想。不！更确切地说，迫使

<sup>①</sup> 贝督因人是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

——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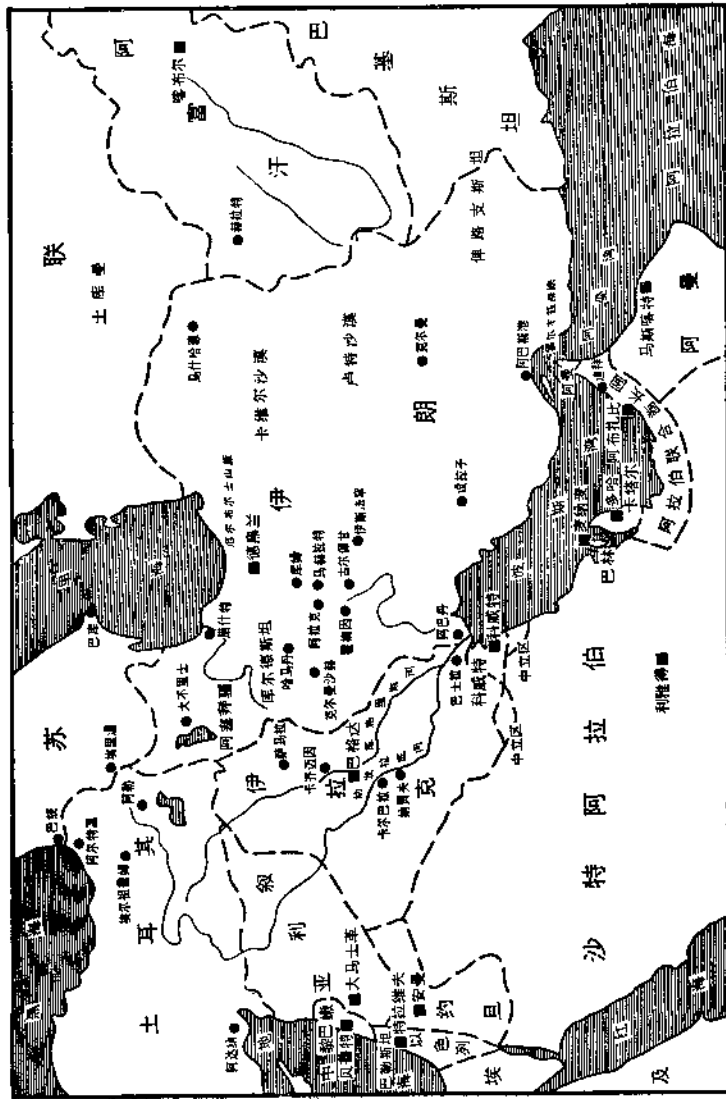
人民造反的原因，是对一种最终适得其反的强制性进步感到失望和绝望的情绪，而这种进步曾被统治者大肆吹嘘为通向更美好和更公正的生活的一步。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看来，西方总是意味着进步，因而意味着异己，这就使这些国家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困境。而这种情况，比起其他国家来，在伊朗也许更为突出。这个国家的最大宝藏是石油。几十年来，这里的石油都是由西方专家和西方机械开采的，以便为西方的进步服务。多年来，伊朗的最大骄傲是军队，但它却需要西方的武器和西方的军服。在巴列维家族的统治下，一切完美的典型和思想方式无例外地出自西方的智慧。从前，西方曾是伊斯兰文化技术（数学、占星学、化学、医学）的学生；而作为老对手，西方现在却变成了伊朗既钦佩又憎恨、既仿效又终究不能与欧洲人共享的榜样。只是当外来文明被人们所怀疑，并在许多领域中被证实为无用时，曾被弃如敝屣的伊斯兰教才再次从阴影中冒出来，成了残存在伊朗这艘陈旧的豪华轮船上的最后一只救生艇。

人们从被重新发现的伊斯兰教那里所能得到的东西，是作为反国王斗争可靠基地的现行社会基础结构，是反殖民主义传统、社会保险网和对永恒真理的追求。而它使人们失去的东西则是建设二十世纪社会的奇特模式。作为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条“第三道路”，伊斯兰教尽管进行了多种尝试，但它仍未经受最后检验。甚至连这位自负的阿訇霍梅尼，愈接近上台时，他对自己的政治概念的阐述就愈模糊。这位不屈不挠的老战士突然感到，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出现了一道介于几十年所鼓吹的理论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之间的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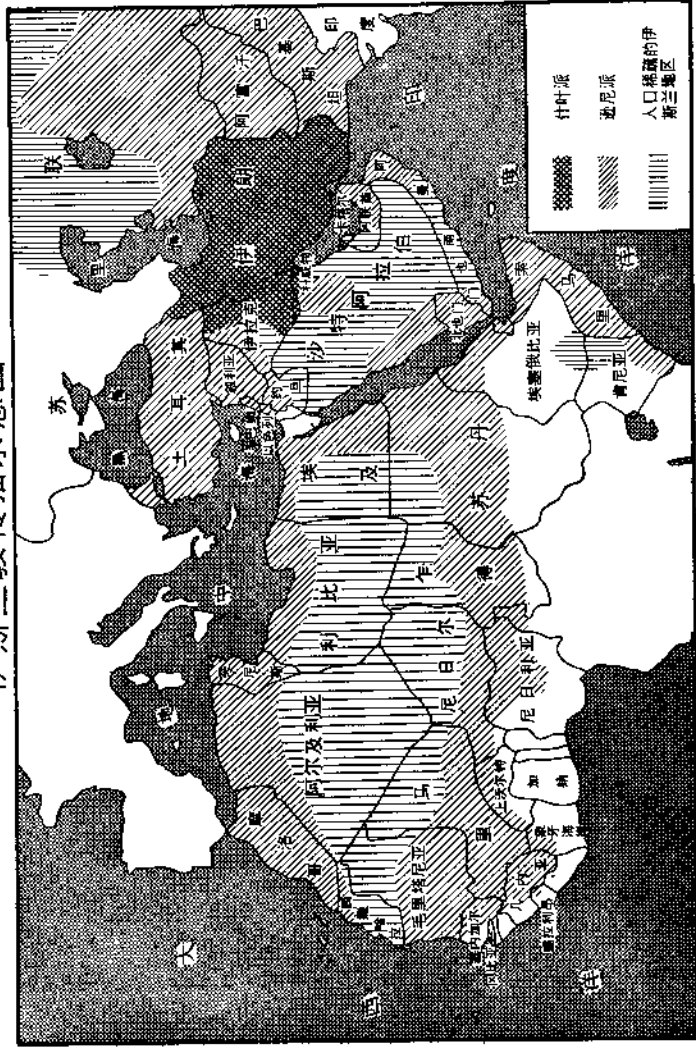
沟。

在流亡的岁月中，他一直认为，神学家是“唯一的合法的  
人民领袖”。当他刚刚返回德黑兰时，这个迷梦很快便陷入到  
那些刚刚与他一起推翻国王的人们所发射的拦阻火网之中。  
在霍梅尼接管政权后，甚至连关于“神学家监督行政、计划和  
国家事务管理”（这是一条七十年来就写在宪法上，但被历届  
统治者所藐视的条款）的论点，几乎也没有使绝大多数政治上  
活跃的伊朗人一致起来。随后，人们迫使他同意对“伊斯兰共  
和国”实行公民投票，这时，这位新的精神领袖，咬着牙，踏上  
了一条荆棘丛生的神学道路。因为他认为，公民投票不仅是多  
余的，而且甚至是亵渎神明的。真主本人早已作出了有利于  
“天国”的决断。因此，当这位德黑兰的胜利者返回自己的故  
城库姆后，在其漫长而冒险一生的后期不能真正感到满足。  
他个人的结局同他为之奋斗的宗教命运一样：在反对国王这  
个敌人的斗争中，他取得了比建设一个崭新的、有保障的未来  
世界更为辉煌的成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的伊斯兰“天  
国”似乎也同昔日伊朗国王的“伟大文明”一样，是一种不现实  
的梦想，但这两个人的显著区别是他们的动机和品格。





伊斯兰教传播示意图



## 附 录

### 霍 梅 尼 语 录

关于妇女、影院和银行

关于大国、欧洲人和以色列

关于伊朗、国王和未来

在近十五年的流亡岁月里，霍梅尼坚决拒绝在西方记者面前，说明自己对伊朗君主制的态度和对“伊斯兰共和国”的设想。国际新闻界“特别注重国王的煊赫、举止、典礼和仪式，尤其是国王登基时的喧哗。他们把目光只放在石油价格上，却不去关注伊朗人民的困苦和混乱状况，以及人民遭受到的镇压”。对这些他始终耿耿于怀。因此——霍梅尼曾这样说过——在漫长的流亡时期，他始终把自己的信息直接传达给伊朗人民。只是从一九七八年起——那时德黑兰群众运动已具有新的规模——霍梅尼才开始接待西方记者。当然，绝大多数的采访并不是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的，而只是由他以冗长的独白方式，回答写成文字呈递上来的问题。主要是在返回伊朗前最后几个星期里，他才愿意阐明自己斗争的一些原则。从这些戏剧性日子的几次最重要谈话中，反映出他对具体的政治课题所发表的一些值得注意的言论，现列述如下。这些言论摘自大约十二次不同内容的谈话。

关于妇女未来的作用：

“我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保守分子。在伊斯兰共和国里，妇女们可以参加选举、从事某种职业和享受比较高的教育。但从事任何事情，都必须穿着合适的服式，起码要戴面纱，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要与男人分开……国王在谈论妇女时曾经说过：‘她必须具有异国风味和诱惑力。’诱使妇女们道德败坏，并想把她们作为玩偶的人正是国王。宗教反对这样的悲剧和痛苦，然而绝不反对妇女的解放。相反，伊斯兰教反对那种把妇女作为纵欲对象的观念，并为她们表达出自己的尊严。”

关于影院：

“国王为了使我们的青年堕落，大力推广殖民主义的电影节目，以此试图引诱我们的儿女走上伤风败俗的道路，从而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国家的灾难性状况上引开。国王的影院是淫乱的中心，是无知和民族混乱的教育城堡。穆斯林人民认为这类中心是反对人民利益的，因此有加以消灭的必要，这方面并不需要教会下达一项命令。”

关于银行：

“银行的作用比影院的作用更加恶劣，银行对国家的破产及落后状态起着一种重要作用。人民认为，这些使我国经济生活崩溃的破坏性中心有烧毁的必要。它们毁灭了民族生产，而有利于国际康采恩。它们剥削人民。”

关于伊朗至今的作用：

“至今，外国人不断干涉我们的事务，我们只不过是外国利益的帮手。巴列维王朝是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伊朗人民的。这个王朝掠夺我国的自然资源和财富，并向外国人开放。它破坏了我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设施的基础。五十多年来，它一直压迫着伊朗人民。”

关于国王：

“国王是人格化的政治迷雾。他生活在一个病态的幻梦世界里。他的罪行罄竹难书。一个自由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对这个把伊朗人民的财富存在外国银行里的人提起诉讼。他必须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负责。”

关于国王的“白色革命”：

“这个被如此美妙地称为‘白色革命’的东西，不外乎是一项美国的计划，其用心良苦，旨在毁灭我们的农业，把我们整个国家变成倾销美国生活用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并把我们的农民变为廉价劳动力。今天，所有生活用品不得不一律进口，这就是‘白色革命’的罪过。”

关于大国：

“所有超级大国都剥削我国人民，我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我认为，英国亦属于此类。”

关于军事顾问：

“他们的存在不仅证实了反伊斯兰教和反民族的政策，为他们所付出的巨大支出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他们通过对我国军队所握有的权力，使士兵和指挥官的尊严、荣誉受到损害。”

关于伊朗在产油区的作用：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地区的战略意义，与那些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这里的人所想像的截然不同。我们将与这个地区的其他居民一起，共同保卫我们的安全，阻止超级大国的侵入。我们将不去充当宪兵的角色。”

关于近东危机：

“以色列非法侵占了一个穆斯林民族的国家，并犯下无数罪行。我一贯强烈要求，全世界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反对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敌人。”

关于伊斯兰政府的任务：

“她的首批目标是：铲除外国统治及其在地方的帮凶；取消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领域里的统治地位；驱逐殖民主义和剥削者，不管他是谁；把国家的财富和地下资源归还给贫病交加的被压迫群众，几百年来——特别是在现代——他们由于统治者的险恶和虐待历尽千辛万苦。其次，从政府各部、局以及国家和民族机构中把叛徒和投机分子清除出去，把这些职务分配给可靠的有专门知识的爱国志士；为了国家

的兴盛,撤销多余无用的部门和职位;压缩浩大的财政开支和杜绝铺张浪费。”

关于自己在这个伊斯兰国家里的作用:

“宗教领袖亲自领导政府,对此没有想过。鉴于我的年龄、我的处境和我的地位,我本人对此毫无兴趣。我绝不会当国家总统,我也绝不会担任其它政府职务。我将一如既往,满足于当人民领袖。”

关于未来的国家领导: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统治者,他能亲自砍掉自己儿子的手,如果他儿子偷窃的话;他能鞭打并用石头砸死自己的亲属,如果这个人淫乱的话。”

关于伊斯兰教的进步:

“当某个工业国家在科学上或技术上搞出点什么新花样时,我们当中有些人就会感到自己愚弱,并认为,我们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宗教,要想参与这种进步,对我们来说,除了取消伊斯兰教及其法律外别无他途。当别人登上月球时,这些动摇分子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我们的宗教禁止他们登月!

“我想对这些人说如下的话:并不是东方集团和西方集团的法律使他们能够登上月球,因为这是些相互对立的法律。依我之见,这两个集团甚至还能够登上金星。但是在我眼里,这两家是落后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在自己的社会里实现良好

的道德。这两个集团所取得的物质进步成了精神进步的负担。他们一直无法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因为解决这些问题和消除人们的困苦需要良好的道德。”

关于伊朗共产党人：

“我已经命令我的支持者，放弃与共产党人的任何合作。我们知道，他们将在背后给我们一刀，只要他们一旦上台，他们将建立一个与伊斯兰教的准则完全对立的独裁政权。在伊朗，现在几乎还没有左派或共产主义派别，他们在当前的群众运动中是无足轻重的。我们的信念是坚强的，而且有能力对抗他们的意识形态。”

关于石油政策：

“如果能够阻止国内外石油掠夺者把手伸向油源，并以合理的方式使用石油，那么油源也不会那么快就枯竭。相反，那种在出售石油方面产生的无止境的浪费现象，本身潜伏着我国石油蕴藏面临全面枯竭的危险，这种浪费现象，是由国王造成的，尤其表现在购买废铜烂铁<sup>①</sup>上。”

关于未来与欧洲的合作：

“所有对我国人民真正有利的计划，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但有许多计划必须加以拒绝。我们知道应停止某些公司的活动，这些公司只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反对我国。在一个伊斯兰共和国面前，欧洲政治家不应感到恐惧。”

<sup>①</sup> 指进口外国武器。——译者